水問山尋

陈希亮：打压之扰

陈希亮是眉州青神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为官以执法严明著称，嘉祐八年（1063）六月他来凤翔担任知府，是苏东坡在凤翔任上的第二位上司，按照同乡社交辈分，苏东坡是他的孙辈。陈希亮对苏东坡颇为严格，在官府听到有吏员尊称苏东坡为“苏贤良”，他大怒说：“他仅仅是个判官，与贤良有什么关系！”当即下令用刑杖责打这位吏员。此后，知府官署内一派严肃，不再有宋选在任时从容宽松的氛围。

陈希亮精力充沛，重要公文都自己操笔写作，小文章才交给幕府官吏撰写。对苏东坡按照惯例写作的公文逐句涂墨修改，让他重新抄写后呈交，之后又修改一些字句，让他再次修订，如此往返数次。苏东坡年轻气盛，觉得陈希亮有意折腾自己，在公文写作等事宜上和他有过几次争执。如此一来，苏东坡对陈希亮敬而远之，除日常公事外尽量不见面。当年中元节，苏东坡没有参加知府举办的常规宴会，也没到知府厅堂拜见这位苛刻的上司。陈希亮抓住这一点礼仪事由，上奏朝廷，指责苏东坡违反礼仪，导致苏东坡被朝廷罚铜八斤。这对苏东坡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受到朝廷责罚。

苏东坡任满回京后不久，陈希亮因为把他州馈送的“公使酒”（公务用酒）据为己有，遭到弹劾，被解除职务。赋闲几年后，他又担任过湖北房州知州、太常少卿等职务，六十六岁病逝。

后来苏东坡在黄州时与陈希亮之子陈慥来往密切，受托撰写了《陈公弼传》，就自己与陈氏从前的纠葛，写了一句：“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长辈），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躲终南：官场总是烦恼地

苏东坡去过次数最多的名胜之地，是终南山。他在凤翔府当签判时，日日都能望见府城南郊远处的秦岭诸山，其中的一条沟谷陈仓道就是他当年出川走过的地方。因为距离不远，他在凤翔期间曾几次抽空前去终南山游览、小住。

他第一次去终南山游览是嘉祐七年（1062）二月，因为冬天数月干旱无雪，当时官员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向神灵祷雨、祷雪，希望得到上天眷顾降雪，助力农业生产。担任凤翔府签书判官的苏东坡奉命去宝鸡、虢、鄠、盩厔四个县宣布核实和减少囚犯人数以便消除积怨，助力降雪。他在盩厔县城办理完公务，乘便去四十里外的终南山北麓匆匆游览了两天，得到监太平宫张杲之、道士赵宗有的接待。他参观了太平宫、南溪、楼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仙游寺、中兴寺等寺观、山水名胜，对太平宫中太宗御书《急就章》刻石上的书法大感兴趣，与道士多有交流。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仙游潭南边形状奇异的绝壁，有山民在南北两座山崖之间放置了一根可以踩踏的树干，苏东坡觉得有滑落悬崖的危险，就没敢踏步树干，于是在中兴寺墙壁上题写了一首表达遗憾的诗：

清潭百尺皎无泥，山木阴阴谷鸟啼。
蜀客曾游明月峡，秦人今在武陵溪。
独攀书室窥岩窦，还访仙姝款石闺。
犹有爱山心未至，不将双脚踏飞梯。

之后，苏东坡去了太白山，这里的神祠相传非常灵验，每当发生旱灾，官吏、民众都会前来祭祀、祈祷。他奉命祈雨，登上山顶时，看到山崖上还残留着冰雪，担忧干旱的农民正在山顶的湫池边祭祀龙王，还带着瓶瓶罐罐，准备装满水，带到山下的祠庙拜祭。后来，他在玉女洞看到洞顶有飞流而下的泉水，也灌了一瓶，打算带回去煮茶。他回到凤翔县城，天气依旧干旱，知府宋选听说向太白山顶湫泉的山神求雨最灵验，便派人再去太白山的山神庙（今清湫太白庙）祈雨、带水回来祭祀。这是苏东坡第一次游览终南山，匆匆而还，不算尽兴。



嘉祐八年（1063）二月底三月初，苏东坡去长安公干，来回均曾经过终南山山脚下的太平宫，不过这次是因公出差，匆匆一过，不算游览终南山。

同年八月，苏东坡被朝廷罚金，心中极为郁闷，八月底九月初托病休养了一个月，带着家人一起到终南山下的南溪散心。这可以算是他第二次游览终南山，在《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中云“自我来关辅，南山得再游”。此次游览，可以说是终南山深度游了，他去了附近的扶风县天和寺和周公庙、盩厔县的上清太平宫等处游览。官场的烦恼让他有了出世的想法，便把南溪竹林中的一处茅屋起名为“避世堂”。

第三次游览终南山是同年年底，苏东坡一个人到上清太平宫闲住。十二月十四日夜下了一场小雪，次日他骑马到南溪与友人小酌到晚上，住了几天，又去司竹监，看管理人员如何放火烧苇园，如何狩猎狐兔，随后吃了顿烤肉大餐。苏东坡在《司竹监烧苇园，因召都巡检柴贻勖左藏，以其徒会猎园下》中记录了此次闲游，“燎毛燔肉不暇割，饮啖直欲追羲娲”。因官场不顺心，苏东坡开始潜心读道藏，试图修养心性，写有《读道藏》一诗：

嗟予亦何幸，偶此琳宫居。
宫中复何有，戢戢千函书。
盛以丹锦囊，冒以青霞裾。
王乔掌关钥，蚩尤守其庐。
乘闲窃掀搅，涉猎岂暇徐。
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虚。
心闲反自照，皎皎如芙蕖。
千岁厌世去，此言乃籧篨。
人皆忽其身，治之用土苴。
何暇及天下，幽忧吾未除。

当然，苏东坡这时候还年轻，志在从政，并没有真要如古代隐士庄子、子州支父那样避世，只是有些小烦恼让他郁闷一阵罢了。

治平元年（1064），苏东坡依然尽量找各种机会外出公干。正月时，离任商洛令的章惇带着两个朋友来游终南山，约好和苏东坡相聚同游。于是，从正月十一日起，四人花费四天时间，游览了终南山及附近的各处寺观、山水，对苏东坡来说，这是他第四次游览终南山。在仙游潭北岸，苏东坡他们看到南岸附近有一座舍利塔及那根通向对岸绝壁的树干。苏东坡仍然心有畏惧，不敢上去。章惇胆子大，他从树干上走过去，把绳索挽在树干上，在绳索的保护下到了舍利塔边。苏东坡等人不敢如此，最后循潭水边可走的小路走到潭西，发现那里的水比较浅。于是众人提起裤子涉水走到舍利塔那里，发现

那是一座两层的唐代残塔，上面雕刻了十六个神佛鬼怪，苏东坡还用墨拓印了一本，并写短文记述了这日的经历。

到二月，苏东坡又抽空独自去五游终南山。他与监丞事张杲之、监宫李庠游览南溪、太平宫等地，喝醉之后在水中濯足，也算是新奇的体验。他对这里已经非常熟悉，也没有了最初游览时的新鲜感，而且此时天寒地冻，并不是游览的好季节，也就没有写什么诗。对他来说，终南山是躲避官场不快的清静地。不久之后，他就任满离开了凤翔。此后，在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底，苏东坡、苏辙除父孝，带着一大家人翻越秦岭出川去汴京时，又一次走陈仓道，过凤翔府，涉终南山脚下的太平宫等处，这也是苏东坡最后一次的终南山之旅了。



水問山尋

造园：动手动笔

苏东坡从小就爱栽花种树，小时候曾在东冈栽种松树，入仕之后，他每到一个地方几乎都要营造园林、栽花种草，这似乎是受到白居易的启示。白居易是爱好园艺、园林营建的唐代著名文士，在诗文中对自己这方面的经历多有记述。苏东坡对白居易的诗歌、行迹极为熟悉，故而许多行为、诗文字眼都取法白居易。如在黄州，苏东坡模仿白居易在忠州开辟“东坡”的举动，在东坡开荒种地，才得来“东坡居士”这个雅号。元祐年间，苏东坡公开说“我似乐天君记取”“出处依稀似乐天”，白居易当年在杭州“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苏东坡则步其后尘，“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记几回来”。

苏东坡初次为官是到凤翔府担任签判，这时他就有了最早的园林营建活动。嘉祐七年（1062）年初，他先修葺了官署中自己官舍所在的庭院，砍伐茅草，让其中的竹子、杏树能彰显它们的幽姿，为此他作了《新葺小园二首》记述此事。其他官僚觉得他三年后就要调职，何必多此一举，即所谓“三年辄去岂无乡，种树穿池亦漫忙”。但苏东坡的心态是“暂赏不须心汲汲”，意思是这时候能得到乐趣就足够了，何必那么功利地计较。

苏东坡还让人在知州官署北部的庭院中营造一座观景的亭子，在亭北栽种了些牡丹，边上挖出三丈长的长方形池塘，亭前挖建跨池短桥，又在池北整修“北厦”的轩窗曲栏，在北厦之后的院中修建两个小池。他让人在三个池塘中种莲、养鱼，周围栽种桃、李、杏、梨、枣、樱桃、石榴、槐、松、柳等树木。观景的亭子修好的时候，恰逢知州宋选带着苏东坡等全城文官、民众祈雨“灵验”，下了三天大雨，满城百姓欢呼雀跃，于是苏东坡把这座亭子命名为“喜雨亭”，写了《喜雨亭记》一文记述此事。

此后他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为官时都有改造园林、兴修建筑的举动，在被贬黄州、惠州、儋州时期，也有修建雪堂、白鹤峰居所、桄榔庵的举动。从雪堂、白鹤峰居所的营建可以看出，苏东坡营造宅邸、园林有些“兴之所至”的意味，并没有经过多么理性的筹划。首先，选址的主要目的似乎是为了看风景，所选地都远离主城区，或是位于郊区的村落，导致后来要转让的话很难找到买主；其次，因为选址有些随意，营造的建筑也未必实用，看上去很美，住起来并不舒适，比如在白鹤峰住，还要走山路到山脚的江边打水。

对苏东坡来说，园林中的树木花草皆有盛衰，并不期望一直拥有美景，他的思想是不“留意于物”，珍惜短暂的相遇、触动，在刹那能感受到些微的乐趣，便已足够。

明　陈洪绶　蕉林酌酒图（局部）

水問山尋

水問山尋

长安：文物渊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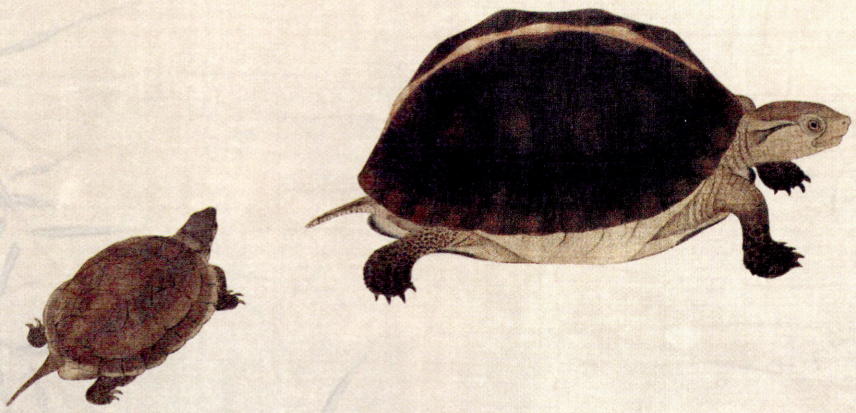
长安是汉唐古都，是文物渊薮，苏东坡五次路经长安。

第一次到长安，是嘉祐元年（1056）出川科考时经过；第二次是次年，因母亲故去，他与父亲、弟弟三人匆匆回家时经过，对长安的印象并不深刻。

第三次到长安，苏东坡才有余暇了解这座城市。嘉祐六年（1061）他考中制科第三等，去凤翔上任时，十二月路过长安。翰林侍读学士刘敞正在这里担任永兴军路安抚使兼知军府事，和欧阳修、梅尧臣交好，是著名的博学文人，他热情招待了苏东坡。刘敞喜欢收藏长安附近出土的青铜器，考证古器物上的铭刻，撰有书稿《先秦古器记》。他请苏东坡欣赏了自己收藏的古器。之前刘敞到凤翔府辖区的麟游县游览唐代皇帝避暑的九成宫遗址时，让官员把残存的唐代宫苑赏石集中放置在麟游县官署东侧的庭院中，苏东坡听说此事后，写了一首唱和的诗。次年十二月，麟游县令把刘、苏二人的诗刻碑立石，命名为“京兆唱和”，这是最早的苏东坡诗歌碑刻。许多地方官员都热衷于把本地名人或者曾在本地担任官员的名流的言论刻碑立石纪念，麟游县令立这块碑刻，是想凸显自己的上司刘敞，但从侧面说明苏东坡已经有了些名气，可谓年轻一代士大夫中的翘楚。

第四次到长安，是治平元年（1064）年底，苏东坡在凤翔府任满以后，回京时路过长安，逗留了十多天。期间他和爱好收藏的朋友交流，题跋了安师文收藏的颜真卿草书，在陈汉卿家欣赏过吴道子画的佛像，还和关中著名的书法家石苍舒有交流，留下几件书法作品给对方。武功县县令王颐离任，恰好路过长安，苏东坡题跋了王颐收藏的《醉道士图》，并赋诗和写草书作品为赠。

第五次到长安，是熙宁元年（1068）年底，苏东坡、苏辙为父亲守孝期满之后，带着一大家人从陆路出川，十月底到熙宁二年（1069）年初，他在长安停留了好几日。苏东坡兄弟到著名的收藏家薛绍彭处欣赏了其收藏的曹霸《九马图》，又和陕西转运副使范纯仁、即将赴任的建州钱监王颐在母沆家聚会，观赏王颐、石苍舒的草书，并题跋了《醉道士图》等书画作品。闲聊时，有人提及前几个月重臣韩琦坐镇长安防御西夏侵扰，王颐、石苍舒曾在宴席上给他表演草书，韩琦说了一句“你们二人就像在给马行头吹笛”，众人都觉得莫名其妙，又不敢问这位朝廷重臣“马行头”是什么意思。苏东坡听了，解释说汴京东北有个贩卖马匹、草料等的市场叫“马行”，韩琦的意思是，你们在我面前表演草书，就像给马行的大商人表演吹笛，大约是赞扬他们技艺高超，才敢给见多识广之人表演。当然，也有可能是韩琦谦虚，说自己不懂草书——你们在我面前表演草书，就像吹笛给不解风雅的商人一般。



收藏：寓意于物

苏东坡爱好收藏的兴趣是受父亲苏洵熏陶。

在凤翔担任签判期间，苏东坡对书画、鉴藏颇有兴趣，曾把在凤翔所见的十五块古碑文字拓印成册，寄给弟弟苏辙，其中有欧阳询、李商隐等人的作品。后来，他又把友人王颐赠送的骊山澄泥砚寄给苏辙使用。苏东坡与爱好书画、收藏的士大夫交流颇多，如武功县县令王颐曾送给他一件长安古塔中出土的铜龟子，苏东坡便用这件可开合的宝物保存自己的印章。苏东坡在凤翔收藏了几件自己得意的东西，如一幅普贤菩萨画像，他寄给苏辙保存。在终南山下，苏东坡获得了一件古青铜器“宝尊敦”，后被欧阳修写入《集古录》。

苏东坡曾花费巨资购买吴道子的《四菩萨》门板画，这可谓是他最重要也最累赘的一件藏品。传说当年吴道子为唐玄宗在长安所建藏经龛绘制了八块门板，阳面为八菩萨像，阴面为八天王像。唐僖宗时，黄巢大军攻陷长安后焚毁寺庙，有僧人在兵火中抢下四块门板，偷偷带到岐山一所寺庙中，得以流传。有客商以十万铜钱购得这四块门板，苏东坡又花费巨资从他手中买下，送给父亲苏洵。苏洵一生有一百多件藏品，以这四块门板最为得意。

苏东坡并不贪恋藏品，神宗熙宁元年（1068）在眉山为父亲守孝期满，苏东坡把《四菩萨》门板画捐给了中和胜相院。

苏东坡被贬谪惠州、儋州期间，虽然经济紧张，但还偶尔收藏画作，或者以自己的书迹交换藏品。他在常州顾塘桥边孙家宅院卧病时，听说常州许多天没有下雨，天气干旱，便叫人拿出自己收藏的黄筌绘制的《云龙图》悬挂在中堂，每天夜里上香祈雨。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让家人、仆从把自己收藏的画作拿出来晾晒，自己也能大略看看。苏东坡对绘画的热爱至死不渝，他对美好事物一直抱有热情。

对苏东坡来说，收藏画作、赏石、碑刻拓片等都是一时所好。他对收藏家和藏品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藏家应是“寓意于物”，即收藏家获得某一件具体的作品时，能从中得到知识、乐趣就足够喜乐，不必“留意于物”。他认为收藏家不必有永远持有该藏品的执念，圣贤可以做到“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者”，士君子应该追求这种境界。又如他在《墨妙亭记》中论及碑刻时说：“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碑刻如此，书画当然更是如此。这些物质性的藏品会因为战争掠夺、水火灾害、仕途变故等各种因素转移、损毁，还不如士人立下功名、留下文章能传之久远，一个收藏家又何必固执于要拥有某物呢？

水問山尋

水問山尋

壯年意气

第二部分

宋仁宗嘉祐七年至宋神宗元丰二年

1062–1079

水問山尋

宋英宗：大用无期

如果宋英宗赵曙多活十年，或许苏东坡的命运、北宋之后的皇位传承都会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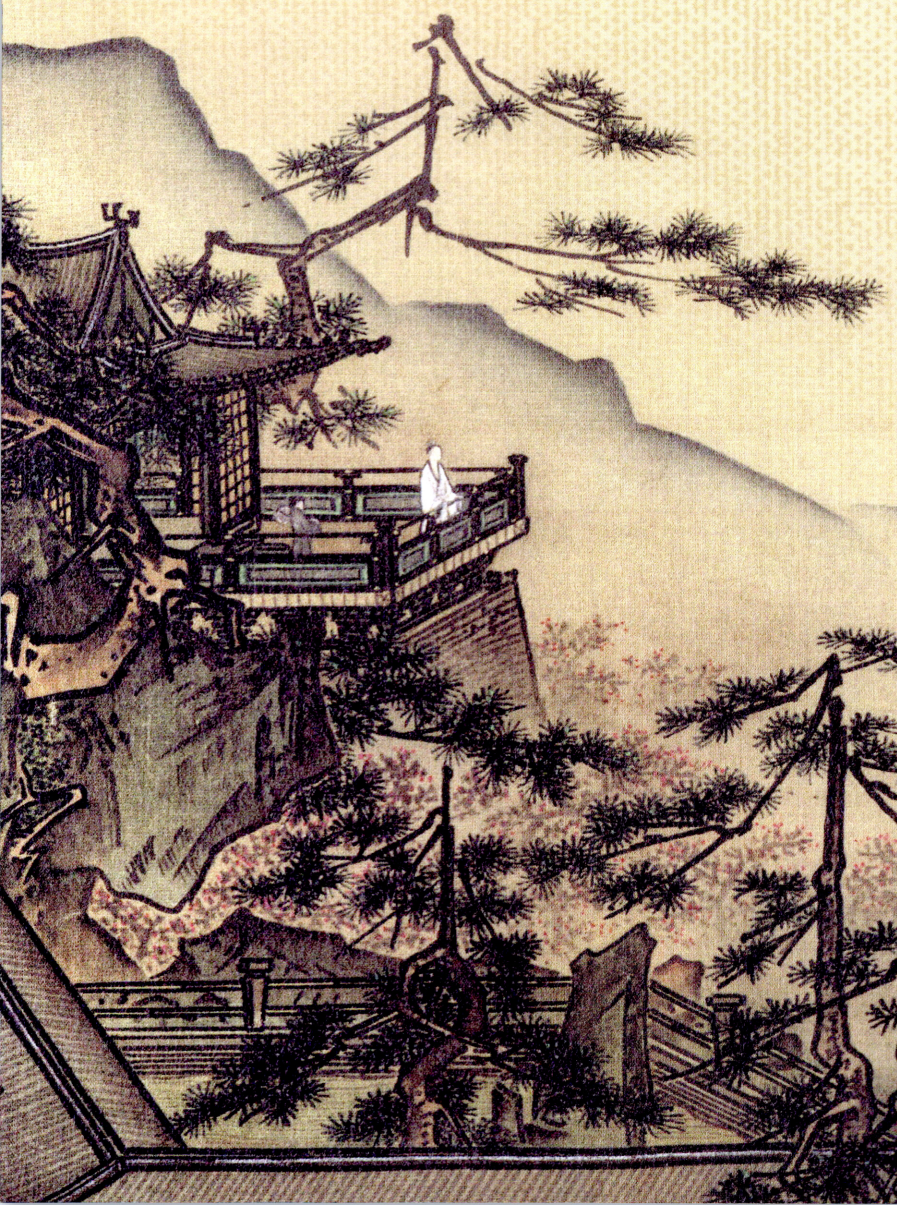
赵曙是宋仁宗的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的第十三子，本来也就是做个闲散宗室而已。可是，仁宗早年所生的三个儿子早夭，就把四岁的赵曙接进宫里抚养。后来宋仁宗又生了一个儿子，赵曙一度出宫生活。不料宋仁宗的幼子四岁时又早夭，于是宋仁宗又把赵曙接回宫中，立为皇太子。

赵曙因不是官家亲子，几次进出皇宫，恐怕内心的压力比较大。嘉祐六年（1061），苏东坡考中制科第三等的消息满城皆知，当时赵曙对苏东坡的名字应该有所耳闻，肯定也听说过欧阳修对苏东坡的文章的夸赞之词，对苏东坡有了好印象。

嘉祐八年（1063），宋英宗即位，时年三十二岁。治平二年（1065），三十岁的苏东坡从凤翔回到京城。苏东坡此时的散官官衔是殿中丞，按照制度属于审官院考核的官员，在地方任满回来后就能参加馆职考试，成为三馆的专职或兼职官员。

宋英宗得知苏东坡回京，想按照唐朝的先例，不经考试就直接将苏东坡召入翰林学士院任职，授予他“知制诰”的差遣职务，这意味着他将成为近臣。

宰相韩琦进言道：“苏东坡是个人才，能成大器，今后必然会被皇上重用，只是朝廷要循序渐进地栽培他，让全国的文士都衷心倾慕、推举他，那时朝廷提拔他，就是顺理成章、人心所向的事情，也就没人会有异议了。倘若现在突然重用苏东坡，天下士大夫恐怕会议论纷纷，这反倒是牵累苏东坡。”



宋英宗又问韩琦："让苏东坡到翰林学士院担任修起居注怎么样？"

韩琦说："修起居注与知制诰官职性质相同，官品接近，恐怕也不太合适。不如在馆阁中给他一个职务，并且要先召他来考试。"

宋英宗便质疑道："考试是因为不知道该人是否有此能力，而像苏东坡这样的人是没有能力之人吗？"

尽管如此，韩琦还是没有同意。宋英宗比较尊重宰相的意见，便没有提拔苏东坡入翰林学士院。韩琦说的是持重之语，未尝没有道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曾经接触过苏洵、苏东坡父子，尤其反感苏洵的纵横家议论风格，或许因此对苏东坡也有些看法，认为此时的他未经磨砺，并不适合骤然提升，担任皇帝身边的重要职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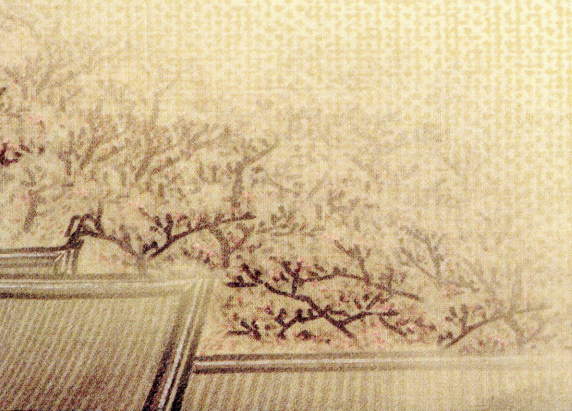
于是，按照审官院的建议，中书任命苏东坡出任判登闻鼓院事。登闻鼓院负责受理文武官员、民众在常规上书程序中难以上达的章奏表疏，类似于皇帝设立的信访机构。如果有人到宣德门外敲击登闻鼓，便有职事者出来接访，接收词状文书，分类整理后进呈皇帝。投书之人如受阻止，还可以去登闻检院进一步上告。登闻鼓院设有判登闻鼓院事二人，是这个部门的长官。刚刚而立之年的苏东坡主掌登闻鼓院，成为真正在京城办公的京朝官，这极大地方便了他的社交，也对他未来的升迁非常有利。

苏东坡名声在外，不缺举荐者。龙图阁直学士吕公著便上书举荐苏东坡参加馆职考试。在馆职考试中，苏东坡再次获得第三等的成绩。入秋，苏东坡以殿中丞身份兼职直史馆，如果长官有需要，可以抽调他参与修撰史书、编纂日历等。史馆中的诸位修撰、直馆、校理、校勘、检讨都是博学之士，文采出众，苏东坡与他们相处，乐在其中。苏东坡写下《入馆》诗，表达这时的心情：

黄省文书分道山，静传钟鼓建章闲。
天边玉树西风起，知有新秋到世间。

可惜的是，苏东坡未能得到宋英宗的大用。治平三年（1066）四月，苏洵病逝，苏东坡、苏辙兄弟护送棺木回眉山安葬、守孝。治平四年（1067）正月，苏东坡兄弟的船只进入三峡之时，三十六岁的宋英宗赵曙在汴京皇宫早逝，他和皇后高氏生的长子赵顼即位，即后世所称的宋神宗。

如果宋英宗能多活十年，说不定朝廷官员的变动、政策的变动会比较平缓，苏东坡这样"简在帝心"的人物，会成为知制诰、中书舍人之类的中级官员，逐步升迁，他的人生也会比后面遭遇的翻覆平顺许多。但是，另一方面，或许恰恰是遭遇的诸多翻覆刺激了苏东坡的文思，造就了他的传奇。如果没有后面遭遇排斥、诗案、贬谪等等，苏东坡说不定也不会进化为大宋第一名士。



水問山尋

宋神宗：鞭打野马

宋神宗登基时二十岁，血气方刚。他少年时，对太宗征伐契丹遭遇惨败、身中两箭的往事念念不忘，不愿年年送岁币给辽国，对管仲、商鞅、吴起等锐意变法的历史人物感兴趣，有一雪前耻的抱负。他深感仁宗君臣总结的“祖宗家法”之不足，对韩非子等法家的“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恰好他身边的韩维、孙永等人是王安石的崇拜者，日常讲论之间，他也对王安石的变革思想有所了解。

宋神宗想要锐意改革，其最终的目的不仅是扫灭西夏，还要收复北方领土，打败辽国。神宗登基时的宰相是韩琦、曾公亮，参知政事是欧阳修、赵概等，枢密使是文彦博，这些都是英宗乃至仁宗时的老臣，举措稳健保守，富弼等人劝神宗理政以安抚民心为上，改革需要缓缓图之。

宋神宗花了近两年时间调整中枢人事，召自己寄予厚望的王安石回京出任翰林学士，频频与他议行新法。宋神宗同意了王安石提出的政策，于是两人决意对朝政、法令进行变革，尽快积蓄财力、加强武备，为灭西夏、伐北辽打下基础。

熙宁二年（1069）二月初，三十四岁的苏东坡抵达汴京时，宋神宗刚任命翰林学士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推动变法。王安石觉得苏东坡有名气而好议论，是个没有定见的文人，不能在朝廷关键部门担任职位，便运作让他以殿中丞、直史馆身份授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这是个八品的闲





职，职责是依《官告条制》制作除授、封爵、赠官、加勋的凭证；祠部主管诸州宫观僧尼、道士等宗教事务，以及祭祀祈祷、给神庙加封和赐额等事宜，工作简单且无关紧要，按部就班让下属执行即可。

王安石做事雷厉风行，二月二十七日，宋神宗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和参知政事王安石主掌，负责制定有关财政方面的新法规，处理财政方面的各种政务。因为朝中老官员反对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就起用青年官吏推行新法，吕惠卿、章惇、曾布等苏东坡的同年进士都得到了重用。王安石带领属下亲信编制新法，半年之内陆续推出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三项新法，这些新法在朝野引起巨大争议，但是确实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故而宋神宗坚持推行。

随着新法规的执行，变法的一些弊端也开始显露，但王安石执拗而自信，他竭力推行自己的理念和政策，提拔赞同自己的人，对反对意见不屑一顾，这也让他的改革引起更大争议。王安石还通过变革科举考试为推行新法选拔适合的人才，变革内容涉及改革考试内容、废除明经诸科，以及改革太学生培养方式等。变法激进独断，苏东坡认为颇为不妥，于熙宁四年（1071）上奏《议学校贡举状》，认为不可轻易改变科举的旧办法。同年八月十四日，苏东坡充任国子监的解试考官，针对时事有感而发，提出的策问考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代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何也？”这显然是针对王安石的“独断”说和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专听专信而出的题目，王安石也心知肚明，对此相当恼火。

此后，司马光举荐苏东坡担任谏官，而王安石则一再劝阻宋神宗不要任用苏东坡。苏东坡清楚自己为王安石所不容，上书请求到外地任职，宋神宗想给苏东坡找个州府去担任知州，但是中书省却建议派苏东坡担任颍州通判，这是故意想让他去追随已经致仕的欧阳修吟风弄月。宋神宗并不想如此对待苏东坡，直接下旨任命他为杭州通判。



新政变法一开始，苏东坡便是最尖锐的反对者，他不仅两次上书宋神宗表达自己对变法的反对，还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变法的不满，同时也经常写诗文嘲讽变法对民间生活的不良影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元丰年间。随

宋　李嵩　宋瑞应图（局部）

着苏东坡的文名日益显耀，作为新法反对者，他在聚会、书信、诗文中显露出的对新政的不满、讽刺，引起了新党官员的气恼。尤其是他写的《湖州谢上表》，不仅宋神宗、中书官员看到了，还刊登在进奏院编辑的朝报上传递给各州，数万官吏、无数士人都有所知晓。新党的谏官们开始找苏东坡的把柄，他们想起几年前沈括检举苏东坡诗稿中对新法颇有影射和怨言，于是翻检民间雕版印刷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等诗文集，找到了更多含有讥讽之意的诗句，连连上书指责苏东坡诽谤朝政。

宋神宗也有意敲打、震慑苏东坡，于是下诏调查此事，御史台官吏从湖州把苏东坡押解回京审讯。审讯之后，大理寺审判认为苏东坡只应被处以降职两级的责罚。同样，其他收到苏东坡诗文的人即便有轻微罪名，按照法律和之前的一系列大赦天下的恩典，也应被赦免。审刑院的复核也认同大理寺的判决意见。宋神宗却决定加重对苏东坡的处罚，在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六日下旨“特责”，把苏东坡贬为检校水部员外郎（正七品），充黄州团练副使（从八品），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个处罚等于将苏东坡发配到落后地区闲居。

这一案件从头到尾都体现了宋神宗的意志。宋神宗虽不希望苏东坡死于狱中，却也不想让他轻松出狱，而是如当年王安石所建议的，要鞭打这位名声在外的野马，让他变成一匹驯服的家马，一名听话的官员。

苏东坡在黄州期间依旧不断有诗、词、文章传播各地，宋神宗对苏东坡的诗文也有所关注，他在宫内读书时，看到苏东坡的诗文都要多看一会儿，看到精彩之处还会赞叹道：“奇才！奇才！”《庚溪诗话》记载，宋神宗曾经问身边的近臣，苏东坡可以与哪个古人相比，有人说：“唐李白文才颇同。”神宗说：“不然。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他认为李白虽然有天赋的才华，可是没有什么学识，而苏东坡是既有才华又有学问。

一直到元丰七年（1084），宋神宗又想起在黄州闲居四年的苏东坡，以“人才实难，不忍终弃”的理由下御笔手札，改授苏东坡为汝州团练副使。“量移”到距汴京较近的汝州，显然有了重新起用他的意图。不过在苏东坡北上途中，宋神宗就患了重病，于元丰八年（1085）三月病逝，君臣未能再见。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时期一次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改革运动，主要发生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变法涉及经济、军事、教育三个方面。

一、经济改革

青苗法：熙宁二年（1069）颁行。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粮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

农田水利法：熙宁二年（1069）颁行。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

募役法：熙宁四年（1071）颁行。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

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1072）颁行。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发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

免行法：熙宁六年（1073），正式颁行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盈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还有局部地区实行的均输法和市易法，发挥平抑物价的作用。

二、军事改革

保甲法：熙宁三年（1070）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

将兵法：熙宁七年（1074）颁行。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

保马法：鼓励北方地区的百姓养马，以备军事之用。

三、教育改革

改革科举制度：颁布贡举法，废除明经科，进士科的考试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并增加法科。

整顿太学：将太学生分为上舍、内舍、外舍三等，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教学，称为太学三舍法制度。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太学生成绩优异者不经过科举考试可直接为官。同时，提举经义局，修撰儒家经典，编纂《三经新义》，设置武学、医学、律学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

唯才用人：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和任用，使许多低级官员和下层士大夫得到发挥才干的机会。

变法的争议：

王安石变法的推进速度和力度引发了一些争议。变法同时涉及了利益的重新分配，触及了部分贵族、官僚、地主的利益，引发了强烈的抵制和反对。一方面，变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促进了社会发展；而另一方面，变法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变法主要人物	王安石	吕惠卿	章惇	韩绛	李定
反对派	司马光	韩琦	欧阳修	苏轼	苏辙
其他人员	文彦博	富弼	范镇	程颢	韩维



水問山尋

王安石：名士分野

苏东坡和王安石的政见思想的分野，是北宋晚期的一大话题，千年以来议论纷纷。其实苏东坡和王安石是两代人，王安石比苏东坡大十五岁，比苏东坡早十五年考中进士，苏东坡刚入朝为官时，王安石已经是中级官员。如果北宋政坛继续如宋仁宗后期、宋英宗时期平稳运行，各年龄阶段的官员代际更替的话，也许王安石以及与之同辈的韩维、吕公著、司马光等人会在六十岁左右取代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等老一辈名臣位居宰执。那时四十多岁的苏东坡可能会担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之类的官职，在王安石致仕时，他可以进一步成为宰执。但问题是，出现了宋神宗这个最大的变数，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用四十九岁的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掀起变法，打破了政坛相对平稳的代际更替，也让士大夫的分裂加深，出现了严重的新旧党争，也导致了苏东坡命运的波澜。

王安石是宋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关键人物，率先提出儒学乃是“道德性命之学”，开宋代“义理之学”的先河。王安石的女婿蔡卞说他“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比起之前研讨儒学的众人，王安石的著作更多，思想更成体系，影响也更大。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得君行道”，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把自己的儒学思想运用于现实制度、政策，提出对内要“一道德、同风俗”“大明法度、众建贤才”，通过“理财”让朝廷掌握更多财富用于强军练兵，展开对西夏、辽国的开边战事，以此实现儒家所云“内圣外王”。

王安石的“新学”和“新法”是北宋晚期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三任皇帝贯彻近半个世纪的政策，其中只有宋哲宗登基之初在太皇太后高氏主持下被废除八年而已。苏氏父子和王安石之间的分歧，涉及私怨、政见差别、学术思想竞争等种种纠缠。就私怨而论，嘉祐元年（1056），苏东坡随父亲入京备考科举时，他的父亲苏洵就与王安石有了私怨。因为当时欧阳修公开称赞苏洵的文章类似荀子，眼高于顶的王安石不以为然。王安石熟悉孔孟儒学经典，自负博学，觉得苏洵的文章讲的是战国游士、纵横家权谋那一套，并没有深刻的经学修养，便故意要在众人面前压苏洵一筹。一次欧阳修举行宴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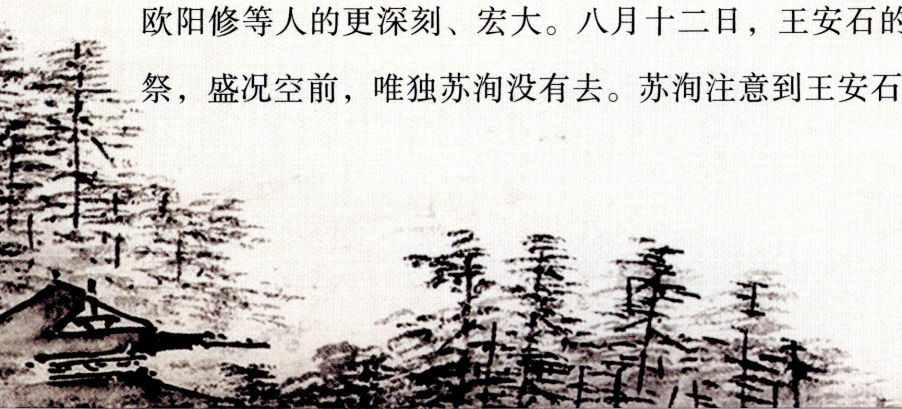
为担任吴江知县的裴煜饯行，请梅尧臣、王安石、王安国、焦千之、苏洵等人作陪。席上八人分别以“黯然销魂惟别而已”八个字押韵作诗，苏洵分到“而”字并作了一首诗。王安石除了写自己分到的“惟”字韵的诗，又当场多作一首押“而”字韵的诗，有故意显才之嫌，让苏洵有点儿难堪。苏洵长于撰文而拙于赋诗，并没有与别人比较的心思，却遭到王安石如此对待，他大觉愤懑，不知道这人为何如此失礼。王安石喜谈经术，苏洵好言兵，王安石觉得苏洵兜售的是战国纵横家那一套阴谋权术，因此屡次当众讽刺苏洵的文章、学问，苏洵自然有所耳闻，越发厌恶王安石，只是苏洵一介布衣，人微言轻，不便公然作对罢了。

嘉祐六年（1061），苏东坡考中制科第三等，苏辙考中第四等下。王安石对此也有异议，他看了苏东坡上交的二十五篇策、二十五篇论后，与另一位官员吕公著议论时，说苏东坡的观点全然类似“战国文章”，这便是王安石对苏洵文章的看法。苏东坡和他父亲一样，习惯把具体的人物、政策放在当时的具体历史场景中，分析利弊、如何取舍。这在王安石看来，苏东坡就像战国那些游走各方的游士、纵横家一样，缺乏一以贯之的原则性理论，没有从经术引申出的完整体系，所以王安石说如果自己担任御试考官，一定不会取中苏东坡。这反映出王安石和苏东坡两人的气质、观念的差别：王安石有一整套相对完整的哲学、政治观念，而苏东坡对整体性的观念体系并不太感兴趣，或者说，他并不相信存在无所不包的单一观念、制度，可以指导世界如何运转，规定人们如何生活和思考。

苏辙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时，轮到知制诰王安石撰写他的任命公告，可王安石觉得苏辙在制科考试中极言朝政得失，涉及宫禁之事，有袒护宰相韩琦而攻击宋仁宗之嫌，将其视为西汉末年依附权臣的谷永一类人物，不肯撰写任命公文。韩琦听了他的话，笑着反驳说：“苏辙在回答中说现在的宰相不中用，盼望有唐初娄师德、郝处俊那样的名相来治国，怎么能说他是谷永那样的人物？”于是上级换了另一位知制诰起草苏辙的任命书。苏东坡寄去《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安慰弟弟“答策不堪宜落此”“策曾忤世人嫌汝”。

此时韩维、吕公著、司马光、王安石四人互有来往，号称“嘉祐四友”，其中王安石任度支判官、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他既熟悉经史，又能文擅诗，以学问渊博、见识远大著称，朝野许多年轻士人对他的才学颇为敬仰。苏辙遭到在京城颇有声望的王安石如此非议，心中气恼，索性以就近侍养父亲的名义请求不去赴任，表明自己并非贪图官位之人。这一事件反映出王安石对苏氏父子的另一种看法，他认为苏氏父子结交欧阳修、韩琦，是依附讨好高官。而在苏氏父子看来，王安石是有意为难苏辙。

到嘉祐八年（1063），王安石的名声越来越大，他撰著的《淮南杂说》十卷、《洪范传》逐渐传扬，率先提出一整套从天地起源之理推导到儒士道德和使命、国家制度变革的新学说。王安石的这套关于道德、性命的“新学”在文士间越来越有影响力，甚至有士人将其比作孟子再世，认为其理论比前辈欧阳修等人的更深刻、宏大。八月十二日，王安石的母亲吴氏在京城病逝，汴京的士大夫纷纷前去吊祭，盛况空前，唯独苏洵没有去。苏洵注意到王安石有如此声望，未来极有可能位居执政，掀起波涛，



水問山尋

于是写了篇《辨奸论》，描述“有人”以“造作言语，私立名字”著称，被一些不得志之人尊为“颜渊、孟轲复出”，这明显是指王安石。苏洵还提到一些京城士人众所周知的细节：王安石经常不洗脸、不洗衣服就与士子晤谈，常人觉得这表明王安石简朴而不拘小节，但是苏洵认为这些行为本是“丧礼”中哀伤过度的孝子行为，平时这样就显得虚伪做作。他担心未来“愿治之主，好贤之相”举荐和任用王安石后，给天下造成祸患，就像西晋的王衍、唐代的卢杞一样危害国家。苏洵以预言般的口气说，将来此人被任用时，众人就会佩服自己的预测。

苏洵这样看王安石，有多方面的原因。从私人关系而言，之前王安石轻视苏洵，甚至当众给他难堪，后来又拒绝撰写苏辙的任命书，把苏辙说成西汉谷永一类的奸臣，苏洵当然十分不满，于是颇为针锋相对地说王安石才是“大奸慝”；就士人风气而言，苏洵从见客不洗脸这类细节发现王安石的性格“与人异趣”，进而推论出王安石执政的风格——不愿与众人一样秉持常情常理，要么是有意做作，要么就是内心格外坚定乃至偏执，认为自己的信念或理念体系高于一切，为此宁愿牺牲常情常礼。除此之外，苏洵与王安石的分歧还有文人对学术思想的不同追求。

到了熙宁二年（1069），苏东坡再次入京为官时，王安石已经成为参知政事，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主持变法。宋神宗最初对苏东坡印象尚佳，苏东坡多次上书对新法的政策提出意见，随后遭到王安石一派官员的打压。王安石多次在宋神宗面前说苏东坡、苏辙兄弟的学问“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即战国游士的那一套权谋，还认为宋神宗要对苏东坡这样的官员进行调教，让他变得顺从。每次有其他朝臣推荐苏东坡、苏辙出任更重要的官职，王安石掌控的中书省都竭力反对或者拖延，让事情不了了之。

熙宁三年（1070）八月五日，王安石的亲戚、侍御史谢景温上奏章弹劾苏东坡，诬告他五年前护送父亲棺木回四川时，曾在船上装载私盐、苏木、瓷器等，贩运牟利，还违制借用地方官府兵丁押送。谢景温抓来沿途护送苏东坡兄弟一行的水师兵丁，以及在长江给苏东坡兄弟撑船的船夫审讯，千方百计要证实苏东坡兄弟的罪责。这件事惹得京城官场议论纷纷，苏东坡的名誉大受影响。兴师动众调查两个多月，查明苏东坡并无贩运私盐、苏木的举动，仅发现他曾顺路乘坐眉州派出迎接其他官员的公家船只回家而已。王安石的这些举动，改变了宋神宗对苏东坡的印象，宋神宗曾对为苏东坡辩护的司马光说“苏东坡非佳士，卿误知之”。

此后，苏东坡于熙宁四年（1071）六月外任杭州通判，之后历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元丰二年（1079）年底，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在此期间，王安石于熙宁七年（1074）六月第一次罢相，熙宁八年（1075）二月再次拜相，熙宁九年（1076）辞去相位，从此闲居金陵（今江苏南京）。王安石的性格的确执拗，在朝期间与其政坛追随者曾布、章惇、吕惠卿都分道扬镳。闲居金陵后，王安石以游览、作诗、谈禅、著述为乐，主要来往的是王浚之、甥婿龚原、侄婿叶涛、女婿蔡卞、



蔡肇、陆佃等年轻士人。王安石辞相后，苏东坡已经以诗文名满天下，王安石经常能得到苏东坡诗文的抄本、刻本，就其中一些文字做过点评，写过次韵诗，苏东坡本人也有所耳闻。

元丰七年（1084），苏东坡奉命从黄州北移汝州，他一路缓缓行走。七月初，苏东坡带着家人抵达了金陵。此时江南天气湿热，他们一路行船也有些劳累，苏东坡的痔疮病犯了，几日后身体稍微好些，才出去会见当地官员、朋友。苏东坡两次在白鹭亭的柱子上题诗，还去赏心亭、蒋山（今钟山）、秦淮河、天庆观（今朝天宫）等处游览，与前后两任江宁府知府陈睦、王益柔等人有往来。

此时，金陵城中最著名的士人是王安石，他是品级最高的致仕官员，挂着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特进、荆国公的头衔，亲近的士人都尊称其为“王荆公”。王安石在江宁南门外七里处的半山修了一处小宅子，平时大多住在那里，常骑着一头驴，带着书童在蒋山附近游览。这一年，王安石生了一场大病，痊愈后上书请求把自己在半山的房子和周围的土地捐为佛寺，为宋神宗祝寿，宋神宗御赐寺额“报宁禅寺”，王安石自己则搬到城内的宅子居住。

苏东坡是晚辈，决定主动一点儿，七月十一日，他把自己近来作的《归去来并引·送王子立归筠州》等数篇诗文抄写一遍，托人呈给王安石，“以发一笑而已，乞不示人”。王安石早就听说苏东坡的船停在白鹭亭，见苏东坡如此主动，便骑着驴前来江边驿馆拜会。苏东坡见到名帖，没戴帽子就急忙出来行礼，说：“我今天就以平民服装拜见您。”王安石笑说：“礼法不是为我们这样的人设立的。”两人一个贬谪无公事，一个致仕在家，的确没什么必要按照官场礼节交往。

两人在京城为官时，观念相对、派系不同、年龄有别，王安石还讽刺过苏东坡的父亲、为难过苏东坡的弟弟，所以那时见面也无话可说，只是按照官场礼节长揖，略略寒暄而已。如今，苏东坡与王安石都不再是政坛上的活跃角色，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一个前途未卜，一个日暮残年，交往也随性了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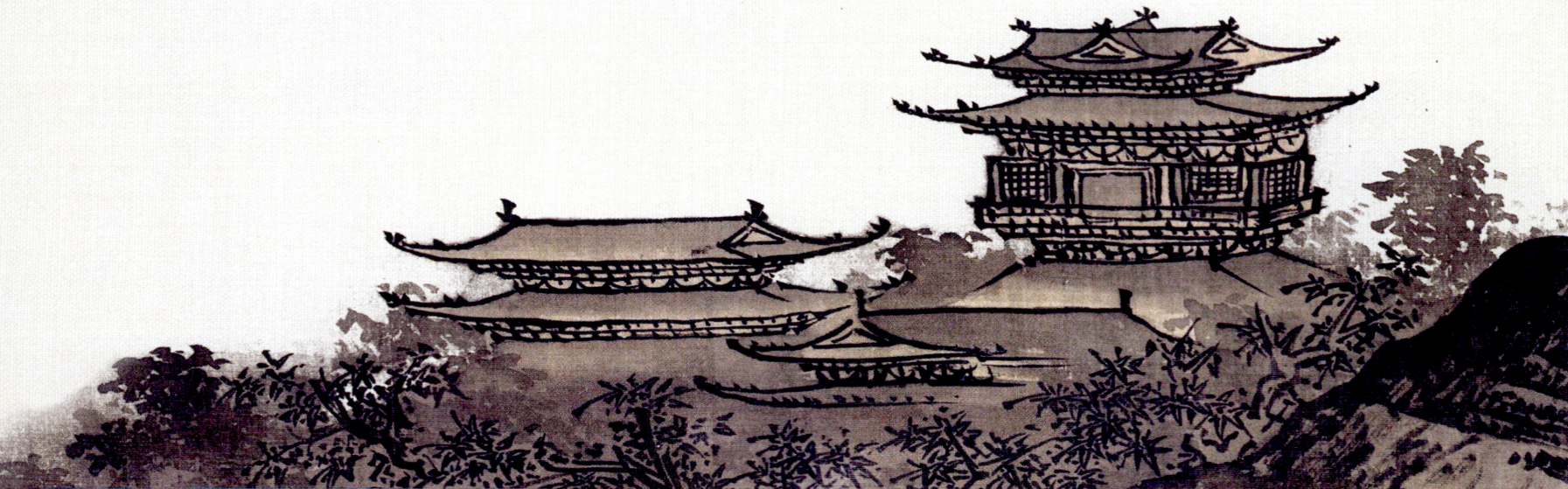
水問山尋

外人看来，这是当世两大名士的相遇。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挟宰相之势主导朝政，又把《三经新义》变成官学和科举的通用教材，成了处朝堂之高的士人代表、新学和新党的领袖，影响万千士人，但也因此得罪了许多人。不满新法和朝廷的士人、百姓会把变法期间大大小小的错误、罪责归结到王安石头上，非议他的德行、学问。而苏东坡长期徘徊于地方，饱受打击，却凭借自己超拔的诗词、文章成为众人口耳相传的名士，在文学上被视为欧阳修之后的第一人，在旧党中的地位几乎可与司马光并称，这是当年小看苏东坡的王安石没有料到的。苏东坡几乎是凭借着自己文学方面的才情在隐隐与新党的威势抗衡，许多人也都同情他的遭遇。

不当宰相以后，王安石绝口不提政事，不愿浪费口舌争辩，兴趣转移到游览、作诗、谈禅、著述方面。他素来自信，觉得自己的经学超出同侪，诗文也可傲视群雄。王安石擅长转化前人字句，时有佳作，最擅长五言律诗、五言绝句，苏东坡也觉得他的这类诗歌别有风味。

他们相约见过好几次，还一起应陈睦之邀游览蒋山。闲谈时，王安石说苏东坡在密州写的《雪后书北台壁二首·其二》中“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之句用的是道教典故，道家称人的肩膀为“玉楼”，称人的眼睛为“银海”，苏东坡一笑。实际上，王安石之前已针对苏东坡的这两首诗作过六首次韵诗，苏东坡知道后也作了两首诗回复。苏东坡虽然敬佩王安石的博学，但对他的次韵诗颇不以为然，觉得他并不理解自己写那两首诗的深意。王安石也向苏东坡出示了自己的得意之作，苏东坡看后称赞其中“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二句是《离骚》的句法，自从屈原、宋玉死后，一千多年没有人这样写作了。王安石欣然认可，说：“不只是子瞻你夸我，我自己也是如此认为，只是从来没有和凡俗之人说过而已。”王安石写诗喜欢从前人著作中摘取字句，一般人难以看出其中的渊源，他也以博学自傲，如今与苏东坡相谈才算棋逢对手。

两人闲聊《三国志》时，王安石觉得给这本书做注释的裴松之比原作者陈寿更为博通，但他没有自己单独写史书，仅给《三国志》作注，所以名气在陈寿之下。王安石说自己以前有意重修这部史书，可惜现在老了，没有精力写了，现在除了苏东坡，其他人干不了这件事。苏东坡回说自己并不擅长“讨论”，把这个话题敷衍过去了。显然，两人彼此都有保留，苏东坡并没有告诉王安石他已经撰成《易传》《论语说》，王安石劝说苏东坡撰写史书，心下或许以为苏东坡对儒经并无精深研究，仅仅擅长写诗词、文章，熟悉《史记》的体例和写法，所以可以撰写这类史书。



几次相会之后，王安石对苏东坡的了解加深了不少，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他还出言劝苏东坡在蒋山买地，与自己结邻而居。

八月中旬，苏东坡决定离开金陵北上，与王安石告别时，王安石让苏东坡念诵近来的诗作，自己依次写下来赠给苏东坡保存；然后念诵自己近来的诗作，请苏东坡写下来留给自己。这样，他们彼此有了对方的手迹，当作留念。

八月十四日，苏东坡一家离开金陵，在路上，苏东坡寄去自己写的《次荆公韵四绝·其三》：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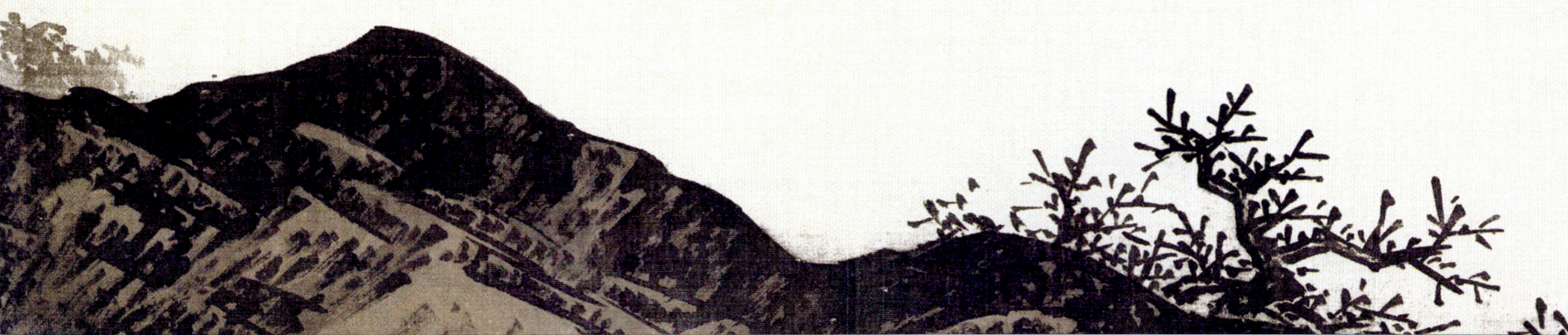
苏东坡感叹，十年前王安石致仕时，如果自己与他相邻，想必会有许多快乐。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尽管之后苏东坡两次经江南运河南下北上，离金陵并不远，可是他没有再去拜会王安石。他们彼此都知道，他们并非同一类人，可以遥遥互相欣赏，却注定无法成为亲密的友人。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在金陵故去。此时旧党当权，旧日门生大多避谈王安石，只有门人陆佃等少数几人不避嫌，在汴京遥祭王安石。张舜民在《画墁集》卷四《哀王荆公》中就此感叹“恸哭一声唯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生了病的司马光听闻王安石故去，建议朝廷给予优厚礼遇，朝廷褒赠王安石为司空，苏东坡受命草制，他在《王安石赠太傅》中云：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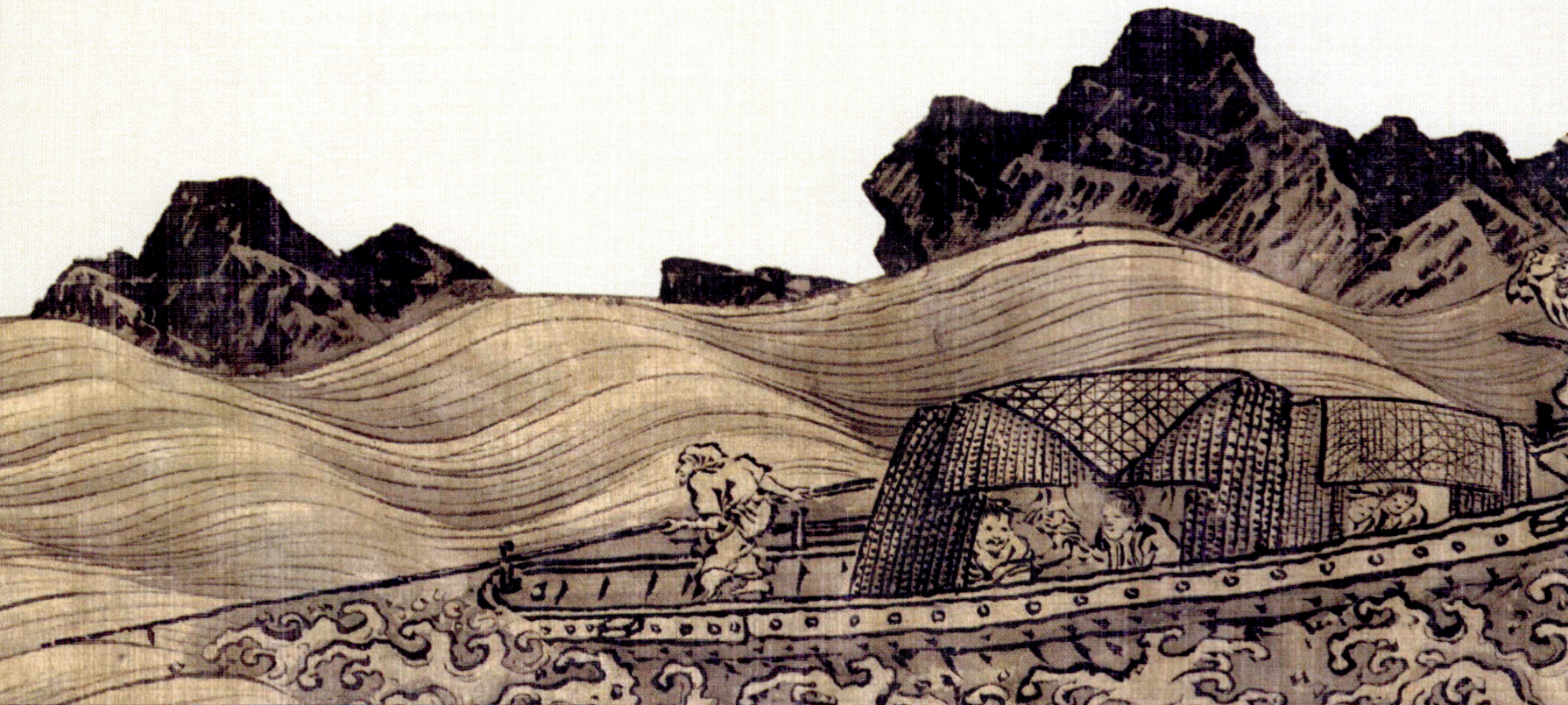
水問山尋

学术：苏王竞争

嘉祐五年（1060），苏东坡、苏辙为母亲守孝期满，与父亲苏洵再次回到汴京。两兄弟准备制科考试时，正值王安石等人热衷谈论儒学概念、解释义理，他正在撰著的《易解》《老子注》也在士人中有所流传，苏氏父子也有所耳闻。

受到这股风气的影响，苏洵也开始撰写解释《周易》的书稿《易传》，这是他晚年最重视的著作。推测其用心，或许不无与王安石竞争的心思。苏洵之前受过王安石的轻视，王安石抨击他的所学是战国纵横家之术、之言，自以为博通儒学，而苏洵决心以自己的研究理念注解《周易》，体现自己对经典的研究功力，有与王安石唱对台戏的意味。苏洵对此书极为重视，写了一百来篇关于《易传》的文稿，计划共由十卷组成。他觉得自己干的是“拨雾见日”的工作，在《上韩丞相书》中云“此书若成，则自有《易》以来未始有也”，觉得自己的著作成就一定能超越王安石等人。可惜，苏洵还未写完此书，就患了重病，治平三年（1066）四月临终之际，他叮嘱苏东坡把自己未完成的《易传》继续写完，苏东坡在父亲床前哭泣着答应一定完成父亲的遗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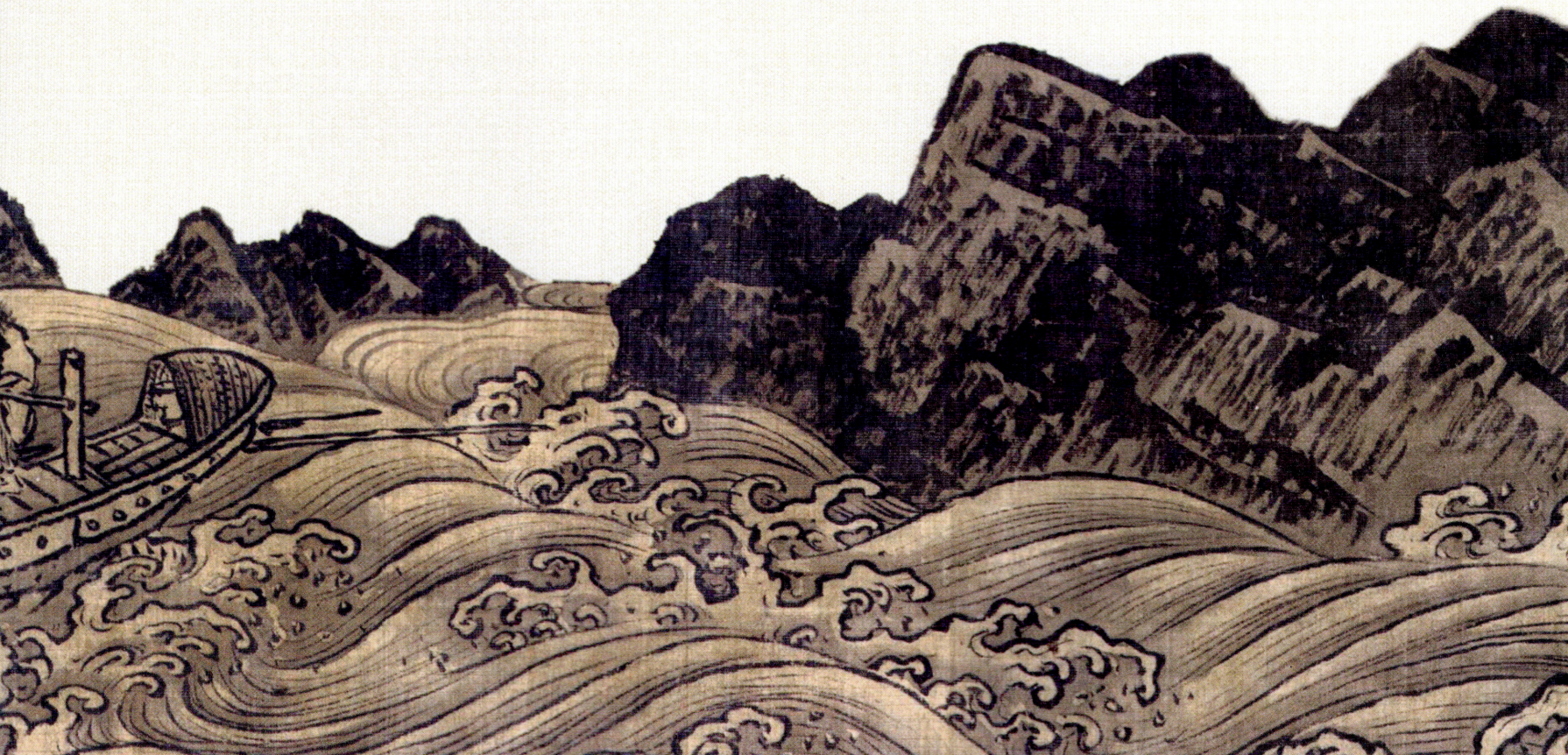
熙宁年间，王安石在朝中为相，集政治权威与学术权威于一身，自然跟随者众多。宋神宗和王安石对各种“私学”影响舆论感到不满，希望通过改革科举考试科目、学校制度的方式统一思想。熙宁四年（1071），科举考试取消了诗赋，主要考核儒家经典。自熙宁五年（1072）开始，朝廷着手编撰官方教材，熙宁六年（1073）三月设置经义局，按照王安石的思想和方法修撰解释《诗经》《尚书》和《周礼》，成书为《毛诗义》《尚书义》《周官新义》。其中《毛诗义》《尚书义》由王安石之子王雱、弟子吕惠卿共同编纂，《周官新义》由王安石亲自撰著，合称《三经新义》。熙宁八年（1075）六月，朝廷颁发《三经新义》和王安石《字说》到全国各级府学、县学，作为学校教学的教材及科举考试的主要参考。王安石的新学因为得到朝廷的支持，成为北宋后期五十多年儒家诸学派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派。



苏东坡虽然答应了父亲撰写《易传》，可是他在为父亲守孝期间似乎并未动笔，后来在汴京、杭州等地为官，忙于政务、写作诗词，也没有留心此事。直到元丰三年（1080）被贬谪黄州后，苏东坡有了大把时间从事著述，他与弟弟苏辙相约各自注解三部儒家经典，苏东坡注解《周易》《尚书》《论语》，苏辙注解《诗经》《春秋》《孟子》，另外还计划注解《老子》。他们如此计划，或有两重原因：一是可能觉得仕途无望，希望能以著书立说的方式“立言”，影响后人；二是解读儒家经典是此时许多士人热衷的事情，苏东坡兄弟这样做，有与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以及《老子注》竞争的意思，他们不满王安石的解释，希望能提供另一种思路。

苏东坡的工作效率很高，次年就完成了《易传》九卷的初稿。他在其中引用了《庄子》中的许多概念，如“大全”“无心”“虚”等，论证道源乎情，人性本于人的自然性，因此并无善恶；礼仪道德应该基于人性，治国也应该顺应人性，隐隐反对如王安石那样强行以单一理念区分善恶和压制言论，主张要顺其自然、容纳异议、和而不同。他对自己在这本书中的创见非常自信，唯一遗憾的是，《易》中涉及卦象推演的部分需要借助数学推算，而他并不精通此道，这一方面的论述难免粗略。他能这么快完成，也是因为有父亲的遗稿，而且他还利用了一部分弟弟的稿子，如其中解释“蒙”卦的部分就主要源于苏辙。同时，苏东坡还撰著《论语说》五卷，为此还把弟弟以前摘抄的《论语》有关注解的草稿借来参考。

苏东坡极为重视《易传》《论语说》《书传》三部著作，遇赦北上时随身携带。他去世之后，苏辙也在《祭亡兄端明文》中强调了这几部著作的价值：“兄之文章，今世第一。忠言嘉谟，古之遗直。名冠多士，义动蛮貊。流窜虽久，此声不没。遗文粲然，四海所传。《易》《书》之秘，古所未闻。时无孔子，孰知其贤。以俟圣人，后则当然。”苏辙特意强调了苏东坡的文章和《易传》九卷、《书传》十三卷这类解释儒家经典的著作，在他眼中，这是比诗、词、赋更重要的成就。但是对后世的读者来说，更喜欢的是苏东坡写景、抒情、表达个人感受的那些诗、词、赋，而不是这些解释经典的学术文章。



水問山尋

吕惠卿：虫臂鼠肝

吕惠卿是泉州南安人，与苏东坡同年考中进士，也曾出入欧阳修门下。欧阳修引荐他认识了王安石，嘉祐六年（1061）欧阳修又举荐他参加馆职考试，故而，他也算是欧阳修看重的门人之一。

熙宁二年（1069）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后，参知政事王安石引荐吕惠卿为该机构的检详文字，参与草拟新法。吕惠卿得到宋神宗、王安石的赏识，一年之间就从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看详中书编修条例、著作佐郎、编校集贤书籍升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成为常常和宋神宗见面的近臣。苏辙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当检详文字时，就一些具体政策、文书内容与吕惠卿等有争论，故而苏氏兄弟与之逐渐有了私怨。之后，苏东坡在呈送的《上神宗皇帝书》中指出宋神宗为了快速见到变法的成效，招揽“新进勇锐之人”，用提升官职来鼓励他们冒进，如新设的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纵容吕惠卿、曾布等“六七少年”编制青苗、方田均税、均输等“言利”之法，让四十多个使者以增加官府财税为目标，四处宣喻、监督官员，使得天下官吏及民众惶惑不安、议论纷纷。他劝说宋神宗取消制置三司条例司，以“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之后苏东坡被排挤到地方任职，而吕惠卿成为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助手，历任要职。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推荐翰林学士吕惠卿出任参知政事，成为嘉祐二年（1057）进士中第一个成为宰辅之人。

苏东坡到密州当知州时，碰上吕惠卿大力推行手实法，该法本意是为确定向民众征收的助役钱数目：官府设立“五等丁产簿”，让百姓申报田亩、屋宅、资货、畜产的数额，以便分等登记入册，随后官府依此标准征收助役钱。为防止有人申报时隐匿资产，朝廷鼓励民间互相告发，以被告人虚报资产的三分之一奖赏告发者，于是民间兴起检举的风气，其



中许多都是恶意诬告或者仇家挟怨告状。这导致各地的官司数量骤增，官员都很苦恼，但司农寺派出使者在各地督促州县施行手实法，不积极推行者以“违制”论处。担任密州知州的苏东坡对此极为不满，面对司农寺派出的官员，他说朝廷并没有明确规定这是违制行为，司农寺这是擅自解释法律。于是这些官员回去请示，不敢为难密州官员。吕惠卿也竭力打压苏东坡，天章阁待制李师中上书建议宋神宗任用司马光、苏东坡、苏辙等人，引起吕惠卿的不满，游说宋神宗把李师中贬为和州团练副使。

熙宁八年（1075），吕惠卿和王安石的关系出现裂痕。吕惠卿借郑侠再次上书议论新政之机，追查《流民图》背后的主使者，把与郑侠认识的冯京、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等人都牵扯了进去，导致参知政事冯京外放到地方任知州，王安国遭削职放归乡里。有人猜测吕惠卿这样做是为了当宰相，也有人觉得他是担心王安石再回朝任相，自己的权力会大受影响，于是采取种种诡计陷害王安石。这年三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重新担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安石再次成了宰相。由于王安石对吕惠卿有所不满，几个月后，听闻风声的御史、谏官便找事由上书弹劾吕惠卿及其党羽，吕惠卿的弟弟吕升卿被降职去京外担任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十月初，吕惠卿丢了参知政事的副相之位，被派去陈州当知州。随后，吕惠卿倡导的手实法也被撤销。在密州的苏东坡对王安石、吕惠卿的分裂有所耳闻，创作了《王莽》《董卓》等貌似咏叹史实的诗歌讥讽新法派诸人，影射王安石如王莽一样“入手功名事事新”，吕惠卿则同吕布一样是善变无信之人。

熙宁九年（1076）六月，宰相王安石和儿子王雱唆使御史借一桩案件罗织陈州知州吕惠卿的罪名。不料中书省的小吏偷偷把消息快马加鞭透露给了吕惠卿，吕惠卿又怕又怒，写了几十页奏折，上书指责王安石以“纵横之末术”弄权，揭发王安石“罔上要君”的旧事，把王安石从前与自己的往



宋　马远　华灯待宴图

来书信、便条呈交给宋神宗，其中提到王安石得知有民众断指自残来躲避保甲法，于是写便条提醒吕惠卿“勿令上知”，即不能让宋神宗知道这件事。宋神宗虽然装作不在意，但对王安石有了看法，对他不再如几年前那样信任。恰逢此时，王安石最为钟爱的长子王雱因病在京而逝，他心中悲伤，无意继续执政，连续上书四五次请求辞去相位。宋神宗开始没有同意，拖了几个月，十月才免去了王安石的相位。

吕惠卿之前依靠王安石的信任一路高升，如今又拿出王安石给他的私信检举，这让王安石深悔错信了他，宋神宗也对吕惠卿的举动有了戒心。元丰五年（1082），吕惠卿曾写信给王安石，希望化解嫌隙。王安石在《答吕吉甫书》中说如今吕惠卿还有心进取，而自己是衰病养老之人，“趣舍异路，则相呴以湿，不如相忘之愈也”，这是拒绝与之联系之意。元丰年间，王珪、蔡确等人当政，也都厌恶吕惠卿的品性，不敢引其入朝，于是他一直都在京外辗转为官。

元祐元年（1086）旧党当政时，苏辙等台谏官员多次弹劾太原府知府吕惠卿违赦擅自出兵等罪责，朝廷两次下诏，将吕氏贬谪。六月二十三日，轮到时任中书舍人的刘攽撰写贬谪吕惠卿的公告，苏东坡主动对他说：“我当了这么多年刽子手，今天才碰到一个该斩杀的人啊。”意思是吕惠卿罪大恶极，自己想来写这篇文章。刘攽便称病，把写公告的事交给苏东坡。苏东坡在《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中称吕氏是“元凶”，为人“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抨击他推行新法、危害地方、背叛王安石等等，将其形容为言行毫无可取之处的穷凶极恶之人。“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天下”，这是连带着也抨击了王安石的“欺君”行为。苏东坡一时兴起就好争意气的性格，并没有因位居高位而改变。他在代朝廷起草的这类文章中常常不够四平八稳，有一些自行发挥的言辞，容易引起别人的敌视和仇恨。

这篇公告登载在邸报上在各地传播，吕惠卿对此自然怨恨。吕惠卿到建州后给宋哲宗的谢表有说“龙鳞凤翼，固绝望于攀援；虫臂鼠肝，一冥心于造化”之言，比喻苏东坡兄弟与自己所争的是虫臂、鼠肝这样的利益。苏东坡在邸报上看到这篇文章，笑说：“这个人难以相处，可终究也算会写文章之人。”

绍圣元年（1094），苏东坡被贬后，赋闲的吕惠卿上书弹劾苏东坡“讥斥先朝”的旧事。之后，吕惠卿的弟弟吕温卿出任两浙转运使时，先后罗织与苏东坡交好的平江府通判钱世雄、常州知州廖正一的罪名，希望牵连到苏东坡、张邦基等，导致钱世雄、廖正一两人都遭贬官。吕惠卿虽然一直想回朝，可是宰相章惇、曾布都排斥他。崇宁五年（1106），吕惠卿之子吕渊因听到妖人张怀素的话却不揭发而获罪，被发配沙门岛。吕惠卿也被牵连遭贬谪，后以观文殿学士、醴泉观使身份致仕，于政和元年（1111）去世，终年八十岁。

范镇：同乡前辈

嘉祐二年（1057），苏东坡、苏辙在汴京考中了省试，范镇是副考官之一。试后，苏东坡兄弟一一拜会各位考官，从此与范镇有了来往，因范镇是四川人，两家来往更为亲切。苏东坡称范镇是“吾先君子之益友也”。

范镇是宝元元年（1038）进士，素以文辞、敢谏著称。嘉祐六年（1061），苏东坡、苏辙兄弟参加制科考试，分别考中第三等、第四等，初试考官是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权御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御试考官是胡宿、沈遘、范镇、司马光、蔡襄。故而范镇与苏氏兄弟又一次有了师生之谊。

熙宁二年（1069），担任翰林学士的司马光、范镇都对王安石变法有异议。范镇五次上书反对新法，指出“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让王安石大为愤怒。苏东坡也屡次上书反对新法，范镇因此对苏东坡非常欣赏，与司马光上书推荐苏东坡出任谏官，希望苏东坡能发挥更大作用，这也引起王安石等人的警惕和反对。熙宁三年（1070），宋神宗再次让官员推荐可以担任谏官的人选时，范镇又一次推荐了苏东坡，因王安石在背后劝阻，并没有得到宋神宗的认可。同年，范镇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对朝局不满，上书请求致仕。宋神宗对范镇颇有不满，令他降低官衔以户部侍郎的官职致仕。

苏东坡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当官时，与致仕的范镇不时有书信往来。苏东坡述职路过汴京时，曾借住范镇在汴京的别业“东园”。

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因为“乌台诗案”被关押审讯时，范镇主动上书为苏东坡辩白、求情。之后苏东坡被贬谪黄州，范镇也因为收受苏东坡讥讽朝政的文字，被罚铜二十斤。范镇非常关心在黄州的苏东坡，听说他在黄州经常生病，又与僧人往来，就来信劝说他戒酒、远离佛教之说。听说苏东坡为一家老小的生计考虑，想要买田置地，就写信劝他来自己所在的颍昌定居。苏东坡去信托他打听合适的地方，想把自己在汴京市价约八百贯钱的宅院南园卖掉，在颍昌买地造屋。

元丰六年（1083）四月一日，在江宁给母亲守孝的曾巩因病去世。十几天后消息传到汴京，竟谣传黄州的苏东坡和曾巩于同一天去世，都被神仙招到仙界去了。致仕闲居颍昌的范镇听到传言以后十分悲痛，举起袖子大哭不已，立即召集子弟，准备银钱，要派人去苏家吊唁。子弟劝他不要着急，先派人去黄州看看情况虚实再做决定，这才没有闹出笑话。

元祐年间，苏东坡回到京城为官，与范镇的从子范百禄、侄孙范祖禹多有交往。元祐三年（1088）闰十二月一日，范镇在颍昌逝世。他是苏东坡尊敬的同乡前辈，对苏东坡多有提携，两家还是姻亲。苏东坡十分悲痛，写了《祭范蜀公文》，又应范家之请作《范景仁墓志铭》。

刘攽：玩笑过招

治平二年（1065），苏东坡从凤翔回到京城，以殿中丞身份兼职直史馆，常与史馆中的诸位博学之士往来。苏东坡跟言语犀利、喜欢说笑的刘攽最谈得来，经常一起研讨经史、互开玩笑。

刘攽与哥哥刘敞同时考中庆历六年（1046）的进士，在州县当了二十年地方官，被调到京城担任国子监直讲，以六品员外郎充任馆阁校勘，职位比苏东坡低。刘攽在仕途上的不顺，与其喜欢说笑的性格有关，他常在不经意间得罪其他官员。

熙宁四年（1071），刘攽写信讽刺王安石变法，遭外派任泰州通判。在刘攽的饯别宴上，苏东坡心有所感，吟诗劝告刘攽仿效阮籍，出言不要涉及人物好坏，免得招来祸患。在场同僚都有点儿惊讶，苏东坡这等于是讽刺王安石如司马昭。 此后苏东坡与刘攽一直有书信联系。元丰二年（1079）年底，苏东坡被贬黄州，担任京东转运使的刘攽也因为收受苏东坡讥讽朝政的文章，被罚铜二十斤。

元祐年间，两人同回朝廷为官。刘攽依旧诙谐，给宰相蔡确起了个外号“倒悬蛤蜊”，给体形肥硕的孔宗翰起外号“孔子家小二郎”，又给另一个体形肥壮而又爱好谈论兵事的同僚顾临起外号“顾将军”。苏东坡也爱开玩笑，喜欢点评各种事情。刘攽因为有风疾，眉毛、胡子都快掉光了，鼻梁也塌陷了。某次聚会的时候，苏东坡、刘攽几人各引古人的诗句开玩笑，苏东坡随口就说“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引起众人大笑。

还有一次，苏东坡对刘攽说：“我和弟弟当年备考制科时，每天都吃‘三白’，非常美味，从此觉得所谓‘八珍’没什么好吃的。”刘攽觉得好奇，就问：“什么是‘三白’？”苏东坡回答说：“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小碗米饭，这就是‘三白’啊。”刘攽大笑。过了一段时间，刘攽写便条请苏东坡到家中吃“晶饭”，苏东坡对所谓“晶饭”感到不解，对身边的人说：“刘攽读书多，必有出处。”等到了刘攽家中，见到桌案上只有盐、白萝卜、米饭，才想到这是刘攽开“三白”的玩笑。苏东坡吃了大半，临走时对刘攽说：“明天请来我家，我请你吃‘毳饭’。”刘攽知道苏东坡要戏弄自己，但又好奇，第二天还是去了苏东坡家。两人谈笑多时，过了吃饭的时间，苏东坡还没有招待，刘攽很饿，便催促开饭，苏东坡让他等一下。如此问了三次，苏东坡还是说等一下。刘攽实在忍耐不住，便说：“我饿得忍不住了。”苏东坡慢慢说：“盐也毛，萝卜也毛，饭也毛，三个毛加起来不是‘毳’是什么?!”当时许多百姓发“没”的音类似“毛”，所以苏东坡开了这样一个玩笑。刘攽拍着肚子大笑：“知道你要报复我上次开的玩笑，没想到是这样一招。”苏东坡这才招待刘攽吃饭。类似这样的故事被许多人传开，苏东坡爱说笑的名声越来越大。

元祐四年（1089）三月四日，中书舍人刘攽病逝，他是苏东坡同僚中极为聪明博学且爱说笑的人，和苏东坡能聊到一块去。他离开后，苏东坡在朝中寂寞时也许会想念他吧。

党争之端

宋代党争的开端主要源于王安石变法，这场变法引发了北宋政治史上著名的“新旧党争”，新旧党争是北宋中后期政治斗争的重要表现形式，涉及新法的推行与废除、政治理念的分歧以及权力的争夺。这场党争不仅影响了北宋的政治格局，还对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安石变法始于熙宁二年（1069），旨在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解决北宋积贫积弱的问题，富国强兵。然而，变法触动了保守派的利益，引发了激烈的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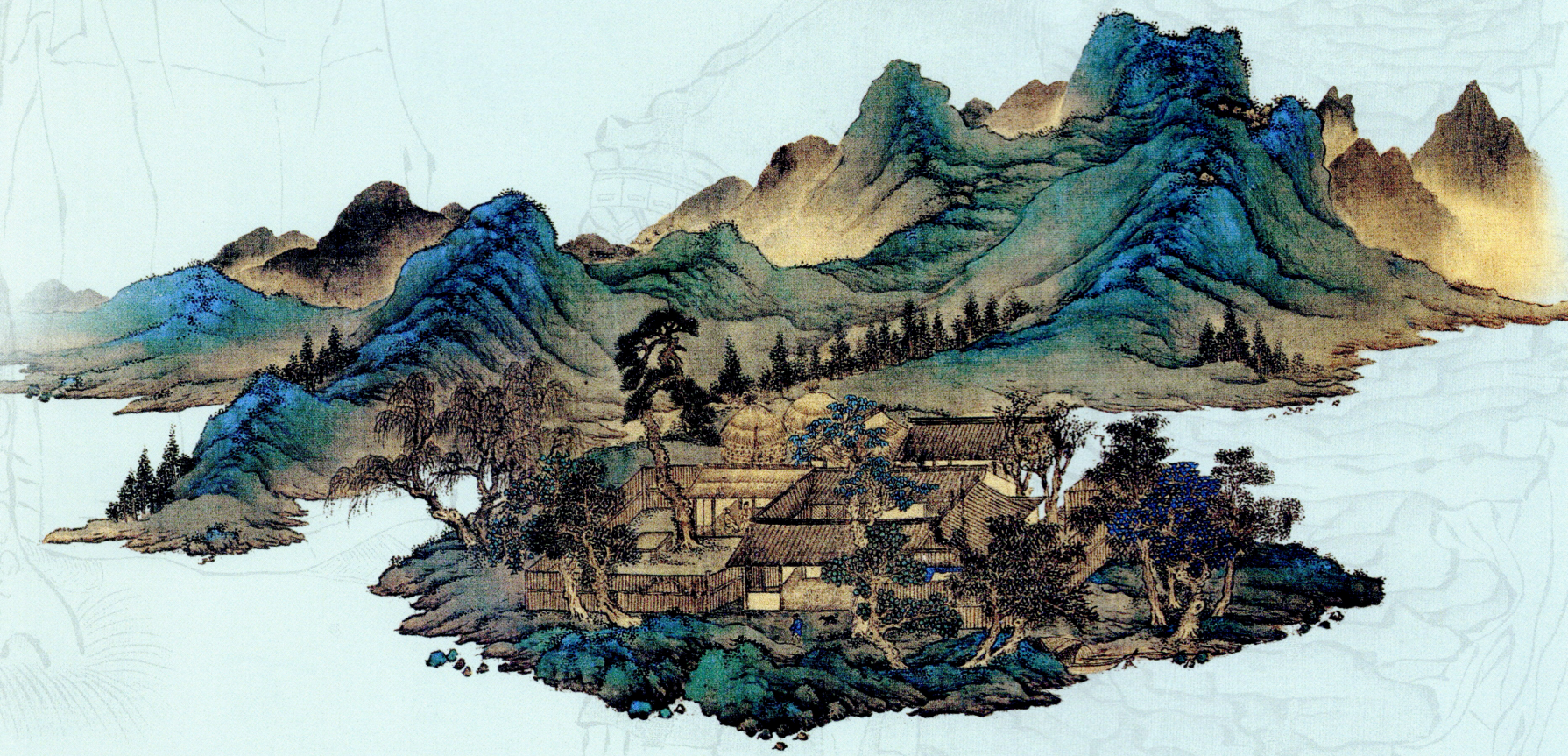
王安石变法初期，新党得势，旧党成员如司马光、韩琦等被贬谪或自请外放。变法过程中，新旧两派围绕青苗法、募役法等新法展开激烈争论。熙宁七年，受天灾等多种因素影响，宋神宗对变法产生动摇，同时新党内部矛盾加剧，王安石被迫辞相。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旧党对新党成员进行打压，新旧两党斗争进一步激化。宋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新党，旧党再次被打压。

宋徽宗即位后，党争仍在继续。

党争导致朝廷内部严重内耗，官员们忙于争斗，无暇顾及国家大事。党争引发社会动荡，民众对朝廷政策无所适从，社会矛盾加剧。党争削弱了北宋的国力，成为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党	旧党
主张	推行变法，主张通过改革解决国家的积贫积弱问题。新党认为，只有通过大胆的改革，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	反对变法，主张维护传统制度和儒家礼教。旧党认为，变法过于激进，会破坏国家的稳定，损害国家的国本。
经济	推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等。	认为青苗法等新法会加重百姓负担，导致社会动荡。
军事	推行保甲法、将兵法、保马法等。	认为新法破坏了国防体系的稳定，会引发内乱。
教育	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推行《三经新义》等。	认为变法冲击了儒家传统，违背了“祖宗之法”。



水問山尋

神宗，北宋第六个皇帝赵顼的庙号《上神宗皇帝书》也题为《上皇帝书》或《万言书》。创作于熙宁二年（1069）年末至熙宁三年（1070）年初。

这篇近万字的文章是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代表作，指出新法实施后的问题，并提出了“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的核心思想。他认为变法的具体措施增加了冗员和冗费，使得民心惶恐，吏治混乱，并批评王安石压制谏官，导致朝廷纪纲混乱。

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是以古之贤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

风俗

风俗：
社会风气。

上神宗皇帝书（节选）

苏轼 作

……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

进言

进言：
给皇帝提供意见。

历数

历数：
指朝代所享的时间。

水問山尋

杭州：人生福地

杭州是苏东坡的福地——他在此写出了大量诗词，得以成为大宋文坛第一名士。

在东南地区，位于钱塘江北岸的杭州是后起的名城。隋炀帝开凿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以杭州为江南运河的南起点，从中原腹地的洛阳可以乘船经常州、苏州到杭州，直达大海。由此，杭州逐渐成为这一区域的枢纽城市，到中晚唐白居易当杭州郡守时，杭州的经济、人口已超过越州（今浙江绍兴），仅次于苏州。五代时期，杭州是吴越国的政治中心，成为东南地区可与苏州并列的地区中心城市。至北宋，杭州依旧是与苏州并称的江南重镇。

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二十八日，苏东坡抵达杭州，开始担任杭州通判。通判是朝廷为制衡知州的权力设立的官职，负责协助知州处理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等事宜的公文，知州政令须通判付署方能生效，通判可向中央直接报告知州的言行、地方政务，两者之间品秩有高低之别，但互相并不隶属。通判和知州一起参与对下级县官的考评，也受到所属的“路”的转运司（俗称“漕司”）、提点刑狱司（俗称“宪司”）官员的监督。他们也可以举荐和弹劾州县官员，由吏部汇总消息，给出对官员的任免、升降建议。

宋　赵伯驹　汉宫观潮图卷（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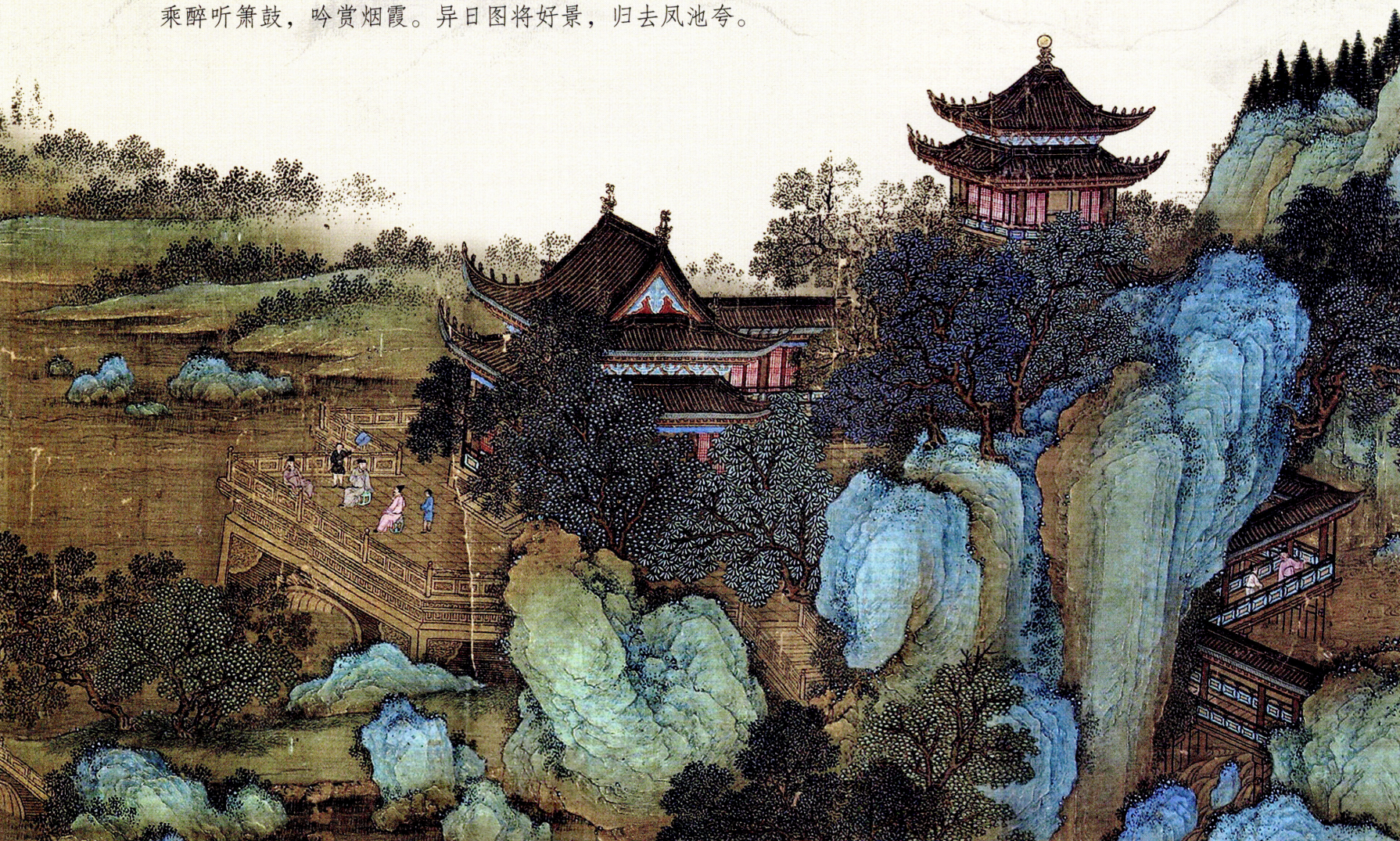
杭州下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富阳、於潜、新城、盐官、昌化九个县，知州官署设于钱塘县的凤凰山下东南角。凤凰山形如张开两翅的鸟，两个山头上各建有一塔，凤嘴处有一座泉水下流形成的水池。登上官署西侧的凤凰山顶，可以“东望海，西望湖”。凤凰山北侧的一片狭长土地，就是人烟繁密的杭州城，包括南部的钱塘县城和北部的仁和县城。杭州城西有著名的西湖及周围的山岭，城东有连绵的滩涂和钱塘江入海口。

杭州的景点大多分布在西湖周围，大致可以分为北、西、南三个区域。西湖北岸有孤山、葛岭、北山三处景点：孤山是西湖西北部一座突出的岛屿，分布着智果寺、玛瑙宝胜院、报恩院、广化寺等寺庙；葛岭上下有招贤寺、寿星院、垂云亭、履泰山、桃溪、栖霞洞等景观；北山则有宝石山等多座山岭，有菩提院、望湖楼、真觉院、法济院、普润寺、昭庆寺等名胜。西湖西部则是大片山岭和溪谷，主要的景区是三天竺、灵隐寺、龙井几处。西湖南侧则有南山的数座山岭，主要包括南屏山、九曜山，分布着净慈寺等寺庙和岩洞。另外，苏东坡经常去游览的还有杭州的吴山、凤凰山、龙山等山岭，龙山之西南有虎跑泉、六和塔等景点。

杭州城在北宋是繁华的商业城市，号称东南第一大都会，人口约有五十万人。沿街店铺、饭馆、酒楼、旅舍众多，从早到晚大街上都人来人往，三四鼓时游人才变少，等到五鼓又变得热闹非凡。柳永曾在杭州游历，他广为传诵的词作《望海潮》这样形容杭州的繁华：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水問山尋

这时的杭州知州是沈立，他曾任签书益州判官，和时任益州知州的张方平相熟。苏东坡私下尊称其为“丈人”，两人关系良好。新法派官员张靓在杭州担任两浙路提举常平，俞希旦在杭州担任监司，苏东坡不喜欢这两人，但在议论公事时不敢与之争议。苏东坡在写给苏辙的《戏子由》诗中形容自己的状态是“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

此时各地都监督官员尽快施行新法，官吏大多对下属和民众很苛刻，苏东坡想要宽大为怀，十分为难。好在担任两浙路提点刑狱的王廷老还算持重宽缓，让苏东坡的一些主张得以施行，也让他免于被监察官员找到把柄。苏东坡因此对王廷老心怀感激。

在公事之余，苏东坡经常到城内外的山山水水、佛寺道观游览。他上任第三天便是假日，就去拜访欧阳修之前介绍过的僧人惠勤，顺带认识了惠思和尚，三人一起闲谈半天，十分愉快。苏东坡在给亲戚的信中形容杭州“物极贵，似京师，圭田甚薄，公库窘迫，供给萧然，但一味好个西湖也”。本来他已在汴京发誓不再作诗，以免惹人非议，可是西湖的美景、会见的人物让他觉得新鲜，一到兴头上还是忍不住赋诗写作。他对所见所闻的风景、民俗、人物、遗迹、故事等都兴趣浓厚，西湖上乘船卖茉莉花和白兰花的女郎、西湖边郁郁葱葱的松树，都出现在他的笔下。

熙宁五年（1072）年初，苏东坡修整了通判官舍原来的两处斋堂，分别命名为“凤咮堂”“方庵”；还带人从凤凰山中挖取了一百多块怪石，在东斋前营造了一座假山，把东斋改名为“溅玉斋”；又在斋堂旁叠石为山，山上面有个孔洞形如凤凰山上的“月岩”奇观，于是把斋堂命名为“月岩斋”。文同接到苏东坡的信札，写了四首诗歌咏它们。

宋代官员经常举行宴会，在招待官员的宴会上，苏东坡经常听歌女演唱曲子词，还认识了词坛大家张先。张先是湖州乌程县（今浙江吴兴）人，此时已八十一岁，致仕十年。他身体强健，经常往来杭州、湖州，以垂钓和创作诗词自娱，是酒宴上的常客。在张先的影响下，苏东坡对写词有了浓厚的兴趣，渐渐地，苏东坡的词也有了一些名气。

杭州远离京城，不再时时受朝局、人事的影响，苏东坡的心情畅快了不少，常常在西湖周边游览，可眺望西湖的望湖楼是他常去的地方。六月二十七日，他在望湖楼上饮酒，醉后一连写了《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云：



水問山尋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苏东坡在这首诗中自嘲如今是“未成小隐聊中隐”，这是从白居易的《中隐》诗中提取的概念。当年白居易在洛阳当闲官，自嘲“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自己只能算是中隐，“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白居易当过杭州刺史，其诗文也带给苏东坡很多启发，无疑是苏东坡在杭州写诗、游览乃至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参照对象。

宋时民间节日极多，春节、上元节、寒食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中秋节、重阳节等日各地风俗不同，但都非常热闹。中秋节后几天，杭州百姓的一大盛事是去钱塘江观潮。钱塘江入海口呈喇叭状，外宽内窄，每年八月潮水高涨，大量海水从江口涌入，在逐渐变窄的江岸的约束下形成一波波潮涌，让海水在短时间内形成一道数米的水岭，一波尚未停息，一波又奔腾而来，声如雷霆，有排山倒海之势。每年八月十八日前后，杭州人都会到江边观看海潮。还有善于游泳的弄潮儿赤膊迎着潮头而去，在浪潮中上下出没，他们分成不同的队伍，手里举着各种颜色的旗帜，看谁在潮头挺立的姿势更潇洒，还能够保持旗帜尾部不被水打湿。因常发生弄潮儿不慎落水而亡的意外，曾任杭州知州的蔡襄作《戒约弄潮文》，严禁弄潮。但这项民俗活动从唐代就开始流行，蔡襄离任后，就几乎没有人再遵守禁令。来潮的那一天，官府不会按照常规关闭城门，也允许外出观看海潮的城中百姓晚归。

中秋时，苏东坡因为负责给解试判卷，无法到江边看潮水，但在中和堂北部的望海楼恰好可以看到海潮，他时常在楼上闲坐喝茶、听涛、望潮，写有《望海楼晚景五绝》，其一、二云：

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指顾雪成堆。
从今潮上君须上，更看银山二十回。

横风吹雨入楼斜，壮观应须好句夸。
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

这些诗歌用词鲜活、想象神妙，懂诗的文士都爱吟诵、抄写，传播广泛。众人这才意识到，原来苏东坡不仅如欧阳修夸赞的那样能文，更是擅诗，从此他的诗名也越来越大。



沈立调任后，陈襄来到杭州担任知州，苏东坡与他相处更为和谐，两人常一起出游、写诗唱和。在政务上，他们也密切配合，苏东坡协助陈襄督导疏浚“六井”等事，极大地改善了市民的日常用水情况。苏东坡对地方百姓的生计颇为关注。到十二月，杭州街道上，人们都开始准备过年的礼品、吃食，一派祥和安乐的氛围。除夕，苏东坡在官署值班，按照惯例要在堂中清点犯人，他从早上一直点名到晚上，见到监狱中关满因为贩运私盐被抓来的民众，感到十分惭愧，觉得自己没有勇气如史书上的前贤那样放罪犯回家过年，为了俸禄又不敢辞官，于是在官署的墙壁上题诗《都厅题壁》：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
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进入熙宁六年（1073），苏东坡经常在西湖边的酒楼上宴客，有一天下了场雨，随后又放晴，他观察到云雨、湖水的浓淡变化犹如女子妆容的改变，于是在《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中，形容西湖如同美丽的西施：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东坡这时已经诗名大盛，其手迹颇受欢迎，成了一些爱诗士人喜欢的收藏品。有书坊商人听说苏东坡的诗在杭州等地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人抄写传播，便找文士收集其诗作，想要刊刻诗集。苏东坡当然有所耳闻，他这两年在杭州见到书坊雕刻印刷的诗文集质量可观，也不反对，很快便有一部《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出现在杭州等地的书摊上。士人们发现，苏东坡不仅是欧阳修口中的文章高手，也是一个想象奇妙、比喻生动的诗人，便有了更多的人传扬苏东坡的文名。

熙宁七年（1074）九月，苏东坡任满离开杭州，去密州出任知州。从熙宁四年十一月至熙宁七年九月，苏东坡在杭州当了两年零十个月通判。杭州是东南最繁华的城市，朝廷各部门大多在这里设有分支机构，来往官员众多，通判的很大一部分公务就是招待南来北往的官员。苏东坡当时虽然才三十多岁，但才华、声望在文坛一时无两，来往官员、文士都希望能和他交流，所以他许多时间都在应付各种酒宴，乃至戏称当杭州通判等于堕入“酒食地狱”。

欧阳修：衣钵传人

欧阳修是在文坛提携苏氏父子的贵人，他把苏东坡视为文坛盟主的传人。苏东坡也不负所望，在欧阳修故去后，领衔北宋文坛约三十年。

苏东坡小时候在天庆观上学时，有人从京师带回《庆历圣德颂》的抄本给老师张易简看，苏东坡正在边上，他随手拿起来低声念诵，询问老师张易简这些诗写的都是谁。老师说："你这么小的儿童，何必知道这些大人的名字？"苏东坡回说："这些人如果是天上的神仙，我是不敢问的，如果他们也是人的话，有什么不可以了解的呢？"老师惊讶于苏东坡的回答，就告诉他这些诗分别歌颂的是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杰"。

从此苏东坡就记住了这几个名字。父亲苏洵在教他写文章时，还曾把欧阳修撰写的文章《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当作范本，让苏东坡草拟一篇同名文章。苏东坡的文中有一句"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引用《诗经》《论语》的典故，表达谦退之意。苏洵十分高兴，说等到苏东坡成为翰林学士，写谢表时会用得上这些句子。

嘉祐元年（1056），苏洵带着苏东坡、苏辙入京后，苏洵携带张方平、雷简夫的推荐信和自己的数十篇文章去拜会了欧阳修。当时五十岁的欧阳修是著名的诗文大家，兼具高官、学者、诗人三重身份，是京城文坛盟主。欧阳修读了苏洵的多篇文章，十分推崇，说自己见的文士很多，但还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他看了《权书》，觉得是与《孙子兵法》一样的奇书；看到《六经论》，认为是荀子才能写出的文章。等到秋天，朝中气氛缓和以后，欧阳修写了《荐布衣苏洵状》，并附带苏洵的二十篇代表性文章上呈宋仁宗，说："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机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欧阳修还引荐苏洵去拜会宰相富弼和文彦博、枢密副使田况等人，这些人有用人之权，可以帮得上苏洵。听说文坛领袖欧阳修盛赞苏洵的文章并举荐他，朝中公卿士大夫纷纷打听苏洵，传抄他的文章，希望能与他晤谈。苏洵顿时在京城士大夫中有了些名声。

嘉祐二年（1057）的进士考试中，翰林学士欧阳修作为主考官取苏东坡、苏辙为进士，故而他们有了座师、门生之谊。欧阳修特别赏识苏东坡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苏东坡、苏辙按照惯例拜访各位考官时，满头白发的欧阳修见到苏东坡后大为高兴，说："别人的文章都不及你啊！"欧阳修赞赏苏东坡的文章和豪迈的谈吐气度，说自己已老，今后的"斯文"有待苏东坡来承担，把他当作衣钵传人，还引荐苏东坡去拜会宰相富弼、枢密使韩琦。欧阳修接到苏东坡写的《谢欧阳内翰书》，见苏东坡用短短两段话就说明了五代以来士人文风演变的概貌、得失，并称颂自己以这次考试改变了文风，于是致信梅尧臣，说读苏东坡的信时，"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阳修主张文学革新，推崇平易而有格调的文字风格。他对苏东坡的未来极为看好，经常在聚会上向其他士

人夸赞苏东坡，使得苏东坡在士人中小有名气。许多士人好奇欧阳修为何如此重视苏东坡，纷纷传抄他写的几篇文章。

之后，在欧阳修的举荐下，苏洵获得校书郎的官职，跟着欧阳修编纂礼书。欧阳修还举荐苏东坡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制科考试，苏东坡考中第三等，从而实现了从“选人”到“京朝官”的身份跃升。苏东坡在凤翔为官时，欧阳修不断公开赞誉他的诗文，把他看作可以传承新文风的“斯人”“异人”。这时苏东坡已是天下知名的才子、青年官员，不仅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期许，连皇太子赵曙也听闻了他的名声。

治平年间，苏东坡在京城为官时经常出入欧阳修门下。苏洵故去后，苏东坡拜托欧阳修为父亲撰写了墓志铭。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期间，欧阳修在地方为官，后来主动致仕闲居。

熙宁四年（1071）苏东坡外任杭州时，特地绕道到颍州，与苏辙一同探望闲居的欧阳修。欧阳修见到苏东坡、苏辙来访，十分高兴，挽留他们在颍州停留了十天，谈诗论文。此时的欧阳修两鬓斑白，身着宽袍，看上去仙风道骨。几人一起在颍州城西北的湖边喝酒，欧阳修当场让苏东坡给自己收藏的石屏写赋。

当时年轻文人更趋附王安石的新学说，其中包括一些当年追随欧阳修的人。欧阳修觉得这些人见利思迁，没有什么道德坚持，称不上自己的门徒。早年间，王安石的诗文曾得到欧阳修的赞誉，欧阳修屡次向朝廷推荐他，一度把他视为衣钵传人。欧阳修在《赠王介甫》一诗中以“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称赞王安石，说李白、韩愈的诗文之道传到如今，我已年老，年轻一辈人中以王安石最为突出，可以传承衣钵。但王安石并不满足当“文章之士”，他觉得自己的天命是发扬儒学，故而在《奉酬永叔见赠》中表达志向“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即以孟子传人自诩，并不想单纯以文章闻名。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在朝主持变法，此时的欧阳修在地方当知州，两人并无直接冲突，但是欧阳修对青苗法颇有批评，并且以不贷放青苗钱的行动表达自己的政见，还写信责备王安石的一些举措。王安石不仅没有回信，还在宋神宗面前对欧阳修多有苛论。比如王安石曾攻击欧阳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尤恶纲纪立、风俗变”，指责欧阳修厌恶变法，还认为他写的那类“华辞”只能“乱俗害理”，没有实际用处，还不如小官吏的用处大；并攻击欧阳修虽然文章出色，但不懂儒家经典和义理，甚至还对《周礼》《系



辞》的真伪持有怀疑态度。

欧阳修对王安石的认识也大有变化，认为他是酷吏一般的人，在给友人写的信里说“此人而能文，角而翼者也”。扬雄在《法言》中形容西汉的郅都、宁成、张汤、杜周等酷吏是“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说这些人就像长着翅膀的老虎一样残酷凶暴，让受株连的人更加难以逃避罗织的罪状。欧阳修这是隐晦地指责王安石的政见有误，加之擅长文章，就会造成更大的错误和影响，得志后也颇为冷血残酷，对待当年的友人也无情无义。

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苏东坡十分感念欧阳修对自己父子三人的提携，在禅室设立灵位，以门生之礼穿丧服祭奠，痛哭了一场。苏东坡在祭文里称颂欧阳公在世时“斯文有传，学者有师”，意有所指地说欧阳公逝世之后，“赤子无所仰芘，朝廷无所稽疑，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至于用夷。君子以为无为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譬如深渊大泽，龙亡而虎逝，则变怪杂出，舞鳅鳝而号狐狸”，这隐隐指向王安石及其新学，因为不少士人私下议论王安石的学问是参考佛教的理念解释儒学，即所谓“异端”“用夷”。而“小人”“得时”，自然是指斥王安石及其追随者。

在京城为相的王安石听闻欧阳修去世，也写了《祭欧阳文忠公文》，称赞欧阳修一生在政治、学术、文学等方面的成就，并以“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结尾，大概也是想到了当年欧阳修的提携之谊。

后来，苏东坡还征得欧阳修夫人薛氏的允准，让次子苏迨娶了欧阳修三子欧阳棐之女为妻，两家成了姻亲。欧阳修的儿子拜托苏东坡给《六一居士集》撰写序，又请他为欧阳修墓新修的神道碑撰写碑文。



清　吕焕成　春夜宴桃李园图（局部）

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

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
秋风高爽，霜色洁白，溪水滴落，山石显露。水落石出，原指一种自然景象，大多比喻事情终于真相大白。

芳

芳：
花草发出的香味，这里引申为“花”，名词。

发

发：
开放。



醉翁亭记（节选）

欧阳修 作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

林霏

林霏：
树林中的雾气。

归

归：
聚拢。

暝

暝：
昏暗。

秀

秀：
植物开花结实。这里有繁荣滋长的意思。

水問山尋

陈襄：杭州游处

熙宁四年（1071）至熙宁七年（1074），苏东坡在杭州当通判，经历了沈立、陈襄、杨绘三任知州。

陈襄是福建侯官（今属福建福州）古灵村人，年轻时与同乡陈烈、周希孟、郑穆一起倡导道学，人称“海滨四先生”。庆历二年（1042）举进士，曾任浦城（今福建浦城）、河阳知县，常州、明州（今浙江宁波）、陈州、杭州知州，在朝廷任过枢密直学士、判尚书都省等职。陈襄曾出使辽国，辽国设小座侮辱他，他拒不就座，是一个很有气节的人。

治平年间，苏洵、苏东坡与担任三司盐铁判官的陈襄就有交往，但来往不多。熙宁初年，担任侍御史知杂事的陈襄上书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请求罢免王安石、吕惠卿等人，随即就被外派地方任职。他曾在陈州短暂担任知州，是苏辙的上级，两人也有来往。

熙宁五年（1072）八月，陈襄来杭州就任知州，成为苏东坡的上级。陈襄和苏东坡政治观点相似，一样爱好诗文、游览。两人在杭州任职期间，多次在假日一起出游，写诗唱和。苏东坡还曾应邀到陈家欣赏陈襄收藏的蔡襄《天际乌云诗卷》并题跋。

陈襄在杭州，主要政绩是帮助民众解决了取水不便的问题。杭州取水的“六井”还是唐代德宗年间杭州刺史李泌组织开凿的，还有一口用于取水的井是在宋代嘉祐年间，杭州知州沈遘在美俗坊开凿的“沈公井”。熙宁年间，这些井大都年久废坏，水位不高。陈襄和苏东坡商量，请懂水文情况的僧人仲文、子珪、如正、思坦四人调查水井周边情况，趁冬天水位低时雇请工匠疏浚井下管道，修整水井四壁。次年春天完工以后，正好遇到江南大旱，很多地方的水井都枯竭了，但杭州的这几口井仍然有水。

熙宁七年（1074）七月，陈襄调任应天府知府。离任前，陈襄宴请僚属，一众官僚饮酒、闲谈到深夜，月色下的钱塘江、西湖甚美，陈襄当即请苏东坡赋诗一首，苏东坡写下了《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

> 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且徘徊。
>
> 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熙宁九年（1076），陈襄回朝召为官，为枢密院直学士，知通进银台司，提举进奏院，后兼提举司天监，兼管尚书都省事等。元丰三年（1080），陈襄病卒，终年六十四岁。

杨绘：诗词雅会

熙宁七年（1074）七月，原应天府知府杨绘调任杭州知州，成了苏东坡的上司。杨绘是汉州绵竹（位于今四川绵阳）人，算是苏东坡的老乡，他是嘉祐元年（1056）进士，当过眉州知州、兴元府知府。宋神宗即位后，杨绘知谏院。杨绘曾上书反对宰相曾公亮举荐儿子判登闻鼓院、任用曾巩为史官之举，后来升为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之后又因与王安石意见不一，被派到地方为知州。

杨绘任杭州知州后，与苏东坡相处的时间很短，因为八月下旬，杭州出现蝗灾，苏东坡奉命到临安、於潜、新城等地督促捕蝗。九月，苏东坡刚返回杭州没几天，便接到被任命为密州知州的公文。刚来杭州当了一个月知州的杨绘也被调回汴京当翰林学士，两人相约结伴同行一段路程。

九月下旬，张先来杭州送别二人，三人在流杯堂宴饮，杨绘当场自撰新曲词《泛金船》，苏东坡、张先都写了同题作品。之后，杨绘、苏东坡两家登船出发，与他们交好的张先、陈舜俞一路相送。他们先沿城北的小河北上去吴江，再进入运河北上，方便顺路与湖州知州李常告别。

一行人到湖州拜访李常，正好李常生了儿子，众人欢会一场。在湖州，苏东坡认识了二十六岁的明州县令李之仪，十分欣赏他的诗文。李常还想多留他们几天，可是苏东坡想尽快去济南见弟弟苏辙，担心清河上冻影响行程，坚持早点儿离开。

杨绘、苏东坡与张先、李常等人告别，带着家小继续北上，到润州（今江苏镇江）才分开。之后，两人一直有书信往来。后来，翰林学士杨绘因为荐举的属吏王永年犯罪，被连坐，以“私通馈赂”罪被贬，提举江州太平观。杨绘本身喜欢写词、听词，便抽空辑录唐代以来的词曲典故、作者雅事等，成为书稿《时贤本事曲子集》。

苏东坡被贬黄州时，杨绘把自己编辑的《时贤本事曲子集》抄本寄给他阅读。《时贤本事曲子集》中有一则记载说，钱塘有老尼能诵后蜀孟昶写的词《洞仙歌》中的前两句，后面的都失传了。一天晚上，苏东坡睡不着觉，与十九岁的朝云一起携手望月，让他联想到传说中的孟昶词，于是他根据自己的经历补足剩余部分，写就了《洞仙歌·冰肌玉骨》：

>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
>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在这首词的序言中，苏东坡故布疑阵，说自己七岁时在眉山听朱姓老尼说，她小时候曾跟着师父到蜀主孟昶的宫中，正当暑热，一天晚上蜀主与花蕊夫人在摩诃池上纳凉，花蕊夫人创作了一首词《洞仙歌》，老尼只能想起开头两句。自己忽然想到这件旧事，才写了这首词。实际上，苏东坡很可能

水問山尋

是先根据自己的真实生活场景写出了词，然后在序言中编撰了一个风流故事，从而造就了一个新典故。

苏东坡还曾在书信中与杨绘相约在一处地方买田，以后做邻居，好互相照应。不过两人宦游各地，心愿没有实现。元丰七年（1084），苏东坡从黄州北上汝州，杨绘在永兴县（今湖北阳新）担任兴国军守，事先派当地文士李翔去黄州邀苏东坡务必到自己那里一趟，再续当年在杭州共聚的雅事。

苏东坡欣然赴约，到永兴县后，被杨绘热情招待了几天，众人一起游览附近的名胜。欢聚时短，苏东坡必须得离开了。分别当日，他和杨绘都喝醉了，出发得比较晚，到达距离官方驿站石田驿二十五里的地方时天就黑了，只好找了个农家住下，在这里他和杨绘才告别。

元祐初年，杨绘再次出任杭州知州，曾经作诗《诗寄东坡》给在京城的苏东坡，回忆当年“六客”夜话的风雅：

仙舟游漾霅溪风，三奏琵琶一舰红。
闻望喜传新政异，梦魂犹忆旧欢同。
二南籍里知谁在，六客堂中已半空。
细问人间为宰相，争如愿住水晶宫。

元祐三年（1088），杨绘在杭州官署病逝，终年六十二岁。

明　杜琼　友松图（局部）



赵抃：撰碑之邀

嘉祐四年（1059），苏东坡、苏辙兄弟在家守孝时，到成都时曾以新科进士身份拜会益州路转运使赵抃。赵抃与欧阳修关系交好，故而对苏东坡兄弟也青睐有加，从此有了联系。次年，欧阳修再次上书举荐苏东坡，赵抃也上书举荐从未谋面的苏洵，让苏洵得到秘书省试校书郎的官职，这使苏家父子对赵抃心存感激。

宋神宗登基后，一度任命赵抃为参知政事，但是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赵抃对新法多有异议，随后被外派到地方担任知州。

熙宁十年（1077）十月，苏东坡接到杭州知州赵抃的信，邀他给杭州新设的表忠观撰写碑文。之前，赵抃看到吴越国王钱氏家族的坟墓年久失修，向朝廷申请将钱塘县龙山的一座废旧佛寺改造成道观，让钱氏后人中当道士的钱自然当主持。每年给钱自然度一个道士的名额，这样他可以获得一定收入，用来维护家族的坟墓和宗祠。宋神宗同意以后，赵抃特地写信托苏东坡撰文。苏东坡早年就同赵抃相识，而且自己在杭州当过通判，自然不会推辞，用心写了一篇文章，参照司马迁写《史记》的笔法，从五代乱世中钱氏割据一方的历史写起，然后转到钱氏如何归附大宋，如今坟墓如何零落，文字简约而韵律雅正。

赵抃邀请苏东坡撰写这篇碑文，或许也有帮苏东坡扬名的考虑，希望能引起更多官员乃至宋神宗对苏东坡的重视。可惜表忠观迟迟没有筹到钱立碑，赵抃也被调任越州知州，到元丰二年（1079）以太子少保致仕。元丰七年（1084），赵抃逝世，享年七十七岁。



水問山尋

苏颂：同宗之谊

嘉祐五年（1060），为母亲守孝期满，苏东坡与父亲、弟弟回到汴京，在城西一处叫“西冈”的地方租了房子落脚。苏颂时任集贤校理、同知太常礼院，家就在西冈附近。苏洵和苏颂认识后，因为是同姓，就叙家谱认作同宗，以宗兄、宗弟相称，苏东坡、苏辙兄弟称苏颂为宗叔，与其有了往来。类似同宗、同族、同乡、同年考中进士等等，都是在外漂泊的人交往的理由，官场中人更是如此。

熙宁六年（1073）初春，担任杭州通判的苏东坡到富阳、新城两县巡视，一时兴起，悄悄沿着富春江行船去拜访担任婺州（今浙江金华）知州的宗叔苏颂。按照朝廷制度，官员私自离开治所会友是不允许的，两人只能对此保密。

同年二月二十一日，苏颂来到杭州，苏东坡除了陪同杭州知州陈襄设宴款待苏颂，次日又单独邀苏颂及其子苏嘉一起游览西湖附近山水，三人诗酒唱和，尽兴而归。苏嘉之前在汴京的太学上学，熙宁四年（1071）在一次考试的答卷中议论新法的不足，导致本就对太学不满的王安石更为气恼，借此事一次罢免了五位太学学官。从此，王安石加强了对京师学校的控制，把倾向变法的官员派去担任学官，还生出编撰官方统一教材的想法。后来苏嘉到亳州担任吏员，苏东坡特地致信在那里当知州的蜀地同乡杨绘，请他照应。

元丰二年（1079）秋冬，苏东坡因为“乌台诗案”被关押在御史台接受审讯，濠州（治所在今安徽凤阳）知州苏颂因在开封府知府任上判处案件的问题，也于九月到御史台接受审讯。他被关在跟苏东坡相邻的一个院子里，听得到御史台官吏通宵审讯苏东坡的喝骂声，在诗中形容是“却怜比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苏颂老成持重，自视为儒者，把苏东坡当作诗人，两人性格、学问有别，但都因王安石变法而被排斥到地方任职。他对苏东坡的遭遇心有所感，写了四首诗追忆两人的交往，其中提到苏东坡此时诗名显赫，许多反对新法之人与他声气相通，暗示可能就是这一点引起宋神宗和新党的忌惮。在以皇帝为最高威权的时代，朝臣只得小心应对，而苏东坡偏偏写了一些讥讽之言，自然会被有心人罗织罪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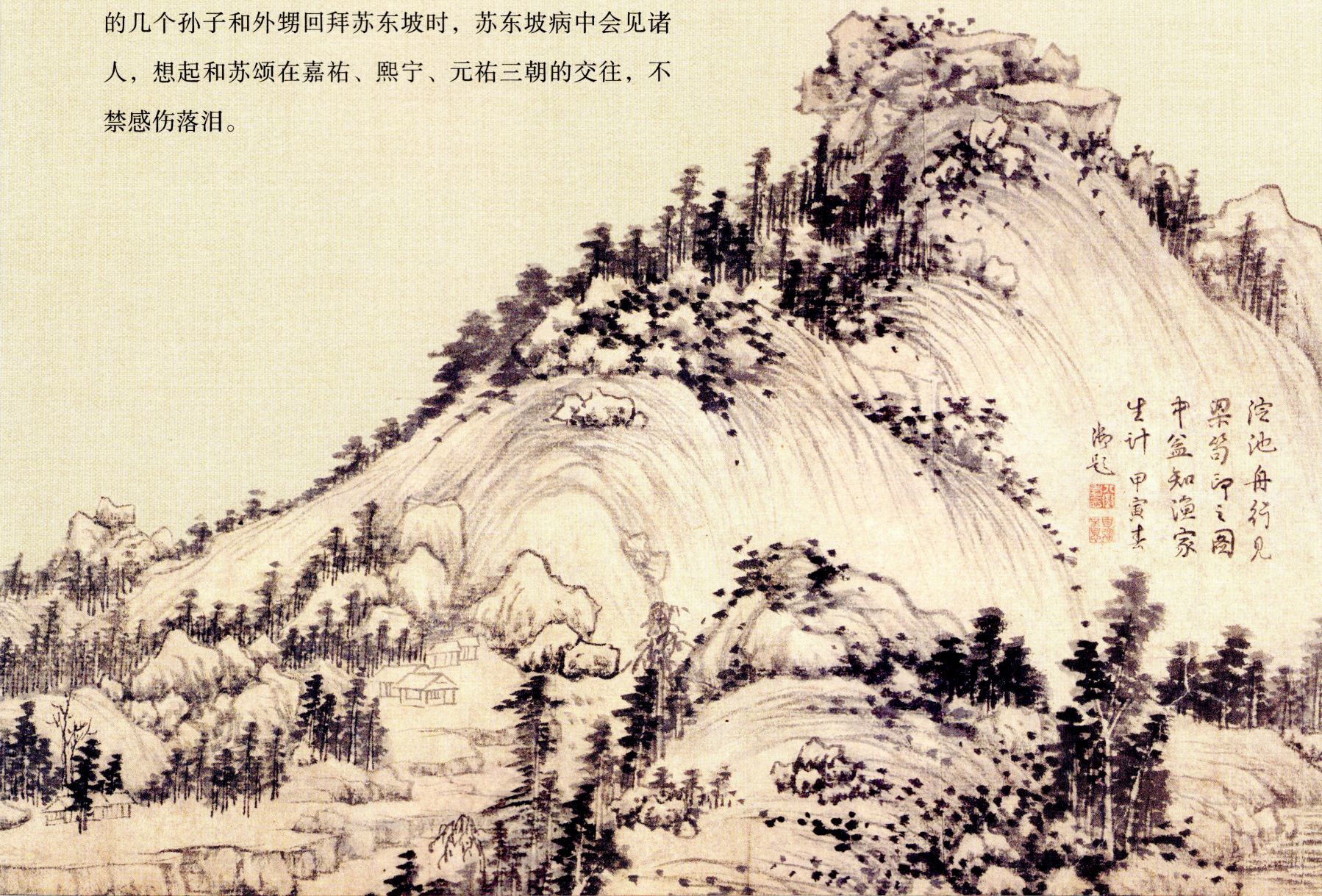


水問山尋

元丰七年（1084），苏东坡从黄州北上到润州，听说宗叔苏颂的母亲陈夫人在润州病故，便前往吊丧，并撰写了《苏子容母陈夫人挽词》，称赞陈夫人的品格和志节，也和苏颂见了一面。

元祐六年（1091）年底，太皇太后解除刘挚的右相之位，将其外派到地方担任知州，又命苏颂担任右相。苏颂为人稳重，是中立派官员，太皇太后任命他或许是期望朝政能平稳一些。这时宋哲宗年纪幼小，每次在宫殿接见朝臣议政时，他与高太后相对而坐，大臣奏事后，都要听从帘子后面的高太后的决定，绝大多数大臣也习惯了侧身向高太后座位的方向奏事。宋哲宗赵煦只能隐约看到大臣们露出的半个背，极少有大臣转身面向赵煦禀报政事。以致赵煦日后回忆说，那几年上朝，自己只能看朝中官员的臀部和背部。众臣之中，只有苏颂一个人始终恭敬地对待这位小皇帝，他每次在朝堂上奏事，都先向高太后陈述，然后再转身面向宋哲宗陈述，态度庄重严谨，让宋哲宗记忆深刻。因此，后来宋哲宗竭力贬斥元祐旧臣时，并没有为难苏颂，称赞他懂得“君臣之义”。

绍圣元年（1094），苏东坡被贬谪岭南，南下途中在扬州与担任知州的宗叔苏颂见了两次。此后苏东坡在惠州、儋州多年，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一家北上经过润州时，苏颂已于五月二十日在润州家中病逝。苏东坡身患痢疾无法行动，便让儿子苏过到苏颂家中吊丧，代自己写祭文《荐苏子容公德疏》，追忆与苏颂的交往，“伏以自昔先君以来，常讲宗盟之好。俯仰之间，四十余年。在熙宁初，陪公文德殿下，已为三舍人（苏颂、宋敏求、李大临）之冠。及元祐际，缀公迩英阁前，又为五学士（邓润甫、苏东坡、许将、苏辙与苏颂）之首。虽凌厉高蹈，不敢言同；而出处大概，无甚相愧”。苏东坡还让儿子去佛寺做法事，给这位宗叔追福。苏颂的几个孙子和外甥回拜苏东坡时，苏东坡病中会见诸人，想起和苏颂在嘉祐、熙宁、元祐三朝的交往，不禁感伤落泪。



水問山尋

辩才：杭州再会

苏东坡在杭州频繁与僧人交往，经常引用《维摩》《圆觉》《楞伽》《法华》诸经及著名禅师的语录，但他不是钻研佛教义理的学者，并不死抠字眼，而是注重佛理对于疏解内心苦闷、拓展思维的益处。苏东坡的诗歌中常常出现水、月、梦这类互相包含、映射的形象，也有许多把大小、生死、是非、善恶、美丑并列乃至颠倒、转化的诗句，这明显与佛学中超脱于二分思维和一切差别，大小等殊、相即相入的思想有关。

苏东坡在杭州时与辩才关系友好。这位高僧俗名徐天象，是杭州於潜县人，十岁出家，十八岁时跟从天竺慈云大师学天台宗佛学，法名“元净”。景祐三年（1036），宋仁宗召见了他，赐号“辩才”，授紫衣袈裟。嘉祐元年（1056），杭州知州吕溱请他住持大悲阁，严设戒律，颇有建树。熙宁元年（1068），辩才住持上天竺观音道场。

苏东坡对这位老僧十分尊敬。苏迨三岁时还不会走路，得奴婢抱着、背着，苏东坡想到可以请和尚、道士攘除灾祸疾病，于是把苏迨送到寺庙中一段时间。辩才为苏迨剃发、摩顶，几天之后，苏迨可以走路了。苏东坡十分欣喜感动，他花钱买了一道度牒，让辩才另外剃度一人，苏迨这才“还俗”回家。熙宁七年（1074）秋天，因为蝗虫成灾，苏东坡到临安、於潜、新城等地督促捕蝗，顺便去於潜的西菩山明智院拜访了辩才，一起游览了山中寺庙并赋诗，《赠上天竺辩才师》诗中云：

南北一山门，上下两天竺。
中有老法师，瘦长如鹤鹄。
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
见之自清凉，洗净烦恼毒。
……

一次，苏东坡去龙井探望辩才。辩才近年来很少走出寺庙周围，这次为了陪同苏东坡，和他一起游览风篁岭，随行之人夸赞辩才今天走得比较远：“这就像慧远再次跨过虎溪啊。”辩才笑着说：“杜甫不是写过诗吗？‘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于是苏东坡让人在这座山岭上修了一座亭子，命名为“过溪亭”，又名“二老亭”。

元祐五年（1090）二月辩才八十寿辰时，杭州僧俗前去其驻扎的龙井寺庆贺，寺院施舍上千僧人吃寿宴，苏东坡、王瑜、张璹、周焘等官员都给辩才赠送了家乡的茶叶。

元祐六年（1091）九月三十日，辩才去世，苏东坡写了一篇祭文，托诗僧道潜到上天竺寺祭祀，又请弟弟写了《龙井辩才法师塔碑》碑文。

怀琏：佛画结缘

嘉祐六年（1061），苏洵、苏东坡在汴京时认识了十方净因禅院住持怀琏禅师，怀琏是庐山圆通寺住持居讷禅师的弟子。居讷是蜀地中江县人，十五年前苏洵游览庐山时，就和居讷及其另外一位弟子景福顺长老有过交往。苏洵与怀琏说起这一往事，双方关系便近了许多。十二年前，朝廷出资在汴京创建十方净因禅院，翰林学士欧阳修和南康年知军程师孟推举居讷担任住持，居讷以眼睛有病为由婉拒，让自己的弟子怀琏来京住持这座寺庙。

怀琏是汴京有名的僧人，宋仁宗赐给他“大觉禅师”的称号，还赏他一把写有御书十七篇诗颂的罗扇。他和苏洵颇为投缘，赠送了一幅描述水神骑龙而行的《水官图》给苏洵，苏洵和苏东坡都作诗表示感谢，此后一直有往来。治平二年（1065）九月初九重阳节是苏东坡亡妻王弗的百日祭，他书写《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给净因寺的大觉禅师怀琏，请其为亡灵诵经礼忏。不久，怀琏就离开京城，去了江南的寺庙。

熙宁四年（1071），苏东坡到杭州当通判，与怀琏有书信往来。怀琏从汴京来到金山，随后又在明州的阿育王山广利寺隐居。熙宁五年（1072），苏东坡给他写信，把苏洵所藏禅月大师贯休画的罗汉图和古代佛画一轴布施给广利寺，怀琏赠送他罗汉木树苗，苏东坡又转赠慈化大师栽种。

地方主要官员在寺庙住持的人选方面有很大发言权，僧人自然乐于和官员士大夫往来。如临安县北的云门宗寺庙径山寺管理着昌化县大明山的慧照寺，慧照寺原本的规则是由本寺住持的弟子担任住持，代代传承，即所谓“甲乙住持制”。熙宁五年（1072），慧照寺上一代住持离世后，苏东坡打破传统，招怀琏的弟子维琳前来住持，把住持制度改成了官府在各寺选拔的“十方住持制”。

元祐六年（1091）正月，怀琏禅师在明州阿育王山广利寺病逝。几个月前，怀琏还把宋仁宗所赐颂诗十七首刻碑立在广利寺宸奎阁，寄信请苏东坡撰写《宸奎阁记》。不料怀琏禅师突然故去，让苏东坡感喟不已。之后几天，苏东坡手书正式的碑文，寄给了寺中僧人。因二人之间的交情，苏东坡对怀琏的弟子维琳、宝觉、道潜等都另眼相看。



水問山尋

道潜：诗人之交

道潜，字参廖，比苏东坡小七岁，是怀琏的弟子，在明州阿育王山广利寺随侍师父。

熙宁四年（1071），苏东坡沿着运河南下去杭州，快到杭州的临平镇时，偶然看到一首诗：“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他觉得此诗十分有风致，想结交这位诗人，后来终于打听到了道潜，发现彼此还有点儿关系。

元丰元年（1078）秋天，道潜到汴京办事，回程特地到南京拜访了苏辙，然后又来徐州拜会苏东坡。两人以前仅有书信来往，这是第一次见面，道潜为了表示客气，呈上一首长诗《访彭门太守苏子瞻学士》，赞誉苏东坡“风流浩荡播江海，粲若高汉悬明星”，于是千里迢迢来拜会。这首诗比较世俗，可能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文字唱和，彼此还不熟悉。道潜还带来了秦观给苏东坡的信。苏东坡留道潜在徐州住了一段时间，请他在官署斋室居住，假日两人一起出游、品茶。一次宴会上，美貌的官妓表演完歌舞，苏东坡故意捉弄道潜，吩咐这位官妓向道潜求诗。在袅袅娜娜的美人面前，道潜不动声色，立即写下一首诗，让苏东坡颇为叹赏。之后苏东坡还写信给文同称赞道潜“诗句清绝”。

道潜一直待到十二月十二日才离开徐州。送别时，苏东坡作了一首《送参寥师》，诗中提到禅思有助于作诗，“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诗人可以像禅师那样以空、静的心态观察体味人间万事万象，将所得所悟行之于诗文，如此，诗句才会蕴含让人感念不已的“至味”。

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南下去湖州任知州，在高邮时，道潜与秦观一起跟着苏东坡南下，顺便游览运河两岸。四月二十日到湖州后，苏东坡在假日同秦观、道潜出游。十几天后，秦观去越州探亲，道潜去杭州寻访辩才，走之前，他们和苏东坡相约秋末回到湖州再聚。



元丰六年（1083），道潜从苏州到黄州拜会苏东坡，苏东坡留他在雪堂长住。当时雪堂除了道潜，还有杨世昌和巢谷。就算没有其他客人，这几个人也能天南海北地聊天。元丰七年（1084），苏东坡与道潜又一起离开黄州，北上一起游览庐山，随后道潜留在庐山修行，苏东坡才与之告别。

元祐四年（1089），苏东坡到杭州当知州，召请道潜入驻孤山颇有历史的智果寺。道潜入寺当日，苏东坡带着宾客十六人助阵，声势浩大。元祐五年（1090），苏东坡又支持道潜在智果寺中修建三间房舍，供自己和随侍的小童居住。上梁时，苏东坡前去祝贺并题字。之后几日，苏东坡和提点两

浙路刑狱王瑜、两浙转运判官张璹等游览西湖各处，到北山拜会清顺、道潜二位诗僧，在垂云亭观景，然后一起回到道潜的智果精舍饮茶。晚上众人又去驿舍拜访路过的唐州知州陈师锡，一起宴饮作乐、喝茶唱和。这场景让苏东坡突然想起几年前道潜跋涉千里到黄州探望自己，两人一起游览武昌（今湖北鄂州）西山，那天晚上，苏东坡梦见自己写下“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如今竟然在这里应验。苏东坡讲出这个故事，在座之人都喟然叹息。

元祐六年（1091），苏东坡应召回京，清明节时他特地带着几个亲友去智果寺与道潜告别。应道潜之请，苏东坡将智果精舍边的泉水命名“参寥泉”，并写了铭文。北上到巽亭时，苏东坡又写了一首《八声甘州》寄给道潜，怀念两人的交情，说致仕后到宜兴养老时再相见，词云：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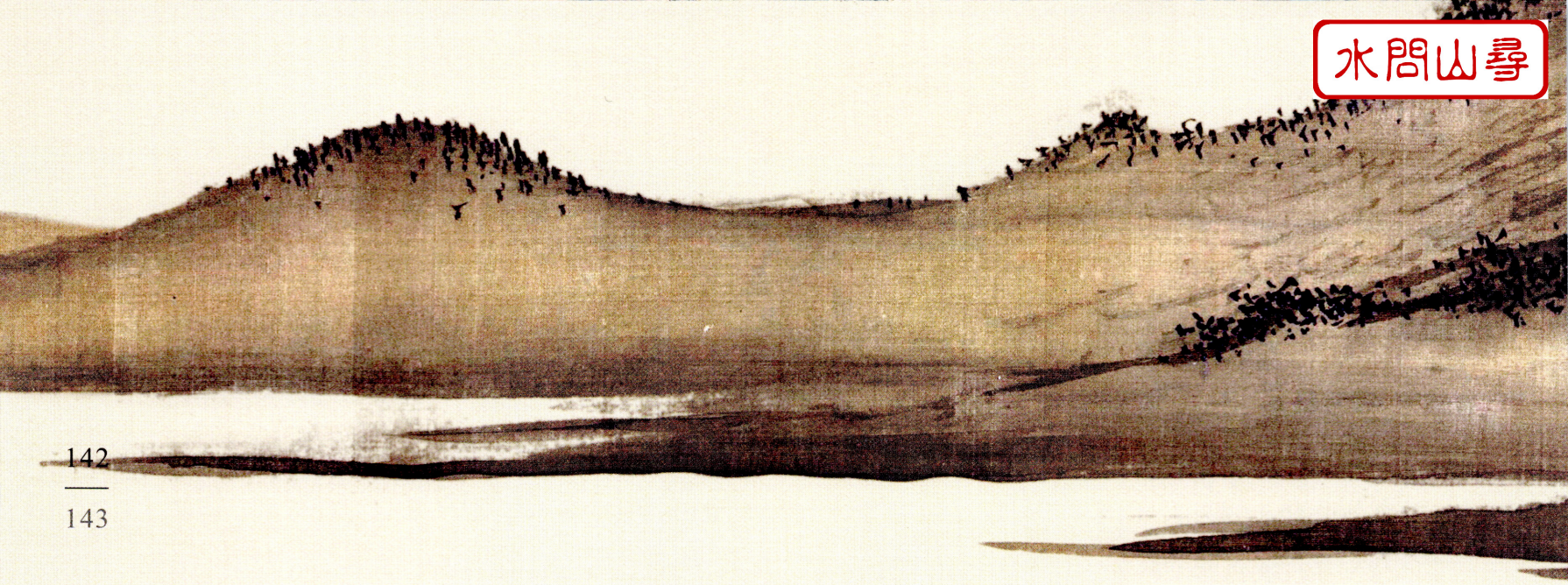
元祐八年（1093），道潜拜托苏东坡帮自己获得赐号。苏东坡便拜托丞相吕大防上奏，帮道潜获得了“妙总大师”的赐号，这无疑可以提升道潜在佛教界中的地位。

绍圣元年（1094），苏东坡被贬谪岭南，在杭州的道潜特地托人送来一幅阿弥陀佛像，让苏东坡随行供奉。苏东坡到惠州后，道潜、佛印等都曾派人携带书信来问候。在给道潜的信中，苏东坡形容自己在惠州，就像是灵隐寺、天竺寺等大寺庙的和尚出寺院以后到一个小村中吃糙米饭，如此过一生也没什么不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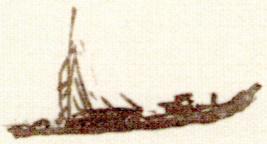
绍圣三年（1096），有僧人指控道潜的度牒是冒名的。实际上，道潜本名昙潜，苏东坡将其改为“道潜”后，他便以这个字号自称。与苏东坡有仇怨的两浙转运使吕温卿就抓住这个把柄，取消了道潜的度牒，让他还俗，并将他发配到兖州编管。苏东坡听说这个消息后，给苏辙的亲家、京东转运使黄寔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黄寔便叮嘱兖州教授楼异关照道潜。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东坡北上途中才得知因为曾布帮忙说话，道潜被解除了编管的处罚。同年七月，苏东坡在病中撰写了一份《遗表》，叙述自己的经历和对朝政的建议，只有道潜等极少数亲友看过草稿。但苏东坡考虑之后，觉得里面的话可能会给亲友招来麻烦，于是嘱咐儿子烧毁文稿，自己死后也不要递交朝廷，还特地写信嘱托道潜不要外传和刻石。

苏东坡故去后，道潜在兖州申诉自己的冤情，崇宁元年（1102）重新获得度牒为僧。道潜听说苏东坡安葬在郏城县（今河南郏县），特地去给苏东坡扫墓祭拜，和守墓的苏过握手流涕而别。据说道潜在宋徽宗政和年间还俗，之后不知所终。



思聪：水镜晨昏



熙宁六年（1073）苏东坡在杭州当通判时，一日去法惠寺登临横翠阁，认识了僧人圆师身边的小童彭九。彭九当时虽然才十一岁，但善于鼓琴和接待宾客。彭九还没有法名，圆师请苏东坡给他起名，于是苏东坡起名为“思聪”。苏东坡觉得思聪头脑聪慧，便介绍他去明州阿育王广利寺跟从诗僧道潜学习作诗。元丰三年（1080），苏东坡在黄州时从道潜的信中得知思聪作诗有长进，已在法惠寺正式剃度。

元祐四年（1089），苏东坡到杭州出任知州时，思聪已是杭州小有名气的诗僧，苏东坡数次和思聪出游、唱和。一次，苏东坡和客人在僧舍闲谈，思聪作陪，苏东坡向客人介绍说思聪虽然年轻，但善于作诗，当场让思聪写了一首和道潜“昏”字韵的诗。苏东坡看后大为赞赏其诗中“千点乱山横紫翠，一钩新月挂黄昏”一句，认为可以与唐人诗句比肩，于是和思聪开玩笑说：“你就算不念经、不参加考试，也足以做和尚。”苏东坡还写信给在天目山修行的道潜，希望道潜安排思聪回到杭州，随后帮思聪找了个佛寺入驻修行。

元祐六年（1091），苏东坡应召回京，思聪陪同进京，在京城逗留了一个多月后才离开。临别时思聪请苏东坡给自己的诗集命名，苏东坡取名为《水镜集》。苏东坡还写了《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称赞思聪“七岁善弹琴。十二舍琴而学书，书既工。十五舍书而学诗，诗有奇语，云烟葱胧，珠玑的皪，识者以为画师之流。聪又不已，遂读《华严》诸经，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师宿儒皆敬爱之”，期许他“能如水镜，以一含万，则书与诗当益奇。吾将观焉，以为聪得道浅深之候”。

绍圣元年（1094），苏东坡被贬岭南，五月走到了金陵北部的六合。苏东坡听说在这里的长芦寺挂单的思聪生了重病，忙去探望，并托思聪给道潜带去一封信。友人患病，自己远谪，苏东坡感到格外凄凉，在船上写了三首诗纪念这次相见。

苏东坡故去后，思聪在大观、政和年间到汴京游历，以琴技奔走权贵之门，后来被推荐给宋徽宗，竟然还俗做了宋徽宗的侍从之臣。苏过听说此事曾作诗劝阻，可惜并没有发挥作用。有文人看到思聪晚年如此不堪，曾作诗讽刺“水镜年来亦太昏”。



周韶：楚楚佳人



杭州官妓周韶以美貌能诗出名，曾与蔡襄斗茶。熙宁六年（1073）时，周韶已三十多岁，又逢至亲去世，心中悲苦。但官妓即使父母去世，也要听候酒宴召唤。她不敢穿孝服，只能穿着类似孝服的白色衣裳去酒宴上唱曲陪酒，强颜欢笑。苏东坡于心不忍，想要助她脱离苦海。

二月二十一日，婺州知州苏颂调任亳州，路过杭州，陈襄在官厅中为苏颂设酒宴，又招周韶来演唱佐酒。穿着白色衣裳的周韶楚楚可怜，她演唱一曲之后，陈述自己家人离世的悲伤和想落发为尼的心愿，请苏颂帮忙说情，让陈知州同意自己脱离妓籍。苏颂指着门厅的白鹦鹉说："你可以作一首绝句，作得好，我就向知州求情。"周韶起身，拿起笔写了一首《求落籍》：

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
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

满座之人都笑着称赞，陈襄可能也早就与苏东坡有过沟通，于是当即解除了她的妓籍。这可以说是苏颂、陈襄、苏东坡三人的一场默契演出。

在苏东坡的帮助下，周韶进入一座尼姑庵修行。告别之时，周韶穿着白色细布衣裳，苏东坡在她的手帕上题写了一首《薄命佳人》相赠：

双颊凝酥发抹漆，眼光入帘珠的皪。
故将白练作仙衣，不许红膏污天质。
吴音娇软带儿痴，无限闲愁总未知。
自古佳人多命薄，闭门春尽杨花落。

水問山尋

诗：摇曳多情

苏东坡诗作传世的有两千八百多首，在数量上与同代诗人比较，仅少于陆游、刘克庄、杨万里等寥寥几人，可谓是高产诗人。

但有趣的是，苏东坡考中进士之后的前十年，主要以考中制科第三等、文章出色这两方面出名，很少写诗，也毫无诗名。

嘉祐四年（1059）十月初，为母亲守孝期满，苏东坡与父亲、弟弟走水路去汴京，开始了一段为期四个月的漫长旅行。在途中，苏东坡常常和弟弟写同题诗，互相比较、探讨，既是训练作诗技巧，也是记录沿途的民情风俗。这时苏东坡写诗的才华还不被世人所知，只有亲近之人知道。

苏东坡真正成为一名诗人是在杭州。熙宁四年（1071），苏东坡被王安石等新党排挤到杭州当通判，在公事之余，经常四处游览。他对所见所闻的风景、民俗、人物、遗迹、故事等都兴趣浓厚，在杭州留下了不少诗词佳作。

《苍梧杂志》中记载，苏东坡曾说：“凡读书可为诗材者，但置一册录之，亦诗家一助。”这或许是受到白居易的启发，白居易在科考备考、积累诗材时曾把所读的各种文字材料按照主题分类摘抄，以便于记忆和查阅。苏东坡也有随手记录所见所闻的各种典故、辞藻乃至个人感想的习惯，随后以之



为依据作诗。如《金门寺中见李西台与二钱唱和四绝句，戏用其韵跋之》中的诗句，就化用了在杭州听闻的吴越国王钱氏家族的故事；《陌上花三首》序言提及吴越王与妃书“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故事。

宋代士人以博学、求新为尚，既要博学多知，又要有新意。年轻的苏东坡记忆力好，又爱说故事，又能在临场体验中有所感知，故而生发出一系列让人耳目一新的诗歌。

熙宁五年（1072），朝夕欣赏西湖美景的苏东坡写下了许多描述西湖风景的诗歌，在《饮湖上初晴后雨》中，“欲把西湖比西子”这句堪称神来之笔。苏东坡以空灵而贴切的比喻，将西湖之美与西子之美相提并论，巧妙地抓住了二者在神韵上的相通之处。从字面上看，西湖与西子同有“西”字，但这并非苏东坡关注的重点。西湖的美，无论晴天还是雨天，都独具风姿，恰似西施之美，淡妆浓抹皆宜，这种神韵上的相似，是难以用语言完全表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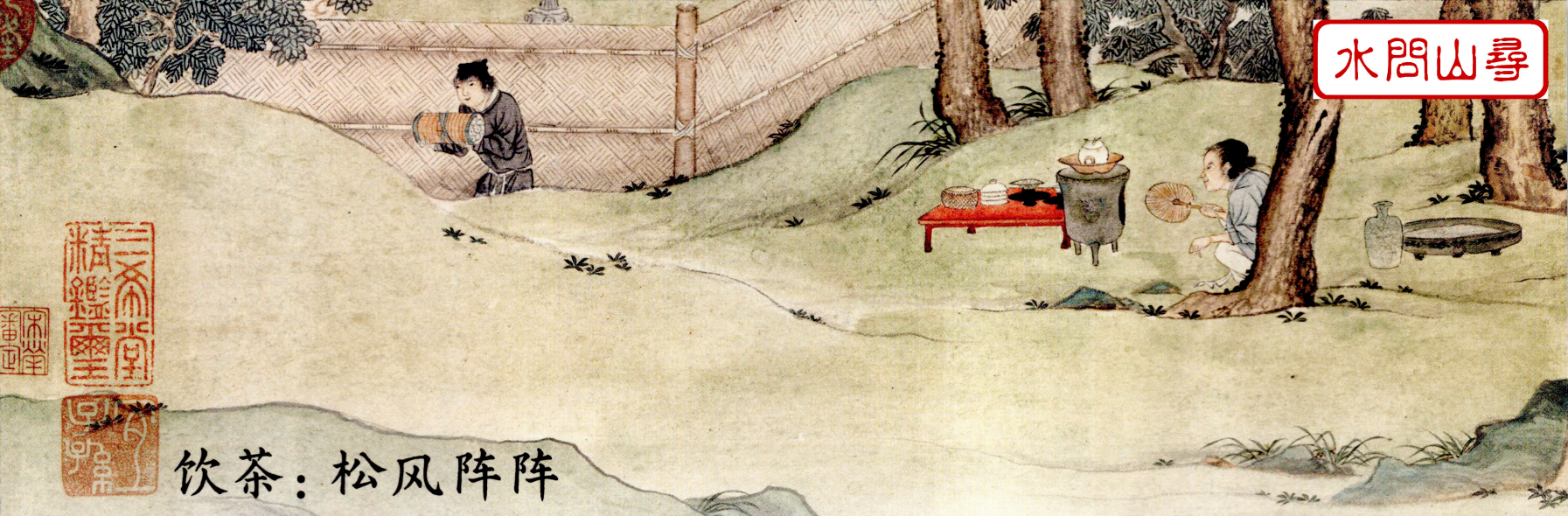
苏东坡在创作这一比喻时，想必是心与景会，灵感突发。他从西湖的晴好、雨奇联想到作为美的化身的西施，二者岂非皆是“淡妆浓抹总相宜”？在设喻之时，他未必刻意区分晴与雨分别对应浓妆或淡妆，而是更注重整体的神韵之美。

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评价这一比喻“遂成为西湖定评”，此后，“西子湖”便成为西湖的别称。苏东坡本人对这一比喻也颇为得意，多次在诗中运用。后人更是对其赞不绝口，常在诗文中提及。王文诰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中称这首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名篇”，认为它是对西湖美景的全面概评，具有超越时间的艺术生命力。

在杭州写作的这些比喻奇妙、风情摇曳的诗作，因为短小，容易抄写、背诵，比文章更易传播，对苏东坡名声的宣扬之力远超文章。此时还有书坊雕版印刷的《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畅销杭州、汴京、陈州等各大城镇，让苏东坡的诗作借雕版印刷技术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他的诗名日盛。可以说，在杭州写的这些新意迭出的诗使苏东坡被更广泛的人群熟知。

三十六岁至三十九岁在杭州的三年，诗歌助力苏东坡成为当时的第一名士。在许多爱好诗文或同情旧党的士人心目中，欧阳修故去后，苏东坡成了最有名的文士之一，就著名程度来说，或许只有朝堂上的宰相王安石可以与其相提并论。





饮茶：松风阵阵

苏东坡第一次进汴京参加科举考试时，对汴京不同于蜀地的饮茶风俗有了体会。汴京官员待客的茶水中不放佐料，注重品尝茶叶的本味。而蜀地的习俗是煮茶时加入盐、姜和茶末一起煮，味道浓厚。看到汴京官员吃饱喝足后以品茶为乐，苏东坡有点儿不以为然，他后来在《寄周安孺茶》一诗中回忆，“伊予素寡爱，嗜好本不笃”。在京城拜会欧阳修等高官时，有人拿出皇帝赏赐的御用小龙团给他品尝，他也不觉得滋味隽永，“粪土视珠玉”。可见此时，苏东坡并不嗜好饮茶。

苏东坡为官之初，也经常照惯例以茶待客，只是这时候他不好此道，很少提及喝茶之事。他染上喝茶、喝酒的嗜好都是在杭州。他到杭州后经常与本地的僧人往来，一聊就是半天。僧人都爱设茶招待客人，对茶道有许多研究。受僧人的影响，苏东坡迷上了喝茶，也逐渐对采茶、制茶、喝茶有所了解。

熙宁五年（1072）七月底，苏东坡担任杭州解试的考官。按照规定，监考的二十多天里，苏东坡必须待在考场“中和堂”中不能外出，于是他常常和几个官员闲聊、赋诗、喝茶。他还作了一首《试院煎茶》，记述自己一边煮茶一边思古的故事。

熙宁六年（1073）六月六日，苏东坡因病请假在家，独游西湖周边的几座佛寺。晚上他拜会老僧惠勤时，想起自己一天之内在几个佛寺先后喝了七盏浓茶，创下平生饮茶的纪录。于是苏东坡在惠勤的小院墙壁上题写了一首绝句《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

苏东坡最初爱上茶时也如京城的士大夫、杭州的僧人一般喝不加任何佐料的茶，如熙宁八年（1075）得到友人赠送的茶叶后，他发现“老妻稚子不知爱，一半已入姜盐煎”。因妻子是蜀人，已经按照蜀地的风俗在煮茶时加了姜、盐，苏东坡觉得有点儿暴殄天物。但是后来被贬谪黄州，苏东坡又时而采用蜀地的方式烹茶，如元丰六年（1083）他在黄州饮用友人赠送的茶时，“姜盐拌白土，稍稍从吾蜀”。次年，苏东坡从黄州北上，在泗州游览当地的南山时，写了一首著名的咏茶、咏春盘的词《浣溪沙》：

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明 仇英 写经换茶图（局部）

元祐二年（1087），苏东坡在京城担任翰林学士，按照惯例，可以获得宫廷赏赐的第一批“龙团”，即“头纲龙茶一斤”，一斤等于八饼。苏东坡写了《行香子·茶词》歌咏此事：

绮席才终，欢意犹浓。酒阑时、高兴无穷。共夸君赐，初拆臣封。看分香饼，黄金缕，密云龙。斗赢一水，功敌千钟。觉凉生、两腋清风。暂留红袖，少却纱笼。放笙歌散，庭馆静，略从容。

从前初入汴京喝小龙团时，苏东坡还未体味茶的妙处，如今年过半百，得到宋哲宗赏赐的“密云龙”，就着急在庭院中品尝了。苏东坡还常拿出密云龙招待至交，如“苏门四学士”。四学士在诗文中留下诸多关于密云龙的记载，如黄庭坚有《和答梅子明王扬休点密云龙》《博士王扬休碾密云龙同事十三人饮之戏作》等。

密云龙本是皇家御用，太皇太后高氏为了笼络大臣，不时赏赐密云龙给朝臣和贵族。结果，不少皇亲国戚、权贵近臣都来请求赏赐，让这位太皇太后也有些烦恼，一度想下令建州不许再制作和进贡密云龙、小龙团。

被贬谪到惠州后，苏东坡在白鹤峰上自建了一处房舍。一天苏东坡在附近游逛，在松树丛中发现了一株野茶树，他将茶树从荆棘丛中挖出来，移植到白鹤峰上。苏东坡并不期待收获多少茶叶，仅仅是为了嗅闻其味道。白鹤峰下是一条河流，有时候儿子、仆从去忙其他事，苏东坡就自己带着瓢走小路下山到江边取水，把江水带回屋澄清后用来煮茶。苏东坡写有《汲江煎茶》，记述自己夜晚煮茶的孤寂心情：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
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此时苏东坡已经没有了密云龙，没有了小龙团，得到什么茶就喝什么，也没有了那么多识趣的门客、捧场的文士，只能独自品尝清茶，把一肚子衷肠放入诗歌中聊以自慰。

苏州：美人送别

苏州自从春秋时代以来就是东南经济中心，人烟密集，经济繁荣。苏东坡南下杭州为官，来回路上必然要经过苏州。

第一次，熙宁四年（1071），苏东坡沿着运河南下去杭州当通判，十一月途经苏州，参观了一直向往的虎丘、报恩寺等景点。在杭州任职期间，苏东坡与苏州的佛寺、僧人打过交道，曾奉杭州知州陈襄之命，作文邀请苏州有名的宗本圆照禅师到杭州住持南屏山的净慈寺，又推荐成都的通长老到苏州担任报恩寺的住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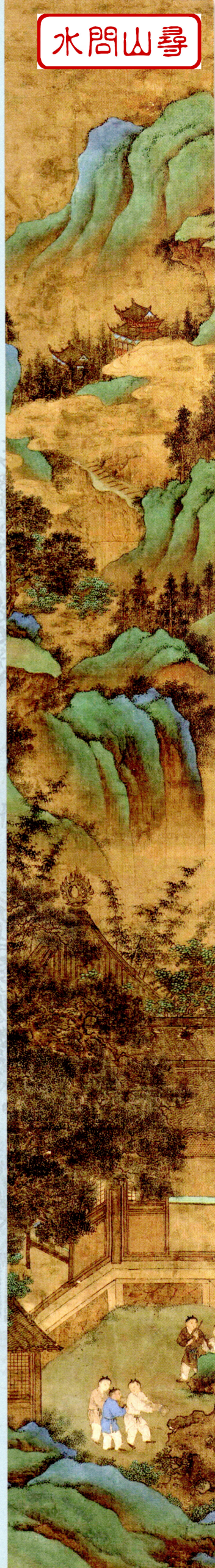
第二次，熙宁七年（1074），苏东坡从杭州北上去密州，十月初抵达苏州城。在知州王诲举办的招待宴席上有一位官妓，苏东坡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经过苏州时都见过她。这位女子神色凄然地问苏东坡是否还会回苏州，于是王诲让苏东坡写一首词赠给她。苏东坡当即把她说的苏州话用在词中，作了一首《阮郎归》：

> 一年三度过苏台，清尊长是开。佳人相问苦相猜，这回来不来？
> 情未尽，老先催。人生真可咍。他年桃李阿谁栽，刘郎双鬓衰。

第二天，这位多情女子前来送别，她的吴侬软语让苏东坡感慨万千：自己这样高中进士、制科之人仍然在地方当知州，不知前途如何。哪些以前在汴京认识的那些进士同年、馆阁同僚，还有在地方交往的州县官员，都不怎么和自己联系。那些快速升迁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似乎只有歌妓还在殷勤地送别自己。如今头已半白，壮志未酬，也是天涯落魄人，幸得美人相知，于是赠她一首《醉落魄·苏州阊门留别》：

> 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旧交新贵音书绝，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
> 离亭欲去歌声咽，潇潇细雨凉吹颊。泪珠不用罗巾浥，弹在罗衫，图得见时说。

第三、第四次都在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南下出任湖州知州，四月沿运河南下经过苏州吴淞江口。或许是有了终老江南的打算，苏东坡让人在苏杭花一千两银子买了两个十四五岁的少女作侍婢。他想要在山水之间，在歌女的浅斟低唱中醉去、老去。其实这一年苏东坡才四十四岁，对于官场来说并不算老，只是这些年他被新党排挤在地方当官，心中不得志，心态时有颓唐。到了秋天，“乌台诗案”案





发，御史台的官吏押送苏东坡到汴京，途中匆匆经过苏州，这一次当然没有官员设宴招待，也没有美人相送。

第五次在元祐四年（1089），苏东坡从汴京去杭州任知州，六月底经过苏州。

第六次是元祐六年（1091），苏东坡从杭州回京，三月路过苏州，自然受到了苏州官员的招待。

以后的岁月里，苏东坡没有再路过苏州，可是他与苏州的人依旧有联系。绍圣二年（1095），苏东坡在惠州时，一天苏州定慧寺的杂役卓契顺突然上门拜访，带来了苏迈的信件和定慧寺长老守钦写的《拟寒山十颂》。之前，苏迈在闲聊时偶然提及自己很久没有得到父亲的信札，十分担心，卓契顺便说：“你不用忧愁，惠州并不是远在天上，一定能够走到，我可以帮您把信送到苏公那里。”于是他带着苏迈、苏迨和师父守钦的信，花费数月时间南下来到惠州。卓契顺停歇了几天，便带着苏东坡的回信北上。苏东坡非常感动，问该如何报答他，卓契顺说：“我没有什么索求，才会来惠州。如果有所祈求，应当去汴京找权贵啊。”苏东坡一再想感谢他，卓契顺就说：“当年颜真卿给帮助自己的蔡明远写了一幅书法，让他的名字流传后世，那您也给我写幅字吧。”苏东坡就写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和序言赠给他，还写了八首和定慧寺长老的诗。但卓契顺临走时，苏东坡还是焚毁了这八首诗的手迹，他担心这些诗传到苏州，会让小人寻找字句诬陷，惹来麻烦。

明　仇珠　行乐图（局部）

水問山尋

滕元发：扁舟相会

滕元发是名臣范仲淹的表弟，皇祐五年（1053）考中进士入仕。他与张方平为儿女亲家，而张方平乃是提携苏东坡兄弟的贵人，故而滕元发和苏东坡在嘉祐、熙宁年间就有交往。因为滕元发比苏东坡大了十几岁，故而苏东坡在信中往往尊称其为“公”。

滕元发自少年就豪迈不羁，身材高大，气度不凡，口才、能力都相当突出。宋英宗见到滕元发后，觉得他是个难得之才，特意记下滕元发的名字。治平四年（1067）宋英宗早逝，宋神宗即位后，知道父亲当年有意任用滕元发，便召见他谈话，觉得他对治乱之道颇有见解，切中时弊，不禁出言称赞：“天下名言也！”于是立即委以滕元发知制诰、知开封府，不久后又提拔他为御史中丞。当时的宰相曾公亮想要任命自己的儿子主掌受理臣民章奏的登闻鼓院，遭谏官杨绘反对，宋神宗却批评谏官不懂朝廷之事。滕元发就此建言，假如有人通过登闻鼓院状告宰相，宰相的儿子如何向宰相传达状子？而且，天下臣民见宰相的儿子主掌登闻鼓院，还敢来这里反映朝廷政事的得失吗？于是宋神宗就否定了曾公亮的任命。熙宁元年（1068），滕元发曾再度知开封府，不久后调任翰林学士。此时擢升执政（副相参知政事），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开封府知府、御史中丞进拜，俗称为“四入头”，滕元发无疑也是执政的有力竞争者。

宋神宗在治平末年、熙宁初年组建的人事团队中，滕元发是重要成员。宋神宗经常召见他，连皇室讳莫如深的太宗北伐惨败的细节也对滕元发流泪诉说。在当时，滕元发得到的皇帝的眷顾不输王安石。宋神宗经常遣小黄门带着亲笔书写的短札与滕元发商量事情，滕元发不够谨慎，把短札拿给别人观看。有小人见手札中有错字，便上书攻击滕元发这样做是故意“扬上之短”。此后宋神宗便疏远了滕元发，将他外放到地方当知州。对滕元发的道德、才能，当时的重臣看法不一，富弼、曾公亮认为他是“奸人”。王安石从前与他共同主持考试，在言语上互不相让，也厌恶滕元发。故而王安石成为参知政事、宰相后，也竭力排斥滕元发。宋神宗几次提出调滕元发回朝为官，都被王安石劝阻。因此，滕元发一直在地方任职。

熙宁八年（1075），滕元发的妻弟李逢卷入一桩所谓的“谋反”案。李逢有议论朝政的言论，并和在汴京颇有名气的蓬州游士李士宁有来往。李士宁供出自己和宗室子弟赵世居、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御医刘育等人交往的细节。最后赵世居被缢杀，李逢等人被凌迟处死。在家守孝的滕元发和李逢仅仅是日常的礼节往来而已，没有卷入谋反的阴谋，却也被一些人攻击，被撤去翰林侍读学士、礼部侍郎官职，等守孝期满后只能在地方担任知州。

同样被排挤到杭州当通判的苏东坡与滕元发书信往来不断，滕元发因亲党谋反受累时，把自己的文书草稿寄给苏东坡过目，请他修改之后才上奏。苏东坡被贬黄州时，滕元发调任安州知州时绕道黄州探望，此后两人书信来往更多。元丰六年（1083）年底，宋神宗在南郊祭天典礼后颁布了大赦的恩典，担

任安州知州的滕元发应召入朝为官。苏东坡特地写信劝说滕元发回朝后不要重提旧事，不要议论新法的不是，免得惹宋神宗恼怒。苏东坡觉得当初反对新法的众人，包括自己在内，有情绪化、简单化的毛病。“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苏东坡对自己以前的观点有所反思，觉得对新法、新政的举措不宜一概反对，要就事论事，分析利弊。从这个立场出发，他既无意歌颂新法以便升官，也觉得不必再针对新法进行全盘攻击、激烈争吵，要承认十几年变法之后的新格局。既然宋神宗想调和新旧两党，任用一些旧党官员，那相关人等各司其职，力争有所作为就好，不必再纠缠旧事。

元丰七年（1084），苏东坡从黄州北上，在真州（今江苏仪征）时与滕元发相约在金山会面。苏东坡在写给友人贾耘老的信中形容见面的场景是“久放江湖，不见伟人。昨在金山，滕元发以扁舟破巨浪来相见，出船巍然，使人神耸”。这时的滕元发已经六十五岁，两人都经历过受审、贬谪的苦楚，政治观点也类似，见面时不由得流下眼泪，都十分感慨。滕元发给苏东坡出主意，让他把从前刊印诗文的书版都公开烧毁，向宋神宗表明悔罪的态度，然后上表请求到常州闲居，应该能得到宋神宗的允准。苏东坡决定北上去扬州请教吕公著，再上表宋神宗。

不久，滕元发出任湖州知州。苏东坡喜欢去山林中游览，为了外出游览时方便携带食物，他写信给滕元发，叮嘱他找湖州的能工巧匠给自己制作两件“朱红累子”，带二十四个小隔间的那种。这是一种简易而精美的朱漆食盒，每个隔间可以放小点心、干果之类食品，方便仆从携带。后来，滕元发果然给他送来两套。之后苏东坡去登州（今山东蓬莱）当知州，也给滕元发寄送了当地的土特产。

元祐五年（1090），滕元发在赴任扬州知州的途中亡故。滕元发生前就拜托张方平给自己撰写墓志铭。此时张方平已八十四岁，垂垂老矣，便请苏东坡代自己写这篇文章。苏东坡怀着深情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长篇墓志铭《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历数滕元发的吏治和军事才能，赞美其事君尽其忠，待友尽其义云云。苏东坡还另外写《滕达道挽词二首》，称赞滕元发“先帝知公早，虚怀第一人”。



水問山尋

密州：主政一方

密州，是苏东坡第一次当知州的地方。

熙宁七年（1074），苏东坡接到朝廷公文，调任山东东南部的密州知州。十二月三日，苏东坡才抵达密州州府所在的诸城县城。诸城的城郭呈“凸”字形，南城面积较大，人口较多，是县政府所在地，北城面积较小，是州府所在地，南北城之间还有一道城墙。诸城只有几万人口，比杭州少得多。城里有南禅寺、资福寺等数家佛寺、道观，风景当然无法与西湖周边的那些佛寺相比。

密州的腊月天寒地冻，风土与杭州大为不同，苏东坡又因杭州北上途中频繁参加酒宴，作息不规律，到任没几天就得了痔疮，只好在家中养病。除夕这天，苏东坡醒来后，看见仆从疲倦地靠在桌边，屏风被碰开了，老鼠在桌案下嗅来嗅去。恰在这时，屯田员外郎、京东路提刑段绎派人带来问候信，苏东坡倍感凄凉，于是回了一首《除夜病中赠段屯田》。此时苏东坡心绪惆怅，觉得自己“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犹如一块埋在灰中即将燃尽的木炭，对仕途心灰意冷，打算再干几年就告老回家归隐。

当然，苏东坡是性情中人，并不会长久沉溺在低落情绪中。进入熙宁八年（1075）正月，一场大雪让他大为兴奋。早上他起来看到满城是雪，急忙到官署北园相连的北城墙上一处突出的瞭望台上观赏雪景，隐约看到城南远处的马耳山顶部两块状如马耳朵的巨石，当即在墙壁上题写了《雪后书北台壁二首》，其一云：



水問山尋

黄昏犹作雨纤纤，夜静无风势转严。
但觉衾裯如泼水，不知庭院已堆盐。
五更晓色来书幌，半夜寒声落画檐。
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

密州下辖胶西、高密、安丘、诸城、莒县五县。进入密州境内，苏东坡不时看到农民用蒿草裹着蝗虫尸体焚烧，他一到官署，立即询问蝗灾的状况。官吏报告说，大群蝗虫遮天蔽日地飞来，目前密州农民捕捉的蝗虫多达三万斛，奇怪的是，京东路的官员却对朝廷报告说蝗虫没有造成什么灾害。苏东坡向农夫野老打听灭蝗方法，鼓励百姓下田灭蝗除卵，发米作为奖励。这项举措既可以赈济灾民，又可以治蝗，农民不断送来捕捉到的蝗虫，在县城外埋了八千斛蝗虫卵。

密州偏僻贫瘠，人口少，公务比杭州清闲，但这里民生的艰困让苏东坡十分担忧。蝗灾之后，第二年的小麦收成肯定不好，苏东坡上奏朝廷，陈述密州遭遇的严重蝗灾，请求减免密州的秋税或暂停征收青苗钱，同日还写信给宰相韩绛陈述灾情。苏东坡还把赈灾剩下的几百石米单独储藏，每月发米六斗雇请民众哺育弃儿，这个方法救活了数千婴孩。

在密州任知州时的所见所闻让苏东坡对民间疾苦有了深入的了解，对南北的经济、民生差异也有了更多认识。此后他对朝廷的各项政策更从实际效果出发分析利弊，而不仅仅是从派系、理念出发进行取舍，这成了之后他从政议事的一大特点。

明　仇英　上林赋图（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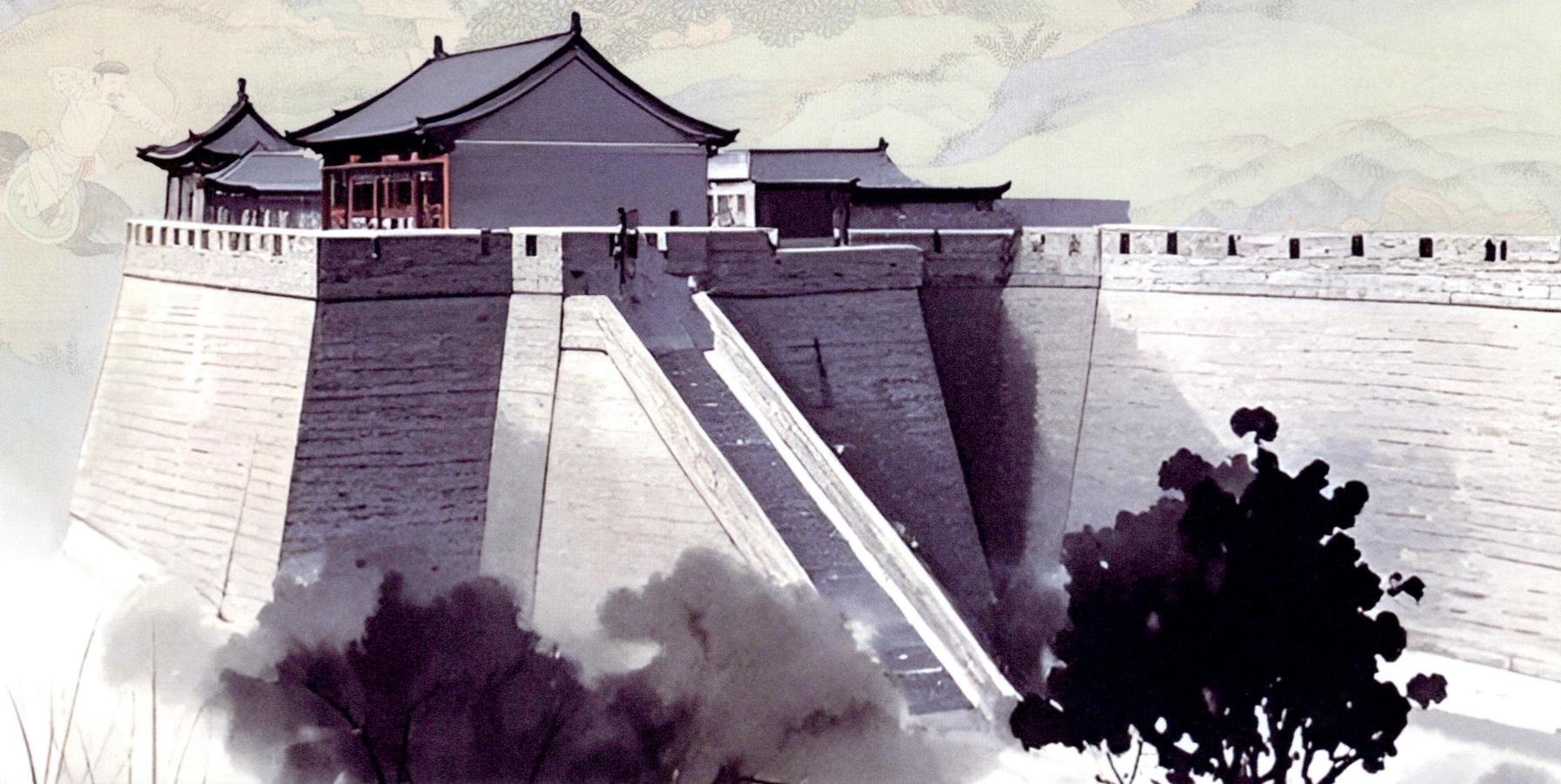


公务之余，苏东坡也有不少时间游览密州。秋冬之际，密州的猎户、士兵喜欢到荒野狩猎，苏东坡对此也有兴趣，带着官吏、士兵到常山祭神、狩猎。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借出猎一事抒写了苏东坡渴望报效朝廷的慷慨意气和壮志豪情。

苏东坡对营造园林兴趣浓厚，他整修官署、园林时，把与官署北园相连的城墙上那处可以观景的北台修整了一下，此后经常在那里摆酒欣赏风景。弟弟苏辙听说后，来信建议参照《老子》中“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和庄子主张的“超然不累于物”的思想，命名为“超然台”，并写了《超然台赋》。苏东坡自己也写了一篇《超然台记》，表达“游于物之外”的心境。之后，苏东坡还把官员文勋临摹的《秦琅琊台刻石》刻碑立在超然台上，把京东西路提刑李清臣登临超然台后作的赋刻石立在台上。

苏东坡还命人修整城墙西北的亭子，这座亭子在潍水边的官道之侧，是密州人送别亲友的地方，苏东坡命名为“快哉亭”。他又让人把一条废弃河沟中的石头运到官署北园的城墙下，修造了五座假山，在周围栽种松、柏、桃、李，还特地在官署北堂后面开辟北门，方便人们欣赏这几座假山，还写了《山堂铭》记述此事。

苏东坡又在官署黄堂北面修建了一座开敞的轩堂，命名为“盖公堂”，纪念西汉信奉“黄老无为之道”的先贤盖公，也有针对时政的寓意。他在《盖公堂记》中说家乡有人得了小病，去求医生诊治，医生为取得酬金夸大病情，给患者开有各种猛药的方子，结果患者吃后病情更严重了。连续换了三个医生都是如此，后来有长者建议他不要吃药，正常养气、吃饭，病自然就好了。显然，这是比喻大宋本来仅仅有些“小毛病”，可是宰相为了自己能执政，夸大存在的问题，然后出台各种政策“治病”，结果闹出了更多乱子。苏东坡认为宋神宗已经三次换相，王安石以来的宰相大多爱好大肆改动政令，文武官员也追求用严刑峻法增加税收以博求个人政绩，利用开边战争来升官发财。他期望朝廷能采取如盖公所言的治理之道，让民众休养生息。



熙宁九年（1076）十一月十五日，苏东坡接到调职公文。他在给新任密州知州孔宗翰写的诗歌《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中，担心密州今年的粮食收成，为自己无法解救本州老百姓的疾苦而愧疚，只能把“十万贫与羸”托付给孔宗翰，希望他能好好治理：

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
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
方将怨无襦，忽复歌缁衣。
堂堂孔北海，直气凛群儿。
朱轮未及郊，清风已先驰。
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
滔滔满四方，我行竟安之。
何时剑关路，春山闻子规。

元丰八年（1085），苏东坡赴任登州知州，途经密州。密州知州霍翔在超然台上设宴招待苏东坡。百姓听说苏东坡经过，纷纷前来探望。苏东坡看到他当年让官府资助民众收养的那些弃婴已经成了十来岁的少年，而自己已是头发斑白之人，十分感慨。

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物非有大小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反复

反复：

指悲喜忧乐变化无常。

眩乱

眩乱：

迷乱。

水問山尋

超然台记（节选）

苏轼 作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以有尽逐无穷，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

盖

盖：
掩盖、遮蔽。

水問山尋

词：另辟新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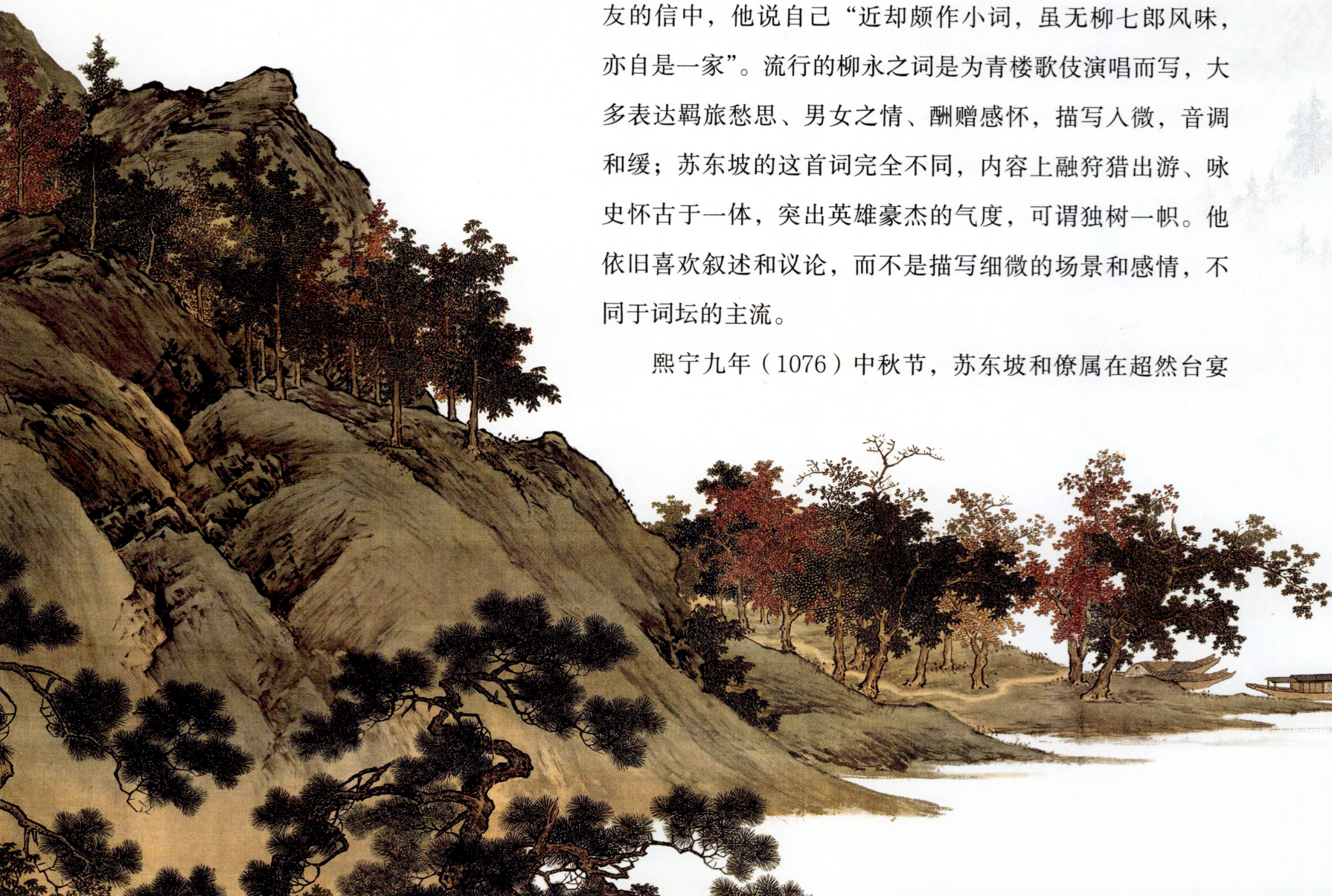
在杭州当通判的三年里，苏东坡陆续写了近五十首词，这是他的第一个写词高峰。苏东坡写的许多词都可读而不可唱。好的词要兼顾许多细节，一向跳脱率性的苏东坡不爱遵守这些戒律。当然，不仅苏东坡一人如此，晏殊、欧阳修的词也有类似特点。不过这时候苏东坡的词还不如他的诗、文出色，可以说是“词以人传”。他的诗、文名气越来越大，成为名人，顺带着一些歌伎也以演唱“苏学士”的词为荣。渐渐地，苏东坡的词也就传开了。

苏东坡在密州当知州时，对狩猎之事有兴趣，常带着官吏、士兵到常山祭神，感谢神灵护佑。苏东坡在常山下的黄茅冈、铁钩一带狩猎，看到有士兵牵着黄毛猎犬、手臂托起猎鹰，在山岗草地之间奔走。苏东坡不禁想起朝廷与辽国在边境的对峙，以及与西夏发生的战事，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去边疆立下功勋，写下一首词《江城子·密州出猎》：

>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东坡让士兵吹笛、击鼓，并歌咏此词助兴。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自己“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流行的柳永之词是为青楼歌伎演唱而写，大多表达羁旅愁思、男女之情、酬赠感怀，描写入微，音调和缓；苏东坡的这首词完全不同，内容上融狩猎出游、咏史怀古于一体，突出英雄豪杰的气度，可谓独树一帜。他依旧喜欢叙述和议论，而不是描写细微的场景和感情，不同于词坛的主流。

熙宁九年（1076）中秋节，苏东坡和僚属在超然台宴



饮，从夜晚一直饮到第二天曙光微现。此时有消息说山东曲阜人孔宗翰上书请求来密州出任知州，有下属对苏东坡讲了孔氏和密州的渊源：至和元年（1054），孔宗翰出任仙源县令，经过诸城时在官舍中与密州官员陈宗古、任建中一起过中秋节，相谈甚欢；熙宁三年（1070），孔宗翰提点京东路刑狱，过诸城时又是中秋节，可陈宗古、任建中两人已然亡故，孔宗翰感慨不已，在馆舍墙壁上题诗一首。有人当场背诵了孔氏的题诗：

屈指从来十七年，交亲零落一潸然。
婵娟再见中秋月，依旧清辉照客眠。

这首诗激发了苏东坡的思绪，明月之下，他不由得想起故去的亲友、远方的弟弟，当即在酒宴间作了《和鲁人孔周翰题诗二首》。他意犹未尽，又写了一首词《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东坡发挥他的想象力，先设想月宫中的神仙是否也如人间一样过中秋节，想飞到月亮中去问问仙人。然后退了一步，说想来月宫太高太冷，自己还是回到现实，回到月光照耀下的城池和人间。他安慰自己，孤寂难眠的人不必因无法团圆而伤心，自古以来悲欢离合就是常事，只要亲友能安乐长寿，在不同的地方能欣赏同一轮圆月，也足够欣慰了。他写的这类词想象奇妙，与晏殊、欧阳修、柳永、张先等词坛大家的风格都不同，已经卓然而立，堪称别具一格。

后来被贬谪黄州，苏东坡也经常写词，并在元丰五年（1082）春天有了一次可以与出三峡那次的“写诗之旅”相提并论的“作词之旅”。他开垦的东坡是官府所属的旧营房，随时会被收回，而且地势较高，难以灌溉，前一年秋天种下的十亩小麦、三百棵黄桑的长势都不大好。于是苏东坡打算买一块更适合居住、耕作的土地，以便长期定居。

三月七日，苏东坡和亲友去黄州县城东南三十里处的沙湖看田地，半路上突然下起了雨，同行诸人纷纷狼狈地找树木、岩石躲雨，苏东坡则浑然不觉，依旧漫步而行。过了一会儿，天气变晴，他就此创作了一首《定风波》：

水問山尋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沿沙湖走了一圈，并没有看到合适的地块。众人顺便游览了蕲水县城外二里的清泉寺，传说那里的“洗笔泉”是王羲之练习书法用的，下面还有一条叫兰溪的小河，自东向西流去，与通常河流自西向东的流向不同，苏东坡有感而发，作了一首词《浣溪沙》：

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在这里，苏东坡和朋友大饮一场，入夜时才乘船沿着蕲水回家。船靠岸以后，他看到路边有个乡村小酒馆，又进去喝了几杯酒。在月色映照下，他想要骑马回家，走到一座小桥上时，感觉自己摇摇晃晃，就在桥上下马，想躺下稍微休息一会儿，结果睡着了，醒来时发现天色已经拂晓，远山依稀可见，流水淙淙有声，于是在桥头木柱上题写了一首词《西江月》：

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语桥柱上。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此时的苏东坡，已经被磨炼得愈发豁达，不再把仕途变故放在心上，转而注重美景、美食，以及与友人的交流。在心境上，他以空幻观照万事万物，时有警句奇喻，别有一股旷达超脱之气，达到一种前人未曾触及的新境界。苏东坡对自己这段时间的词作也很得意，他在给陈慥的信札中说“近者新阕甚多，篇篇皆奇”。

这些词作的出现，或许是因为暂时离开黄州，让苏东坡的心灵比从前放松。他一路走，一路喝酒，具体的山水、人物带来的刺激使他灵感喷涌，这才写出了格调超然之作，这让他自己也感到惊讶。这是苏东坡创作中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峰，此后他也未能再达到这样的境界。

婉约词

婉约词是中国古代词坛的重要流派之一，以细腻、含蓄、柔美的风格著称。多写男女情爱、离别之绪、伤春悲秋等，情感细腻、含蓄，注重内心情感的表达。语言圆润清新，注重音律和谐，情景交融，具有柔婉之美。创作中强调“辞情蕴藉”，追求含蓄、委婉的表达方式，避免直白和浅露。

宋代代表词人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她的词前期多写闺情，后期多悲叹身世，风格清新婉约，代表作有《如梦令》《声声慢》等。

秦观：其词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代表作有《鹊桥仙》《满庭芳》等。

周邦彦：精通音律，作品多写闺情、羁旅，格律严谨，语言曲丽精雅，代表作有《兰陵王》《六丑》等。

柳永：其词作多描写都市生活和男女情爱，语言通俗易懂，代表作有《雨霖铃》《八声甘州》等。

晏殊：其词语言清丽，声调和谐，代表作有《浣溪沙》《蝶恋花》等。

晏几道：晏殊之子，其词风格清新婉约，代表作有《临江仙》《鹧鸪天》等。

贺铸：其词内容丰富多样，兼具豪放与婉约之长，代表作有《青玉案》《鹧鸪天》等。

如梦令

李清照 作

昨夜雨疏风骤，
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
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徐州：抗洪救灾

熙宁十年（1077）四月二十一日，苏东坡一行到达徐州。徐州下辖彭城（州府所在）、沛、萧、滕、丰五个县，彭城城墙北部就是汴水、泗水汇流之处，泗水沿东城墙外朝南流向淮河，所以这里的气候比密州湿润温暖，城内外约有几万人口，比密州州府略微繁华一些。

与干旱的密州不同，徐州经常发生水灾，这年六月连续下了很久的雨，苏东坡带僚属到城南七十里处的汉高帝庙祷晴。很快，他和徐州城就会面临一场大洪水的生死考验。

七月上中旬，中原、两淮各处连日下大雨，黄河水位暴涨。七月十七日，黄河水冲垮了上游澶州曹村（位于今河南濮阳）的水坝，河水不再按以前的河道向北流，而是向南冲入梁山下的湖泊。有一路河水沿着北清河流入大海，另一路沿着河道流入泗水、淮河，浩浩荡荡的洪水冲击了沿途四十五个郡县。八月二十一日以后，徐州附近的汴水、泗水水位越来越高，原来清澈的河水都变成了黄色的洪流，很快就要与河道齐平。徐州城东南部有云龙山、吕梁山、戏马台、百步洪等山岭、崖石等，洪水来临时容易积水，这会导致洪水反复浸泡、冲击徐州的城墙。如果城墙倒塌，将是一场大灾难。

苏东坡紧急咨询当地耆老，他们说以前发大洪水时都是在西北、东南两处城墙外修筑一圈堤坝，阻止洪水直接冲击城墙。于是苏东坡急忙征发五千余名民夫开始动工。他还到驻守在徐州的禁军武卫营中，跟军队长官说这是徐州生死存亡之时，情况紧急，需要士兵的帮助。军官也知道情况紧急，便不再顾及平常的管理体制，下令士兵紧急出动，帮助徐州民众施工。军民昼夜不停地在徐州城西北修建了一道预防汴水洪水的堤坝，在东南城墙外修筑了预防泗水洪水的堤坝。徐州城内本来有十五个大坑可以取土，可如今阴雨绵绵，都溢满了水，根本没法挖土。军民只好挖掘城南凸起的“亚父冢”（当时传说是范增墓，今考古挖掘证实是东汉彭城王陵）上的泥土，在东南角修筑了一座高一丈、宽两丈、长九百八十四丈的防洪堤，以保护这段城墙。

为了观察水情、监督工程、稳定人心，苏东坡搬到城墙上的阁楼居住，每天穿着蓑衣巡视各处，命官吏分段严密监视洪水情况，分发官仓中的粮食给官民食用，保证城内的稳定。到了九月九日，因为日夜下雨，城南已经到处都是泥水，城墙外洪水轰鸣而过，城里人心惶惶。许多富户看到情况危险，都想乘船出城逃走，苏东坡担心民心动摇，让守城士卒把他们从河边赶回来。城外一些人家的房舍都被洪水冲毁，一些人被洪水冲走，还有一些人跑到山头。苏东坡见那些人又冷又饿，就派人驾船去给他们送去救济的粮食。九月二十二日，两处堤坝修完的第二天，泗水河道中的洪水冲到东南城墙外。洪水比徐州城里的平地高出一丈多，一旦冲毁城墙，后果不堪设想。还好军民修筑的防洪堤足够坚固，一直没有倒塌。渐渐地，雨停了，水位逐渐降低。从十月五日开始，洪水逐渐退去。

这次率领军民力战洪水，是苏东坡在地方当官中最为紧张和危险的经历。他在城墙的阁楼上住了七十多天，回到官署，见那里遭受洪水浸泡太久，需要整修，就到徐州城东南五十里外的吕梁山悬水

村中住了一段时间，这才有闲工夫游览，与朋友诗文往还。

元丰元年（1078）年初，宋神宗赦令嘉奖苏东坡防洪的功劳，给参与修墙、抗洪的数千民夫赏赐钱财。苏东坡将宋神宗的《奖谕敕记》连同抗洪的记录刻石立碑，把详细的经历写成《熙宁防河录》，保存在官府档案中，以备后来徐州的官员参考。苏东坡趁热打铁，上书申请在徐州城外修筑木头堤岸及外城，以保护主城墙。朝廷拨下钱、米，准允雇佣三千多人在徐州城外修筑“外小城”保护主城墙，修建四条“木岸”，填平城内的十五个大坑。所谓“木岸”，就是收集大小木材、树枝，捆捆相连，放在河床两侧，用桩钉固定，这样既可以阻止河水直接冲击河岸，也能减少泥沙淤积。

徐州子城的东门内是官府的仓库，苏东坡让人重点加固这里的城墙。在工地上，他想起一年前在东门的城墙上饯别苏辙时，弟弟说这里可以欣赏山川美景，适合修一座观景的楼阁。正好官署中有座年久失修的废楼，民间传说是秦末义军首领项籍修建的，苏东坡让工匠拆下这座废楼的木材，在东门城墙上修建了一座楼阁。苏东坡把此楼命名为“黄楼”，因为土是黄色的——按照“五行相克”的观点，土克水，寓意战胜洪水。他还让人用黄土涂抹楼阁的外墙，这就更名副其实了。苏东坡将苏辙的一篇赋书写后刻石立在楼上，又托亲家石康伯带信给文同，请他撰写一篇《黄楼赋》用来刻石，还叮嘱文同多写江山风景，不用太赞誉自己；又送去四幅绢，请文同在上面画竹木怪石，打算制成屏风摆在黄楼中，让文同的诗、画成为徐州的名胜。

徐州盛产铁，有专门负责冶铁、制作兵器的政府部门利国监。冶铁需要众多燃料，官府便四处收购柴火，导致柴价较高，给民众增添了负担。十二月时，苏东坡听说徐州西南几十里外的白土镇（位于今安徽萧县）北面可能有石炭，派人去寻访，果然发现一处煤质很好的煤矿，于是将其开辟并加以利用，大大方便了利国监和普通民众。

徐州的人口、经济繁荣程度远不如杭州，所以本地的僧、道也不多，有情趣的更少。城南三里处有一座云龙山，山东部的佛寺有北魏时期雕刻的大石佛，本地人也称此山为石佛山。山中隐居的张天骥自号云龙山人，养了两只仙鹤。张天骥文化修养不高，不擅长诗文，但在徐州也算是有一定品位的人士。张天骥家的园林颇为雅致，苏东坡常去那里游览。苏东坡也经常去城东南二里的泗水边游览，此处河道中有许多嶙峋的巨石，号称“百步洪”，河水到这里会出现许多旋涡、浪涛，数里之后才恢复平静，是徐州的一处景点。

元丰二年（1079）三月初，苏东坡调任湖州知州。



水問山尋

李清臣：徐州快哉

治平二年（1065），苏东坡经常和喜好诗文书画的官员交往，常跟父亲苏洵出入欧阳修门下，认识了这年九月在“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制科考试中获得第四等的李清臣。

时光匆匆，熙宁九年（1076），李清臣来密州登临超然台后，作了一篇赋，苏东坡把这篇赋刻石立在台上。次年四月，苏东坡到徐州当知州。提点京东西路刑狱司也在徐州郡城东南角，所以那一段时间苏东坡经常与李清臣打交道。李清臣在自己官署边的城墙上修建了一座观景亭，请苏东坡命名。苏东坡就用之前在密州用过的名称，称之为“快哉亭”。

苏东坡和李清臣时常宴饮，他们以前在京城、密州就已认识，私交颇好。李清臣还把梦见自己为孙洙的三女儿簪花的故事说给苏东坡听。李清臣迎娶孙三小姐后，苏东坡还写了一首词打趣，里面有“谁教幽梦里，插他花”一句。

元丰二年（1079），李清臣因收受苏东坡讥讽朝政的文字，被罚铜三十斤。但李清臣颇受宋神宗赏识，之后一路升为尚书左丞。元祐元年（1086），旧党执政后，李清臣被外派到地方担任知州。

高太皇太后病逝后，宋哲宗亲政，李清臣重新得到重用。绍圣元年（1094）二月，宋哲宗没有和宰相商量，直接下旨任命户部尚书李清臣为中书侍郎，经常召他议论政事、人事。李清臣在朝堂上攻击苏辙兄弟改变先帝法度，苏辙反击说：“当年陛下即位时，我们兄弟才从贬谪的地方应召，还没有入京，那时李清臣就是尚书左丞，今天他却说是我们兄弟改变先帝之法，这是欺骗。”李清臣无法再说什么。可惜，宋哲宗已经对苏东坡、苏辙有了成见，之后便找机会把苏东坡贬谪岭南，外派苏辙去地方为官。

李清臣在绍圣末年也被外派任河南府、真定府知府。宋徽宗即位后，李清臣出任门下侍郎，不久又被曾布排挤到地方任大名府知府。崇宁元年（1102），李清臣逝世，享年七十一岁。



王巩：患难之交

苏东坡交往最久的晚辈，可能是王巩。

王巩比苏东坡小十二岁，父亲是宋仁宗时的名臣王素，祖父是宋真宗时的丞相王旦。嘉祐六年（1061）夏天，苏东坡在汴京备考时认识了王巩，当时他十四岁。几年后，王巩娶了张方平之女为妻，而苏东坡则是张方平提携的后辈，两人的人际圈有了更多重合，此后一直往来密切。王巩性格刚强，好出言议论，在官场多次遭遇挫折。他和苏东坡、苏辙关系很好，熙宁十年（1077）在汴京城东的家中筑清虚堂于居室之西，自号“清虚居士”，苏辙为之作《王氏清虚堂记》。

元丰元年（1078）中秋节，苏东坡主持修建的徐州黄楼落成时，王巩特地从南京赶来参加仪式，顺便游览。一次王巩、颜复带着马盼盼等三位官妓去城外，先乘船沿着泗水向北到圣女山，然后掉头乘船南下到百步洪，在船上边吹笛边饮酒，一直到晚上，乘着月色往东门驶来。苏东坡白天有公事，晚上空闲时，换了一套道士穿的羽衣，伫立在黄楼上等他们归来。船靠近时，众人相视而笑。宴饮时，苏东坡对王巩说：“李太白死了后，三百年来再无这样的雅事。”

此后苏东坡和王巩的书信往来愈发密切，还应邀为王巩父亲王素的画像写了赞，给王家的厅堂撰写了《三槐堂铭》。元丰二年（1079）年底，苏东坡的“乌台诗案”结案，宋神宗给予最重处罚的不是苏东坡，而是担任秘书省正字的王巩，他被贬谪为监宾州（今广西宾阳）盐酒税，由开封府官差押解赴任。王巩之前卷入过宗室赵世居的所谓“谋反”案，又再次涉入“乌台诗案”，故而宋神宗对他的处罚最重，去的地方比主犯苏东坡去的黄州更为偏僻。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东坡到黄州不久便接到王巩的来信，让他颇为感慨。苏东坡自觉连累王巩被贬到遥远的宾州，心中抱愧，不敢与王巩通信，不料王巩却先联系自己，没有介意这件事。

元祐元年（1086）年初，王巩得到司马光的推荐，从贬谪之地宾州回到汴京担任宗正丞。王巩在宾州时，一个儿子病死在贬所，一个儿子病死在故乡，他自己也差点儿患病死去。他带着在宾州生下的儿子王皋北上到江西时，把自己在岭外所作的数百首诗寄给苏东坡，请他写了序。苏东坡因为患病，一时无法前去见他，派仆从送去好茶密云龙五饼、双井白芽一饼问安。之后两人相见，都格外感慨，苏东坡一直对这位受“乌台诗案”牵连而遭贬谪的朋友心怀歉意，好在王巩生性豁达，在岭南生活了五年还面如红玉，而且诗文大进。王巩叫出侍妾柔奴为苏东坡献歌，苏东坡问柔奴：“岭南的风土应是不好？”柔奴则顺口回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东坡对这个回答大为赞赏，立刻填词《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一首：

>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
>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宋　佚名　歌乐图（局部）

八月，苏东坡举荐王巩参加制科考试，之后不断有谏官弹劾王巩为人“奸邪”，离间宗室关系、谄媚苏东坡等。让苏东坡愤怒的是，以前王巩受司马光提拔担任宗正寺丞，谏官们都一言不发，现在他却因为自己的举荐频遭弹劾，只能外出为西京通判，后改任扬州通判。

王巩擅长诗文、草书、绘画，在苏东坡的心目中，王巩的小草也颇有韵味，可以传世。元祐四年（1089）三月，王巩升为海州知州，苏东坡在送别时写诗劝他改掉爱说话的旧毛病。六月，朝廷又令他改任密州知州，又因遭谏官弹劾九月离任，获得管勾太平观的闲职。

元祐五年（1090），王巩刚出任判登闻鼓院，就被御史朱光庭弹劾丢了官。元祐六年（1091）正月，王巩得到苏辙、谢景温的举荐出任宿州知州，三个月后又遭到弹劾被免去官职，只好去担任管勾鸿庆宫的闲官。

绍圣元年（1094），苏东坡被贬谪岭南，闲居的王巩约他在南都见面。苏东坡怕引起议论，写信以“省事”为由推辞，还说自己已经坦然地做好准备，“鸡猪鱼蒜，遇着便吃；生病老死，符到便奉行”。元符元年（1098），王巩移送全州编管。

宋徽宗即位后，王巩得到赦免回到南都，建中靖国元年（1101）出任河南府通判，次年又名列“党籍碑”，再次被贬谪到广西，大观年间才获得赦免回家，致仕闲居。王巩移居到高邮终老，政和二年（1112）听闻苏辙在颍昌逝世，他作挽诗三首，感慨与苏家兄弟“交亲逾四纪，忧患共平生。此去音容隔，徒多涕泪横”，称颂二苏“千古各垂名”。

政和七年（1117），王巩逝世，享年七十岁。



马盼盼：夜半歌声

唐代时，徐州刺史张愔宠爱能歌善舞的歌妓关盼盼，白居易去拜访张愔时曾见过她。后来张愔故去，关盼盼在徐州张家宅邸中的小楼“燕子楼”住了十多年，一直没有嫁人。白居易听说后，写了三首绝句《燕子楼》歌咏此事。这成了徐州文人津津乐道的事情，后人干脆在城西南修建了一座也叫“燕子楼”的妓馆，徐州的妓女也喜欢起名叫“盼盼”。宋熙宁年间，徐州有一位官妓马盼盼擅长唱曲、书法，颇有名气。

熙宁十年（1077），苏东坡到徐州任知州，经常在酒宴上召马盼盼来唱曲助兴，一来二去，就成了熟人，关系亲近。有一晚，苏东坡在马盼盼处留宿，却梦见了唐朝的那位关盼盼。醒来后，他去庭院中寻找，望着黄楼的夜景惘然若失，作了一首《永遇乐》赠给马盼盼：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纨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马盼盼一边打拍子一边演唱这首词给苏东坡听。一名在附近街道上巡逻的兵丁粗晓音律，听到歌曲后，细心记下曲词，告诉了友人。结果没几天这首词就在城中传播开来。苏东坡听说后十分惊讶，不明白这首词为何会外传，一问之下才知道是兵丁听到后传开的，只能一笑了之。

水問山尋

湖州：匆匆而别

元丰二年（1079）四月二十日，苏东坡到达湖州，成了此地的最高长官。

湖州下辖乌程、归安、安吉、长兴、德清、武康六个县，州府在乌程县城，乌程、归安两县的县衙也在城内。这座城池约有十万人口，有周长二十四里的城墙围绕。当时祖无颇担任湖州通判，陈师锡担任昭庆军节度掌书记，这两人是苏东坡在湖州时经常打交道的官员。另外，钱公辅的儿子钱世雄担任吴兴县尉，此时与苏东坡也有交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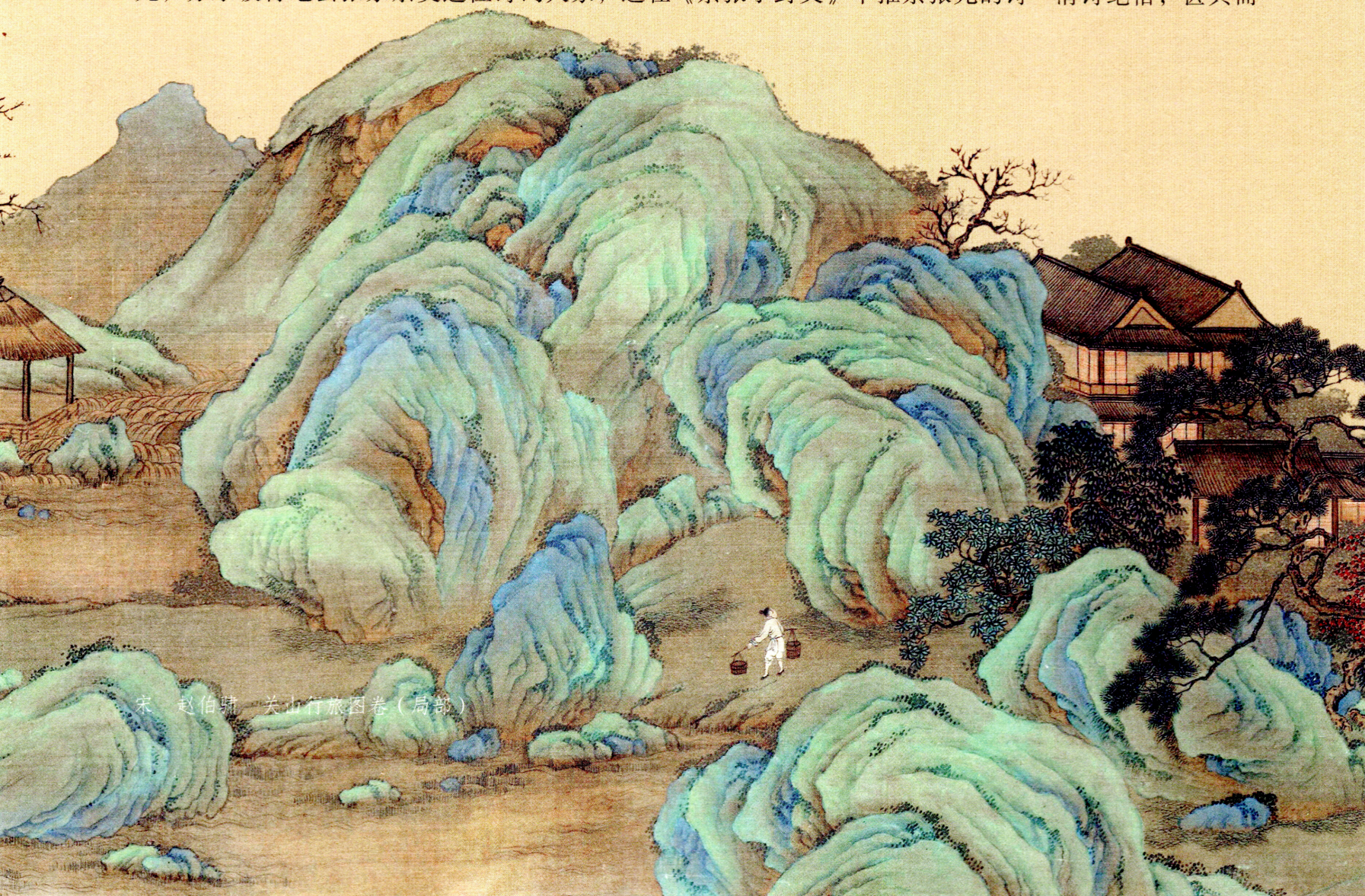
对湖州，苏东坡并不陌生，之前他已经两次到访过湖州：

第一次是熙宁五年（1072）年底，苏东坡担任杭州通判时奉命到湖州公干，顺便游览了当地名胜道场山、何山、天庆观，还拜会了湖州的两位士人，一位是以词著称的张先，另一位是闲居的贾收。之前苏东坡到杭州吴山上的观景楼阁“有美堂”游览时，见到许多文人雅士的题诗，认为贾收的题诗最佳。

第二次是熙宁七年（1074），苏东坡调任密州知州，与离任的前杭州知州杨绘一起北上，曾在湖州与知州李常游玩了好几天。

“卯酒醒还困，仙材梦不成。”来到湖州当知州，苏东坡心情比较愉悦。这里风景优美，又不像杭州那样事情繁多，最适合他此时介于出仕和归隐之间的“中隐”心境。

苏东坡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心中记挂着湖州两位逝世的老友。一位是元丰元年（1078）去世的张先，苏东坡特地去张家祭奠这位诗词大家，还在《祭张子野文》中推崇张先的诗“清诗绝俗，甚典而



宋 赵伯驹 关山行旅图卷（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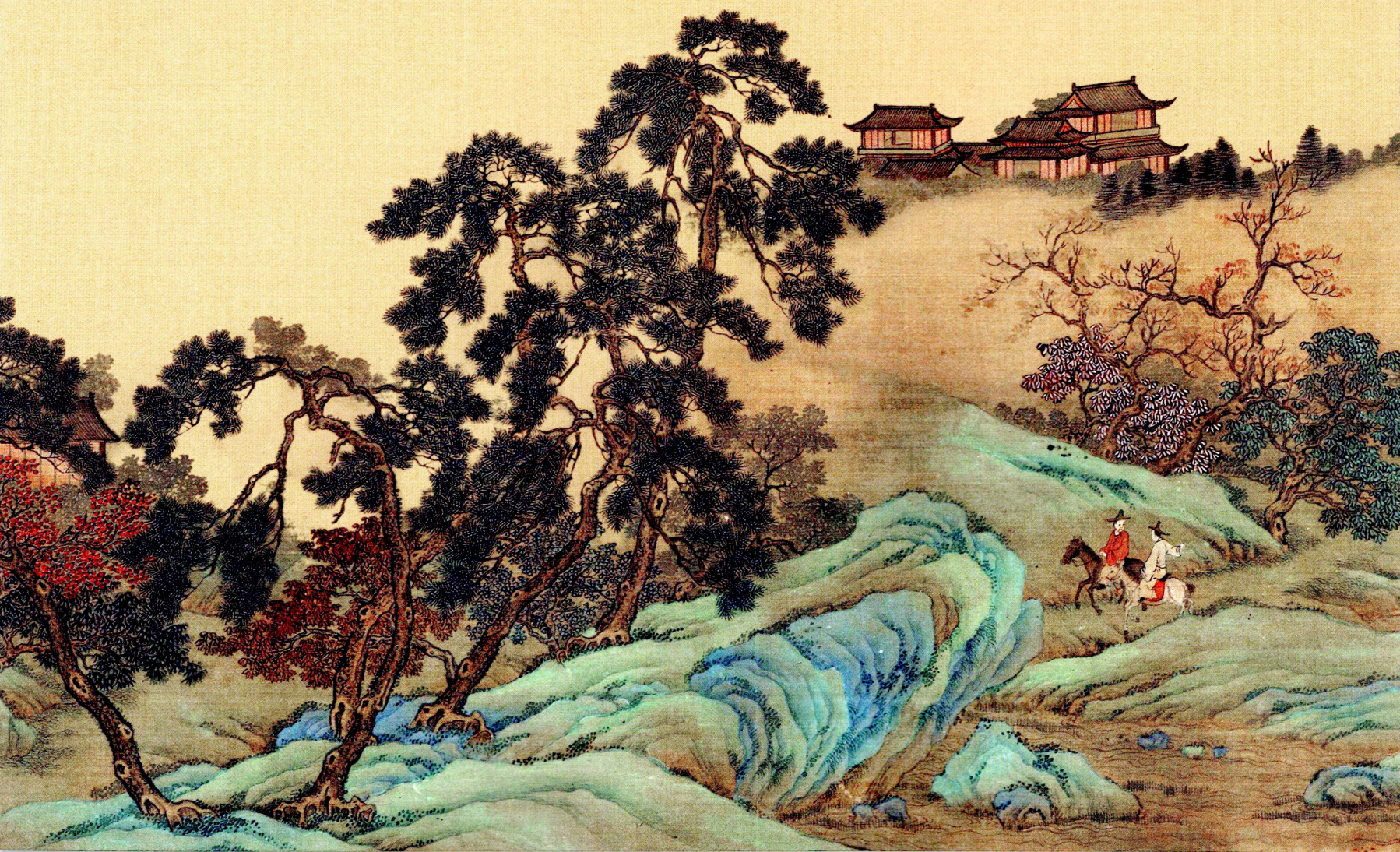
丽”。另一位是熙宁九年（1076）去世的陈舜俞，因王安石再次拜相，陈舜俞又遭到贬谪，于是干脆辞去官职，隐居在白牛村著书立说。苏东坡特地到陈舜俞的湖州老家祭奠，并撰写祭文，向这位才学突出而宦途不顺的前辈致敬。

到任两天之后，苏东坡祭拜了孔庙和城中的主要祠庙，开始熟悉湖州的情况，着手处理公务。湖州连续下了十几天雨，让苏东坡十分担忧，他带着僚属到黄龙洞祭祀黄龙神，祈求天气放晴。

湖州有不少苏东坡的友人，公务之余，苏东坡常和他们四处游览，诗歌唱和。六月，苏东坡带着王适、王遹兄弟和儿子苏迈一起，绕着湖州城墙观赏荷花，然后去城南五里外的岘山游览，傍晚就住在附近的飞英寺的客房中。苏东坡在湖州优哉游哉之时，没有想到汴京的御史、谏官已经盯上了他。

苏东坡是新法的公开反对者，经常在聚会、书信中表达对新法的不满，写过带有讽刺意味的诗文。他到达湖州当日写的《湖州谢上表》中有几句牢骚话：“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其中“误恩”是暗示宋英宗重视自己，把自己放在朝中的馆阁为官，而宋神宗却把自己放在地方通判、知州的位置上已近九年；“新进”自然指那些因为附和变法得到快速提升的官员，苏东坡之前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已有如此说法；“生事”则是之前司马光在奏章中指责王安石变法的说法，王安石曾以《答司马谏议书》进行反驳，所以这两个字眼是许多官员都知道的典故。

“新进”的谏官们开始翻检民间雕版印刷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等诗文集，找苏东坡的把柄。六月二十七日，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弹劾苏东坡“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把民间刊刻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三卷进呈给宋神宗。七月二日，权监察御史舒亶摘选苏东坡涉及议论新法、新政的诗句，指责他“谤讪新政”“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



水問山尋

未有如轼也”。之后，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也上书指控苏东坡，后者认为苏东坡“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有四项罪责：一是被沈括检举之后，苏东坡仍然不悔改，继续写讽刺新政的文字；二是言语狂妄，影响广泛；三是苏东坡的文字会影响舆论，使民众不服从陛下教化；四是明知故犯，抱怨宋神宗不任用自己，诋毁一切政策。这是强调苏东坡讽刺、抱怨的对象不是朝臣，而是宋神宗。

宋神宗于是命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调查苏东坡“谤讪朝政”一案。李定请求宋神宗任命官员调查苏东坡，撤去其官职，将其带回御史台审讯，于是宋神宗让御史台选派官员前去押回苏东坡，并宣布朝旨，撤去其知州官职。想立功的太常博士皇甫遵自告奋勇，带自己的儿子和两名御史台吏卒赶往湖州。

此时，消息已经在汴京官场小范围传开，与苏东坡交好的王诜听说后急忙派人南下，到南京通知苏辙。苏辙急忙派遣亲信乘马赶往湖州通报苏东坡，让他提前做些准备。皇甫遵本来走得很快，但在润州因为儿子生病，多停留了半天，所以苏辙派的人早半天抵达湖州，告诉了苏东坡这则消息。次日，苏东坡请假在家，让祖无颇处理公务。苏东坡回家烧毁、藏匿了大部分信札和手稿，还写了安排后事的信给苏辙，遣散了跟随自己多年的幕僚马正卿。苏东坡决定让苏迈陪同自己进京，拜托在湖州跟随自己学习的王适、王遹兄弟护送其余家人去苏辙那里。

七月二十八日，皇甫遵穿着官服、带着两名白衣青巾的御史台吏卒气势汹汹闯进知州官署，苏东坡吓得六神无主，待在后堂不敢出去。他和祖无颇商量怎么办，祖无颇说既然他们穿着官服来了，还是得出去相见。苏东坡又问自己穿官服还是穿常服，既然有罪，是否不能穿官服了。祖无颇说，你还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当然应该穿官服相见。于是苏东坡穿上官服、手拿笏板会见使者。

皇甫遵和两名吏卒站在官署大堂上一言不发，苏东坡以为事态严峻，宋神宗可能要当场赐死自己，就说：“苏东坡惹恼朝廷的事情很多，今日必然是赐死，对此我心甘情愿，只请给点儿时间让我与家人诀别。”

皇甫遵这才冷漠地开口说了一句：“不至于如此。”



祖无颇上前说："太常博士一定带着朝廷公文吧？"

皇甫遵厉声质问："你是什么人？"

祖无颇说："我是通判，今天是代理知州。"皇甫遵把御史台的公文递给他，他接过公文一看，只是将苏东坡押回御史台审查而已，松了口气，苏东坡也放下心来。

皇甫遵雷厉风行，催促苏东坡马上和家人告别，当日就须出城登船，赶往汴京。

妻子、儿子都哭着送他出家门，苏东坡这时心绪镇定下来，觉得要安排的事情、要说的话已经提前和妻儿说尽了，不必如此悲戚，就回头对妻子说："你怎么不能像郑州诗人杨朴的妻子那样，写一首送别诗和我告别呢？"妻子听了也笑起来。杨朴是以前有名的隐士诗人，宋真宗想任命他为官，他坚决辞谢。宋真宗问杨朴离开家时是否有人给他赠诗，杨朴回说只有妻子写了送别诗，"且休落拓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宋真宗大笑，让杨朴回家去了。

在皇甫遵的监督下，苏东坡带着大儿子苏迈登船离开了湖州。他在湖州只待了九十八天，湖州的官吏、士人都感到惊诧、恐惧，不敢送别苏东坡。只有昭庆军掌书记陈师锡送别苏东坡，安抚他的家人；而王适、王遹兄弟则从官署一直送苏东坡到郊外。这件事马上成了轰动湖州的大新闻，十几天后便传到各地。

元祐六年（1091），太皇太后高氏调杭州知州苏东坡回朝，苏东坡厌倦了朝堂的人事纠纷，实在不愿意回汴京。拖到三月中旬，苏东坡才带着家人离开杭州。僧人思聪陪同苏东坡进京，苏坚、刘季孙、张弼等送行他到湖州，湖州知州张询、福建路转运判官曹辅等为他饯别。苏东坡不由得想起十五年前与张先、杨绘等人相聚的场景，写下一首《定风波》：

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十五年间真梦里，何事，长庚对月独凄凉。

绿鬓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笑水云乡。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

第二天苏东坡就离开了湖州，他对这个地方的美好记忆，或许就定格在这一晚的月光吧。



宋 赵伯驹 关山行旅图卷（局部）

水問山尋

孙觉：墨妙之友

熙宁二年（1069），因为非议王安石的新法，御史孙觉被外派地方。熙宁五年（1072），湖州知州孙觉见松江堤岸经常崩塌，便让民众用石头垒砌一丈多高的岸堤，长达百里。十二月，苏东坡接到转运司的公文，让他去湖州考察用石头修筑河堤的利弊，看看能否在附近推广。苏东坡去之前，先给老相识孙觉写了一首《将之湖州戏赠莘老》，提醒他用当地的美味招待自己。

苏东坡到湖州后，除了考察堤坝，还游览了道场山、何山、天庆观等名胜，拜会了在杭州见过多次的张先，写了《和致仕张郎中春昼》。在孙觉举行的酒宴上，苏东坡开玩笑说，谁要是谈时事就等于违反酒令，就得喝一大盏酒。他们都知道，如今朝廷为了推行新法、压制反对的声音，在汴京设置了“逻卒”，专门侦查和逮捕“谤议时政”之人，士人都不敢在京城随便说话。

孙觉之前把散落在湖州各地的历代碑刻运到官署庭院中，修了一座赏碑的墨妙亭。他邀请苏东坡写了《墨妙亭记》，苏东坡也把自己收藏的羊欣帖的摹本赠给他。苏东坡写有《孙莘老求墨妙亭诗》，提及对书法的看法，表示最为推崇颜真卿和徐浩父子，但并不认为哪位书法家的书风至高无上，而认为“短长肥瘦各有态”，诗云：

兰亭茧纸入昭陵，世间遗迹犹龙腾。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
徐家父子亦秀绝，字外出力中藏棱。峄山传刻典刑在，千载笔法留阳冰。
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
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龟趺入座螭隐壁，空斋昼静闻登登。
奇踪散出走吴越，胜事传说夸友朋。书来迄诗要自写，为把栗尾书溪藤。
后来视今犹视昔，过眼百世如风灯。他年刘郎忆贺监，还道同时须服膺。

临别之时，苏东坡和孙觉相约不谈时事，免得招惹麻烦。当然，这对苏东坡来说又是一时兴起说说而已，他依旧不时在诗文书信中议论时政，后来果然因此招来一场大麻烦。

熙宁七年（1074），苏东坡从杭州北上去密州，路过高邮时，去拜会因祖母过世而在家中守制的孙觉，在其家中读到秦观的诗词，十分欣赏。可惜秦观正在乡下家中备考，没来得及和苏东坡见面。

元祐三年（1088）正月十七日，苏东坡、孙觉、孔文仲担任省试（贡举）的考官。元祐五年（1090），孙觉故去，享年六十三岁。



文同：画中存名

治平元年（1064）夏秋之际，苏东坡在凤翔府当签判时，认识了路过的官员文同。文同比苏东坡大十八岁，生于梓州永泰县（今四川盐亭），于皇祐元年（1049）考中进士，先后担任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因父亲去世，文同回家守制近三年，这次是出川去汴京寻求新职。因为都是蜀人，之前文同和苏洵曾在汴京的社交场合见过，苏洵还向文同求过画，文同爽快应允，却久未践诺，以致苏洵特作一诗《与可许惠所画舒景，以诗督之》。在凤翔，苏东坡与文同一见如故。文同善画墨竹，苏东坡写了《石室先生画竹赞》以表称许，从此自己也留心竹木怪石之类的绘画。

熙宁三年（1070）春天，文同回到汴京，知太常礼院兼编修《大宗正司条贯》。两人时隔六年再次见面，官职都比较清闲，假日里常互相拜访，“虽然对坐两寂寞，亦有大笑时相轰。……书窗画壁恣掀倒，脱帽褫带随纵横。喧呶歌诗聒文字，荡突不管邻人惊。更呼老卒立台下，使抱短箫吹月明”，有时谈到半夜三更才告别。苏东坡百无聊赖，假日里整天与文同谈论诗文书画，文同也指点他画竹木的技巧。

与苏东坡不同，文同不愿就朝政大局发表意见，只是谨守本职工作，业余则以诗、画为乐。苏东坡应邀给文同的书斋撰写了《墨君堂记》，还题跋其创作的墨竹、草书，如《戒坛院文与可画墨竹赞》云：

风梢雨鞚，上傲冰雹。霜根雪节，下贯金铁。

谁为此君，与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同年年底，文同因为宗室袭爵的礼仪得罪了上级，被外派出任陵州（治所在今四川仁寿）知州。他去金梁桥西的净因院与方丈道臻长老告别，苏东坡也陪同前往。文同以前画的两丛竹林屏风摆在方丈室，这日他又在东斋画了两枝竹子、一棵枯木留赠。



水問山尋

熙宁四年（1071），陵州知州文同听说苏东坡去杭州为官，害怕他那张凌厉的嘴闹出麻烦，特地寄来书信告诫苏东坡慎言，“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之后苏东坡在杭州、密州、徐州为官，经常与文同通信，诗歌唱和，写过《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等诗歌。苏辙还把大女儿嫁给了文同的四子文务光，两家成了姻亲。

可惜，元丰二年（1079）正月，文同在前往湖州就任知州的路上染病，在陈州的驿舍病逝。此事让苏东坡对生死无常有了很多感慨。文同富有才华，诗文、草书、绘画都颇为出色，但没有在仕途上发达，死后也没留下什么家产。苏东坡担心他家办理丧事捉襟见肘，特地写信给弟弟苏辙，让他帮忙料理后事。

同年夏天，苏东坡在湖州晒收藏品时，见到文同所绘《篔筜谷偃竹》，想起文同，“废卷而哭失声”，把从前与他交往的细节写成《文与可画篔筜谷偃竹记》一文。次年，苏东坡被贬黄州，路过陈州，去苏辙的大女婿、文同的儿子文务光家中拜祭文同，在文同留下的书法作品上写《文与可飞白赞》，哀悼朋友之逝。元丰四年（1081），文务光乘船护送父亲文同之棺回成都，路过黄州，苏东坡又作了《黄州再祭文与可文》痛悼老友。

以后的日子，苏东坡还多次给文同的绘画题跋。元祐元年（1086），苏东坡在文同的画作中题跋《书文与可墨竹（并叙）》，称述“亡友文与可有四绝，诗一，楚词二，草书三，画四。与可尝云：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既没七年，睹其遗迹，而作是诗：笔与子皆逝，诗今谁为新。空遗运斤质，却吊断弦人”。次年他在另一幅文同的竹画上再次题跋，作《题文与可墨竹（并叙）》，感慨与故友生死两隔：

故人文与可为道师王执中作墨竹，且谓执中勿使他人书字，待苏子瞻来，令作诗其侧。与可既没八年，而轼始还朝，见之，乃赋一首。

斯人定何人，游戏得自在。诗鸣草圣余，兼入竹三昧。
时时出木石，荒怪轶象外。举世知珍之，赏会独予最。
知音古难合，奄忽不少待。谁云生死隔，相见如龚隗。



湖州竹派

湖州竹派的名称来源于两位创始人文同和苏东坡，他们虽籍隶四川，但因文同曾任湖州知州，苏东坡也接任过湖州知州，故以此命名。

湖州竹派是成熟于北宋中后期的文人画代表之一，以竹为主要表现内容。作品抒情寄兴，状物言志，以完全独立的面目立于中国画坛，到元代，逐渐形成中国绘画史上一个重要的画派，在明清时期成为主流。北宋文同、苏东坡，元赵孟頫，晚清吴昌硕是湖州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壮年意气（1062—1079）

文同：被誉为“墨竹大师”，他主张画竹必先“胸有成竹”，并创深墨为面、淡墨为背之法。

苏东坡：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见解，强调绘画应重神似而非仅形似。

赵孟頫：继承了湖州竹派的艺术真谛，提出“书画本同”，倡导“以书入画”。其所画墨竹，能以飞白作石，金错刀作墨竹；所画竹石，虚实结合，相映成趣。

吴昌硕：以粗枝大叶、笔势纵横为特色，强调金石入画，以篆书笔法写竹，功力极为深厚。



宋　赵伯骕　关山行旅图卷（局部）

水問山尋

绘画：流连墨戏

苏东坡的父亲爱收藏画作，苏东坡从小就能接触到画作，他喜欢随手在纸上画些人物、树木、水波，兴趣广泛。可是，苏东坡没有跟职业画师学过作画，只是随手画着玩，并没有将画画当作正经才艺对待。毕竟，父母期望的是他考中进士。

考中进士之后，苏东坡在各地为官，更是没有工夫学画，不过得到过友人文同的指点。熙宁三年（1070）年底，在官告院当判官的苏东坡工作闲散，百无聊赖，假日里整天与擅长绘画的文同谈诗论画，文同会指点他画竹木的技巧。

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出任湖州知州，从前在杭州当通判时认识的士人贾收在湖州城外有别业。一次苏东坡和客人游览完道场山、何山，遇到大风大雨，来不及回城，就住在贾家。在临水的“水阁”酒宴之后，苏东坡让人持着蜡烛照明，乘醉在墙壁上画了一杆风竹，并题诗留念。由此可见，经过文同的指点，苏东坡已能绘制简单的竹画。

宋　王诜（传）　水墨版烟江叠嶂（局部）



苏东坡被贬黄州期间多有空闲，经常随手涂抹，所绘的题材也扩大到怪石、枯木等。这时候的苏东坡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宋第一名士，以诗、词、文著称。世人爱屋及乌，苏东坡的画也开始受到重视。苏东坡经常从厚厚一叠画作中选出品相较好的作品送人。

后来苏东坡被贬惠州、儋州，没有画家、藏家可来往，他只好自娱自乐。闲来无事，苏东坡也指点苏过写诗、作画。苏过跟着父亲学习绘制怪石丛竹之类，抽时间在绢上画了一幅偃松图，制作成小屏风，放在父亲床头挡风。苏东坡十分高兴，觉得儿子描绘的松树乃“植物之英烈”，可以象征自己的高才。

由于没有受过专业的绘画技法训练，苏东坡只能画一些简单的形象，构形、用色上无法像吴道子那样讲究法度，而是追求法度之外的一种个人性情、趣味的表达，用他自己的话为“墨戏”。后来苏东坡把士大夫表达个人情趣的画作称为“士人画”，在《又跋汉杰画山二首》中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卷。汉杰真士人画也”，还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诗中以“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强调这种画风与职业画匠之画的区别所在。“士人画”一说，后来发展为元明时代的“文人画”理论，对后来的艺术史大有影响。



水問山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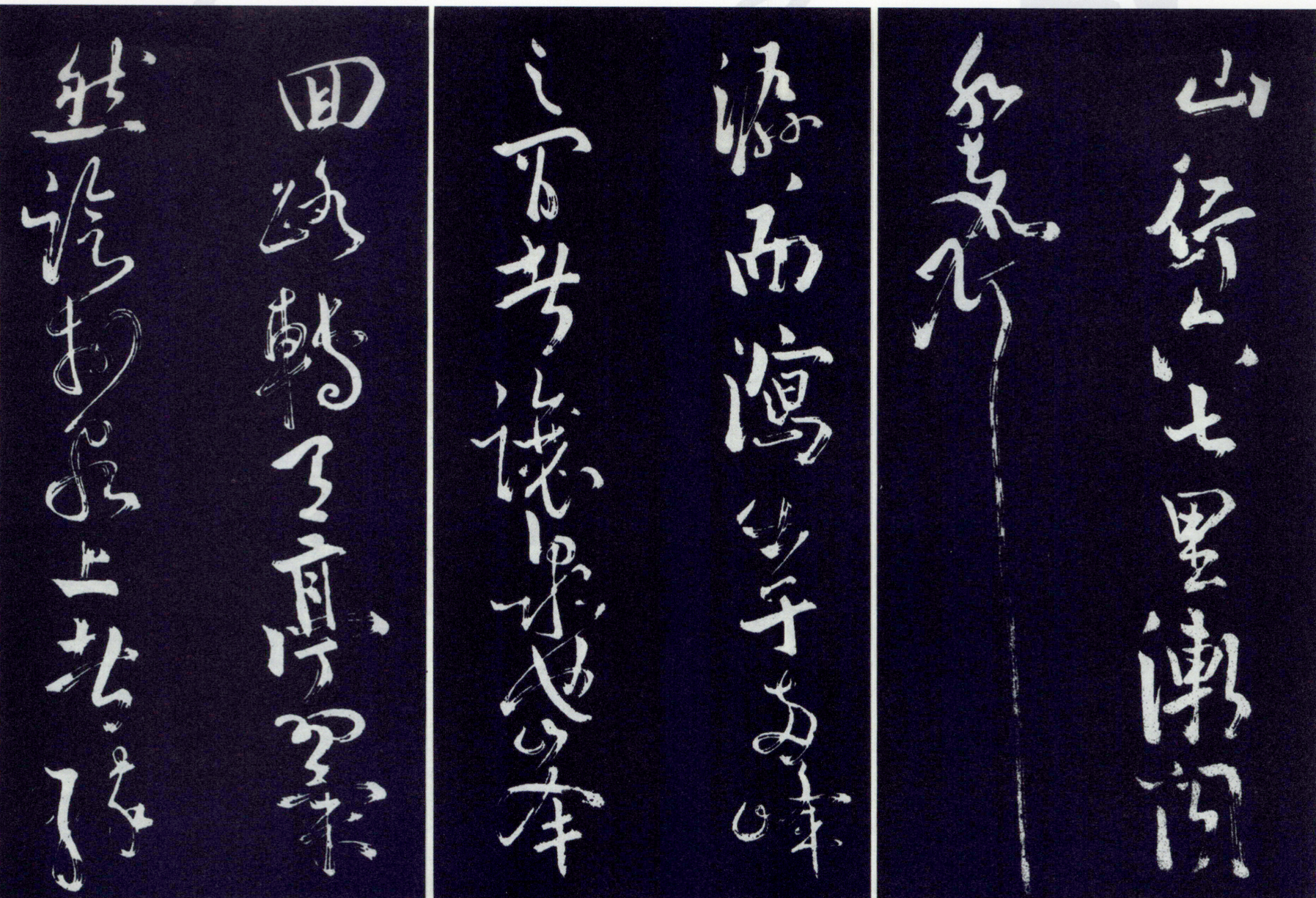
书法：法外之趣

在今天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苏东坡是宋代书法第一人，是“宋四家”之首。但是，在苏东坡活着的时候，并没有“苏黄米蔡”四人并称的说法——这是南宋至元才形成的概念，北宋人并没有“宋四家”这个概念。

苏东坡对自己书法家身份的前后态度并不一致，而在时人眼中，苏东坡的书法也并非公认的当世第一人。苏东坡从少年时代的日常书写，到青年时代的揣摩书法，到中年以书法家自居，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进京之前，苏东坡对书法并无特别的兴趣。少年时期苏东坡在眉山刻苦备考，写的赋、文显露出才华，得到祖父和父亲的赞扬，但是并没有诗名、书名。苏东坡的书写基本功训练与抄写经史典籍有关，他抄写过多部经史典籍，如《汉书》他至少手抄过三遍，并且有意用不同的书体进行抄写来训练自己的书法基本功。苏洵喜欢收藏，估计家中也有一些字帖供苏东坡临摹，可没有特别宝贵的书迹藏品。嘉祐二年（1057），二十二岁的苏东坡考中进士，文章得到欧阳修的赞誉，震动汴京，此时他得到欧阳修等人激赏的是文章，而不是诗，更不是书法。

宋　苏轼　书欧阳永叔醉翁亭记（局部）



苏东坡开始重视书法是第二次到京城备考制科考试期间。京城的士林风气与成都、眉山不同，这里有一些士人讲究书法。而且苏东坡认识了欧阳修的好友蔡襄，蔡襄是此时最著名的书法家，对苏东坡影响很大。故而，嘉祐六年（1061）年底至治平元年（1064）年底在凤翔府担任判官时，苏东坡有意学习书法。他观赏长安、凤翔的唐代碑刻和私人收藏的历代作品，增长了见识，也留意收集拓片并曾寄给弟弟苏辙。这从侧面透露出这一时期苏东坡注重练习书法，兼取多种书体。苏辙在这一时期写的《子瞻寄示岐阳十五碑》中说“吾兄自善书”，这可能是第一篇夸赞苏东坡善书的文字。不过出自弟弟苏辙之口，恐怕别人未必认可。当时其他士人并不认为苏东坡以书法著称，苏东坡在写给苏辙的《次韵子由论书》中也直言“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吾虽不善书”似不是单纯客气，这时候苏东坡的确不是靠书法出名，隐含的意思是自己当时是以文章震动士林。

此时苏东坡虽然留心书法，但是无意以此博取名声，之所以如此，和他心目中对书法之重要性的看法有关。和欧阳修一样，他认为“笔墨之迹”（即书法和绘画）是“自乐”的业余爱好，其地位远远无法与文、诗相比。苏东坡更重视文、诗的写作，并不刻意追求能书之名。纵观他的一生，他爱写常见的楷书、行书，很少刻意探索草书、篆书等其他书体，也没有刻意模仿某一风格或者某一人，而是随着兴趣变化、人生历练自然演变，即所谓“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但是苏东坡兴趣广泛，爱好议论，这一时期更著名的是他对书法的一系列论述，比如他把颜真卿的书法和杜甫的诗并举

